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季刊）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主管主办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发行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4—1496/C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671—6949
地 址：广州市三元里大道 99 号
邮 码：510400
电 话：(020) 26297022、26297033
电子邮箱：gdsy_xbbjb@gd.gov.cn
2001xb@126.com
出版日期：2024 年 7 月 18 日
设计排版：广州市天河彩佳印刷厂
印刷单位：广州市天河彩佳印刷厂
定 价：15.00 元

本刊编委会

名誉主任 李 心

主 任 方赛妹

副 主 任 杨应棉 邓爱霞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赛妹 邓爱霞 冯颖红

刘伟炬 刘盛奕 刘明禄

杜国辉 张 山 陈童敏

杨应棉 林少红 郑 锋

戚志恒

主 编 邓爱霞

副 主 编 张 山 陈童敏

编辑部

主 任 张 山

副 主 任 余 伟 陈童敏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论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的内在逻辑超越与开创性意义 王泓博 (0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六个坚持”：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本遵循 郭 媛，卢楚婷 (11)

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

以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四个认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陈 蔚 (17)

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申 奥 (23)

新型政党制度研究

当代西方竞争性政党结构的执政类型、制度效应与运作情势 康喜彬 (30)

民族宗教工作研究

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的四重审思 张龙华，张 倩 (36)

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内容框架与时代特征 李文珍 (43)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

同心圆理论视角下网络意见人士的统战工作研究 蔡 伟 (49)

声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交流渠道，本刊现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 CNKI 系列数据库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不再另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研究

统一战线引领民营企业助推共同富裕：理论依据、实践探索与优化进路 张佳慧 (55)

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性思想——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溯源 康渝生，侯 畅 (61)

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

深入把握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发展脉络与重要建设规律——以广东政协实践为例
..... 周 云，胡鹤姿，陈童敏 (67)

中华文化研究

中国书法——书写伟大民族精神的绝世瑰宝 徐兵兵 (75)
多维统一：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的本质特征 刘亮红 (82)
《黄帝四经》中“理”的治世功能及其当代启示 董颖波，高春花 (87)
中国传统雕塑艺术在现代城市文化建设中的应用与推广 吴为山，余文星 (92)
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开发的路径创新研究——以河源为例 河源市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 (99)

学员论坛

创新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助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杨东龙 (105)
落实“民营经济 31 条” 以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李 颜 (107)
以文化建设助力“百千万工程”协同区域协调发展 张 艳 (110)

Main Contents

On the inherent transcendent logic and pioneering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ed world outlook	
.....	Wang Hongbo (05)
"Six adherence" : Fundamental adherence to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Guo Ying, Lu chuting (11)
To enhance the Party's innovative theory of the "four identities" to enhance the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	Chen Wei (17)
United front theory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in the new period of Deng Xiaoping	Shen Ao (23)
The ruling type, system effect and operation situ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ompetitive party structure in the west	
.....	Kang Xibin (30)
Four-fold reflections on the infiltration of foreign religions into universities	Zhang Longhua, Zhang Qian (36)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of the Hong Kong and Macao work on the generation of important logic, content framework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Li Wenzhen (43)
Research on the United front work of network opinion pers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ntric circle theory	
.....	Cai Wei (49)
The United Front guide private entrepreneurs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theoretical basis,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optimized approach	Zhang Jiahui (55)
The Process Thought of Marxism --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	Kang yusheng, Hou Chang (61)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consultative bodies of the CPPCC and important laws of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CPPCC practice in Guangdong province	Zhou Yun, Hu Hezi, Chen Tong Min (67)
Chinese calligraphy--the treasure of the great national spirit	Xu Bing Bing (75)
Multi-dimensional unity: the essence of Mao Zedo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Liu Lianghong (82)
The function of "Reason" in the Four Classics of Yellow Emperor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	Dong Yingbo, Gao Chunhua (87)
The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culpture 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urban culture	
.....	Wu Weishan, Yu Wenxing (92)
Research on path innovation of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d resources -- taking Heyuan as an example	
.....	Heyuan City Socialist Institute research group (99)
Innovate to develop the intelligent internet-connected automobile industry and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Yang Donglong (105)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ivate Economy 31"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economy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Li Yan (107)
Cultural construction to help the "hundred million project"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Zhang Yan (110)

论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的内在逻辑 超越与开创性意义

王泓博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独特的世界观,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世界现代化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总体观点, 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在哲学基础上以主体平等超越主客二分、在价值取向上以人本逻辑超越资本逻辑、在发展理路上以和平包容超越对抗冲突, 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世界观内在逻辑理据的三重维度超越。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宏伟胸怀, 打破了西方国家对现代化理论的话语垄断、突破了西方现代化建设的原有思维定式、厘清了现代化发展共性规律与西方现代化的辩证关系, 为开辟现代化发展新道路、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新活力, 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世界观; 内在逻辑; 超越; 开创性意义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3-0005-06

世界现代化浪潮自兴起至今已逾数百年, 关于什么是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等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 依靠科技革命的驱动, 率先完成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 实现了本国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思想文化等领域的深刻变革。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并非各国通向现代化的唯一路径, 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领域的先发优势不代表其同样拥有对现代化的最终定义权。资本主义现代化世界观存在着主客二分式哲学基础、资本逻辑式价值取向、对抗冲突式发展理路的先天性基因缺陷, 且这一缺陷无法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得到自我解决。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世界观扬弃的基础上, 实现了主体平等地位的重塑与人本价值逻辑的复归, 高扬和平包容的发展理念, 为破解世界现代化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一、资本主义现代化世界观的先天性基因缺陷

(一) 主客二分的哲学认知范式与构成其逻辑支撑的“西方中心论”

主客二分的哲学认知范式认为主体优越于客体, 这种优越性赋予主体支配、引领客体的法理正当性。在资本主义现代化世界观的视域中, 主体始终是西方, 而非西方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以客体面貌出现, 以西方为中心运转, 西方国家在现代化领域的先发优势造成了其在种族、制度、文明等领域中的优势地位。这种“主客二分”“主统治客”的思维模式贯穿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不同时期, 从早期资本主义的血腥殖民扩张, 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尖锐的劳资矛盾、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帝国主义掠夺战争, 再到全球化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渗透、经济操控和强权打压, 西方资产阶级始终以世界的引领者、文明的

收稿日期: 2024-05-30

作者简介: 王泓博 (1995-), 男, 汉族, 天津市河西区,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助教, 研究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开拓者自居,却给世界带来了贫富分化、族群撕裂、生态恶化等一系列恶果。“在资产阶级眼里,世界就应该是资本的世界,天下就应该是强者的天下。”^[1]有强者自然就有弱者,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唯我论世界观在将自身认定为强者的同时,天然地将其他民族定义为弱者和他者,并将其视作敌对和被征服的对象。

这一世界观同样反映在近代欧洲建构主权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为了整合地域内部的不同势力,加强对外竞争,树立并污名化一个异己的他者,长期以来一直是欧洲塑造民族自我认同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为其海外殖民扩张提供了所谓的道义合理性。

“民族概念的发明,依赖于外部战争或对外殖民,在这个过程中树立起一个‘他者’,并在对‘他者’的污蔑和摒弃过程中,达成民族的自我确证。”^[2]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暴力机器,成为社会统治阶级,实现自身阶级诉求的过程。以欧洲为中心的民族国家建构奠定了“西方中心论”的早期基础,西方国家从自身的主体视角出发,确立其相对于其他异己、弱势、客体民族的优越性,并将这种意识形态通过资本主义现代化向全世界拓展。“‘西方中心论’本身就是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产生和发展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使这种意识形态获得了向外传播和渗透的根本动力。”^[3]资本主义现代化世界观内含的主客二分认知范式,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野愈加难以弥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二）资本增殖的权力支配逻辑与作为其国际演变形式的“中心-边缘结构”

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核心秘密在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看似平等的经济交换关系实则以前者对后者的权力支配关系为前提。资产阶级先是以暴力手段强制剥离劳动者与其劳动实现条件的旧有联系,进而把劳动力当作普通商品、将劳动者与资本家间的交换视作满足彼此需求、协商一致的平等商品所有者间的自由交换。资本家全然忽视劳动力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创造更多剩余价值这一特殊商品属性,而仅付给劳动者用以维持其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内的工资。对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形式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地位关系,马克思早有明

确揭示:“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4]在资本至上原则的强势主导下,劳动者所拥有的自由不过是迫于生计需要而被迫向不同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的自由。

为规避周期性经济危机、扩大再生产规模,资本势必要在国际场域开辟新的市场空间,为剩余价值的积累创造新的可能,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同样以权力支配关系的实现为前提。“西方经济学把如何通过有限资源实现利益最大化作为全部理论的内核,其根本缺陷就在于忽视了经济利益的实现是以支配资源的权力为前提的。”^[5]中心国凭借掠夺来的资源确立并持续巩固其在技术领域的先发优势,并依靠对关键核心技术的把控不断加深边缘国对其的依附。“专利保护或技术垄断使原本就不公平的中心与边缘间的贸易再度加上了一层屏障,以至于边缘国要获取它们自己无法生产但又急需的资本时,就必须作出更大的付出。”^[6]中心国在技术上的垄断地位使边缘国的经济建设不得不依赖于中心国的资本注入,这又加强了中心国对边缘国经济命脉的掌控程度,并逐渐发展为边缘国对中心国在政治、文化乃至创新层面的全方位屈从。

（三）对抗冲突的发展原则理路与作为其主要表现形式的“修昔底德陷阱”

资本主义现代化遵循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世界观,认为在这个世界中强者为尊,世界始终处于无秩序的混乱状态,没有一个能够协调矛盾、统摄一切的至高权力主体,人们彼此相互猜忌,只有率先主动侵略他人才能获得发展的优先权和竞争优势。世界的本质就是一切人对抗一切人的无序战争,和平唯有在各方力量达成相对均衡时方才可能实现。“在没有权力可以使大家全都慑服的地方,人们相处时就不会有快乐存在”“由于人们这样相互疑惧,于是自保之道最合理的就是先发制人”^[7]这种天然地将他人视作威胁的先入为主式观点没有任何合理性依据,势必带来对抗冲突。资本主义世界观默认强者的生存方式在于剥削、凌虐弱者并将其视作理所当然,却从未反思其理论根基是否具有合

理性。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并非意味着各国要走向相互敌视、彼此倾轧的道路，各国同样存在着求同存异、携手共进的可能。

资本主义现代化世界观不可避免地内含着对抗冲突的发展理路，在“修昔底德陷阱”的假设中，崛起国和守成国产生对抗的前提在于崛起国同样会按照守成国的方式参与国际关系交往活动，并与守成国一样互视对方为自身发展的威胁而非机遇。在格雷厄姆·艾利森将中国的未来发展描述为“想象一下中国和我们一样的”话语框架内，中国的和平崛起理所当然会被部分西方政客视为冀图通过战争手段重塑世界秩序的尝试。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总是力求将自身的特殊价值观念普遍化，将世界视为被征服的对象和满足自身利益的工具。正如赵汀阳教授所指出：“事实上它们总是在思考世界，但是，‘思考世界’与‘从世界去思考’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8]“修昔底德陷阱”的本质仍未脱离资本主义现代化世界观零和博弈的思维路径，无法达到实现世界普遍和平和共同繁荣的最终目的。

二、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的内在逻辑超越

（一）主体平等：以尊重各国意愿和发展实际为价值取向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坚持主体平等的发展理念，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反对恃强凌弱、反对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是为了称霸或扩张，而是始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人类社会进步。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的主体平等既包含本国范围内社会成员，同时又囊括世界范围内各主权国家。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进程中注重努力确保全体人民在主体平等基础上共享发展成果，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由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创和持续推动的伟大事业，是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有机统一的现代化，中

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离不开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双向促进与带动。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视其他国家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和国际事务参与者，欢迎各国人民共享中国发展的机遇和成果。

不同于西方国家将自身现代化的先发优势视作相较于其他国家在种族、制度、文明上的优越性，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中充分理解并尊重各国在经济基础、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注重在与各国的沟通交往中实现互利共赢，并积极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秉承和而不同、开放包容的天下观，尊重不同国家作为独立文明主体的价值主张和独特性，主张不同文明形态在平等交往、良性互动中实现共生共存。“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9]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反对对于现代化发展标准的一元化设定，主张尊重各国自主探索符合本国人民期望的发展道路的权利，实现现代化发展共性追求与本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10]

（二）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旨归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逻辑，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核心旨归。中国式现代化将资本视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非目的，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在国家权力的主导下以驾驭资本的方式使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在对待资本的问题上，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彻底排斥、又有别于西方国家的自由放任，而是在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坚持引导与规范相结合的方针政策，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影响，实现资本健康有序发展的可行路径。“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11]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性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系的有机结合，扬弃并活用善用资本，在本质规定性上根本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老路，而是探索出

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新路。

经济全球化时代现代化浪潮的到来使各国都不可避免地要与资本产生接触,如何在利用资本高效配置资源的同时规避其负面效应,已成为各国现代化建设的普遍课题。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继承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精髓,践行人民史观,认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现代化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前提,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既是现代化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推动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一条以人本逻辑超越资本逻辑,“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2]的现代化模式。虽然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历史上曾表现出“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3]的文明一面,但其始终无法解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无法实现以人为本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内在协调。

（三）和平包容：以和平发展道路为发展路径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顺应世界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意愿,彰显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担当,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道路,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同舟共济、荣辱与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国家为实现对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追求,在历史上曾对亚、非、美洲进行了血腥的暴力压迫,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打压后发展国家的发展空间,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中华民族经历了西方列强侵略、凌辱的悲惨历史,深知和平的宝贵,绝不可能重复西方国家的老路。”^[14]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反对零和博弈、恃强凌弱、单边主义的现代化发展理路,积极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主张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民族都应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中国致力于与世界各国一道,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携手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和平、爱好和平,传承并追求和平和睦和谐的价值理念。中华文明内蕴着以和为贵、以和求同、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精神追求,对外奉行亲仁善邻、讲信修睦的交往之道,对和平的追求深深熔铸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继承并弘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崇尚爱好和平的文化传统,坚持在维护世界和平中谋求自身发展,并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15]中华民族具有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胸襟气度,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始终以促进各国合作共赢、维护世界安全稳定为己任,无论自身发展至何种程度,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以其他国家的落后和损失为代价,而是与世界各国携手共进,积极倡导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的繁荣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三、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对人类现代化的开创性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现代化理论的丰富与完善增添新内涵

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西方国家因率先开始工业革命而最早进入现代化,逐步构建起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和文明形态。西方国家在向世界进行资本扩张的同时,也在不断深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资本主义现代化世界观将自身在现代化领域的先发优势,视为“教师爷”般颐指气使指责他国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底气和权力。一些发展后发国家对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不深、探索不足、认识不清,盲目照搬移植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事实证明,只会给本国带来经济衰退、政治依附、贫富分化、族群撕裂的恶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16]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

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广大发展中国家唯有坚定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才能打破西方对现代化的话语垄断，彻底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依赖。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以人民至上理念、独立自主原则、守正创新意识、立己达人精神、奋发有姿态为基本标识，具有浓厚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新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从不将自身的发展模式作为定式强制对外输出，而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对自身特殊性的提炼中总结普遍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方案，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现代化理论谱系，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通过自身理论与实践创新，科学回答了“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17]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彰显着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内蕴着突破西方现代化旧有范式、探索人类现代化发展新路的时代使命。

（二）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新空间

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冲突论”的对抗式逻辑，以和合共生的思想智慧、协和万邦的天下视野、开放包容的世界胸怀，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各国深厚的历史底蕴、各具特色的文明传承既赋予了本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以鲜明特质，同时又极大繁荣了世界文明的百花园，共同成为人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新型文明观，聚焦世界各国人民实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追求。各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其本国人民智慧的结晶，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没有高低之分，更无优劣之别。“中国式现代化努力创造一种不以我强你弱、我高你低、我赢你输作为中心考量，而是以‘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为主

旋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协和万邦、天下文明的新的世界秩序。”^[18]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致力于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积极搭建沟通平台，为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民心相通，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成果，注重吸收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有益经验，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总体目标，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新型综合性文明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发展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作为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内含着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要求和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又立根中国人口众多、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的国情，彰显着世界现代发展的个性要求和特殊规律，突破资本逻辑主导下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间的异化困境，体现了人类文明中人的价值性和主体性的复归。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找到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形态的可行路径，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未来发展规律。

（三）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注入新活力

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科学回答了“新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这一重大课题，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19]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发展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彰显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中国特色与时代特色，又为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现代化发展的新典范。

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促使

原本两制共存、资强社弱的世界格局发生了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积极转变。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到来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暂时陷入低潮,西方各种贬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看衰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论调甚嚣尘上。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中国以自身的发展成就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20]中国式现代化以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创新,促进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参考文献:

- [1] 何怀远.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观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3(07): 19-28.
- [2] 杨光斌. 中国“天下观”与西方“国际观”——兼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观 [J]. 社会科学, 2023(11): 5-24.
- [3] 赵坤, 刘同舫. 从“文明优越”到“文明共生”——破解“西方中心论” [J]. 理论视野, 2021(02): 100-108.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28.
- [5] 董彪, 王玥. 《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双重阐释 [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39(01): 141-150+239-240.
- [6] 张康之, 张桐. 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89.
- [7] [英] 霍布斯. 利维坦 [M]. 黎思复, 黎廷弼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94.
- [8] 赵汀阳. 天下体系: 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4.
-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524.
-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427.
-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211.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90-391.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7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927-928.
- [14] 习近平.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J]. 求是, 2023(16): 4-8.
- [15] 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6.
- [16]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21.
- [17] 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
- [18] 李文.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世界意义 [J].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4(01): 21-37+2.
- [1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509.
- [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7.

【责任编辑: 张山】

“六个坚持”：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本遵循

郭 媛，卢楚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持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党百年奋斗重要历史经验和庄严历史责任。“六个坚持”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逻辑框架，揭示了理论创新的价值逻辑、原则理念及方式方法，为新时代探索理论创新和推进理论创造指明了实践路径。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必须增强理论创新的自觉主动性，牢牢把握“六个坚持”，始终以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关键词：理论创新；“六个坚持”；根本遵循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49(2024)03-0011-06

党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以不断发展的理论思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坚定的理论自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1]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六个坚持”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逐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构成了逻辑严密的统一整体，成为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和优良思想传统，深刻揭示了理论创新的价值逻辑、原则理念、方式方法，回答了新时代推动理论创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新征程实现理论创新的根本实践要求。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价值逻辑

理论创新必须明确价值动力问题，才能形成理论探索和创造创新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追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坚持人民至上和坚持胸怀天下是党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价值立场，分别从不同维度对理论创新提出不同价值要求。

（一）坚持人民至上是理论创新的价值根基

理论创新的价值意义归根到底在于服务人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充分表明，党十分注重从人民的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提炼理论成果。新时代持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进一步明晰和突出人民群众在理论探索和运用中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要求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人民至上。马克思主义将现实的人视为历史的起

收稿日期：2024-04-30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项目（GD22XJY06）、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德育专项）项目（2021JKDY013）、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2022GXJK185）

作者简介：郭媛，女，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青少年心理发展；卢楚婷，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

点,是引领社会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科学真理,深刻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就是人民立场,坚持一切运动为了人民而进行,一切发展为了人民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体系、理论归宿、形成过程均体现了人民性特征。党是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实现党的理论创新必须遵循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人民立场,以人民至上为逻辑基点。**坚持人民至上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结论。**在百年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党以改善人民现实生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奋斗方向,在实现理论创造和理论飞跃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提出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科学思想理论均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并逐步形成以人民为中心进行理论创造的思想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处处彰显人民立场、体现人民利益。新时代继续取得新的理论成果必须毫不动摇弘扬以人民为中心开展理论创新的思想传统。**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现实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的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多次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这一思想贯穿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时刻以人民的切身利益为重,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目标,以实现人民幸福生活为追求。新时代坚守党的初心使命,必须围绕人民实际需求开展理论创造,以创新理论指导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必须走好群众路线,决不能闭门造车、坐而论道、流于空想。”^[2]指明了人民群众在理论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理论创新离不开群众的实践活动,必须将群众的实践作为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将群众的实际满足作为价值归宿。**始终为了人民进行理论创新。**脱离人民群众的理论是缺乏生命力的。理论创新必须站稳人民立场,从人民实际需求出发,倾听群众理想愿望、解决群众现实问题,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点,不断创造和发展指导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向往的创新理论。**始终依靠人民进行理论创新。**人民的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把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汇聚到理论创新发展中来。忽视人民的主体性力量、离开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党的思想建设和事业发展就无法成功。党的理论创新必须紧紧依靠人民,从人民的实践活动中总结新经验,形成新理论。**理论创新的成果始终由人民共享。**党的创新理论唯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自觉、理论自觉、行为自觉,才能发挥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必须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思想指引,帮助群众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提升思想境界、把握人生理想。

(二) 坚持胸怀天下是理论创新的价值导向

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坚持胸怀天下是理论创新的价值导向,引领党以更加开放包容的精神推动理论创新,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党在百年历程中,从世界发展整体格局出发进行战略谋划,展现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责任担当。坚持胸怀天下以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是历史进步的应有之义,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要求理论创新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世界历史是一个统一整体,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刻阐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通过特殊性加以表现的原理,世界发展呈现出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依存的状态,但世界历史的总体方向是朝着共产主义目标前进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具有世界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本质属性要求中国共产党理论探索和创新不仅要关注本国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还要积极为人类进步和解放事业而奋斗,探索引领世界走向“真正共同体”的思想理论。**世界历史发展态势要求理论创新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人类社会总是按照一定规律向前发展。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再次站在历史十字路口,如何维持人类生存发展,延续人类文明成果,亟需探索具备全球视野的创新理论来指引人类社会发展。党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创造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党关注世界发展,追求人类繁荣进步的远大目标。新时代取得理论探索新进展必须关照世界发

展状况,思考人类未来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世界眼光和天下情怀要求理论创新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坚持胸怀天下这一基本观点源于马克思主义全球观和天下大通的民族基因。党始终以全球眼光来思考人类前途命运,在谋求自身发展中,正确认识我国与他国,我国与世界的关系,坚持对外开放、互利共赢,并争取与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共进,为世界美好未来注入智慧和力量,体现了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深远抱负。因而,党的广阔世界视野要求理论创新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也只有坚持胸怀天下,才能创造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崭新理论。

总的来说,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进步具有统一性,探索中国和世界发展同向同行、共融共促的实践路径需要具备天下情怀与国际视野的创新理论的指导,因而新时代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的价值导向。**理论创新要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引领人类社会发展方向。**面对人类发展共同面临的挑战,党必须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局出发,探索和创造崭新的思想理论指引前进道路,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倡导全世界更多国家加入到探索人类美好未来的队伍中,共同研究不断实现全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创新理论与实践路径。**理论创新要尊重文明差异,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要主动加强同各国的文化交流、合作发展,不断拓宽对外开放的范围,充分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使思想理论在兼收并蓄中实现进步,具备更宽广的国际胸怀和世界视野。并以创新理论指导世界文化繁荣发展,文明互促发展的生动实践,推动世界各国既保持自身文明的独特性,又互相尊重差异,交流借鉴。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原则理念

理论创新必须明确原则方向问题,才能保证创新理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党注重独立自主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并始终保持对自身科学理论与实践

发展的自信,以良好精神风貌实现新突破、取得新进展。坚持自信自立和坚持守正创新是党理论创新的原则理念,实践中必须毫不动摇地运用。

(一) 坚持自信自立是理论创新的基本立足点

自信自立是党自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对创造性理论与实践充满信心的内在精神品质。自信是自立的要求,自立是自信的基础,坚持自信自立是理论创新的基本立足点,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总结得出的经验智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表明了探索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发展中必须立足本国实际,反对本本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依靠自身力量开辟发展道路。党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应中国国情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战略思想、理论观点,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面对复杂难题和挑战,党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新时代针对新情况新矛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政治勇气、坚定的理想信念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证明,只有坚持自信自立,才能不断获取推进理论创新发展的动力。

新征程上继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崭新理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秉持自信自立的精神风貌,以自信自立作为理论创新的基本立足点。**理论创新必须增强“四个自信”,保持发展定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实践中经过千辛万苦探索出来的,连同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文化,是符合中国实际和人民利益的,推进

理论创新必须予以充分自信,并自觉维护和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理论创新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保证发展方向。**世界上不存在照搬他国发展模式发展壮大起来的国家,也不存在完全依附他国发展长久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长远发展,理论创新必须具备自立自强的精神独立性,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向的正确性。

(二) 坚持守正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原则方向

守正创新是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推动理论与实践互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发展的思想理论与发展道路的基本准则。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守正的要求,理论创新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方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开放性发展性的理论品格要求理论创新必须坚持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为发展是前进、上升的运动,事物总处在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4]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本身也体现了鲜明的发展性和开放性特征。坚持守正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坚守和弘扬。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在运用的过程中同时实现理论的创新和进步,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坚持守正创新是理论延续生命力和展现活力的根本所在。**理论的生命力和发展活力在于不断创新。在百年奋斗史中,党始终坚持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发展状况、洞察时代进步规律、体察人民实际困难需求,并结合时代需要,通过广泛的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以科学的实践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激发和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

理论创新必须保持科学严谨的态度,而这关键在于在实践中坚持守正创新,既保证理论创新的正确方向,又形成崭新理论指导新鲜实践。**理论创新必须坚守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

新的基础和前提。”^[5]生动体现了守正就是要守马克思主义之正,坚守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此外,还必须守住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与时俱进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特色,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资源。**理论创新必须勇于创造创新。**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6]揭示了理论创新必须在特定时代条件下进行。创新就是顺应时代发展,针对中国发展新实际、社会形势新变化和人民生活新需要,敢于进行实践和理论创新,继续发展体现中国特色的思想理论,指导中国和世界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创造世界人民更幸福的生活。**理论创新必须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保持正确方向。而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以新的理论来指导新的实践,有助于突破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从而取得发展过程中的新胜利。但守正不是简单保守,创新也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因而守正创新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的基础上,增进理论自信、激发理论思维、开拓理论视野、进行理论创新、实现理论创造,进而以创新的理论成果来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方式方法

理论创新必须明确方式方法问题,才能保障理论创新的有序推进和顺利实现。党立足实际进行理论创新和创造,并以系统观念指导实践发展,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新时代深入贯彻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的思想方法,有利于提出及时科学解答时代新课题的新理论。

(一) 坚持问题导向是理论创新的主要着力点

理论在实践中产生,理论的根本任务在于回答并指导实际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7]因此,理论创新以问题为导向,坚持从问题出发,有助于加快实现理论创新。**问题导向是理论创新的突破点和生长点。**任何科学的思想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理论的形成产生、丰富发展必须反映和解决现实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立足于人类生存发展问题,深刻分析问题原因,探讨研究解决方案中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创立了随着问题产生、认识、解决过程而不断丰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来源于实践,当现有理论无法有效解决现存问题,必然要求进行理论创新,探索解决矛盾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进行形成新的理论知识,以指导解决问题、突破难题。因此坚持问题导向,把握创新突破口对于实现理论创新至关重要。**检验理论创新成果关键在于问题能否得到解决。**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8]深刻表明理论的成效关键在于为现实所需要。因而理论创新的成果是否具备科学性和有效性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检验的标准在于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问题解决和方法调整的过程就是理论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因此,坚持问题导向是理论创新的主要着力点,只有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相统一,把握理论从问题中来,到问题中去的方法,才能推进创新理论的形成产生。

当今世界呈现出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国内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成为前进道路上的重要时代课题,新时代更需要增强推进理论创新的使命感和紧迫感,紧跟时代步伐,聚焦实践中产生的改革发展新问题,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方法,指引党领导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理论创新必须树立问题意识,把握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实践证明,坚持以人民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国家和世界发展的关键问题不断进行研究和思考,创造出适应实际需求的创新理论,才能指导解决前进道路上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因而,新征程上推动理论创新必须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遇到的新问题,把握理论创新的突破口,并针对问题性质、类型、层次

研究和提出真解决问题的思想和方法。**理论创新必须勇于破解问题,总结实践中的新鲜经验。**理论的完善和丰富过程往往也是问题解决和方法调整的过程。因此,理论创新要立足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矛盾,敢于直面问题、勇于突破挑战。通过观察问题现状、分析问题根源、研判问题后果,全面把握问题产生、发展过程,系统总结新经验、探索发现新规律、研究得出新理论,系统谋划新方案,再将之用于指导问题的解决。

(二) 坚持系统观念是理论创新的思想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9]坚持系统观念是基本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系统思维是理论不断深化完善的重要思维方式,系统观念贯穿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全过程,是推进理论创新的不可缺少的思想方法。**系统观念是揭示规律、深化认识的基础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0]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系统全面的观点。因而,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是相互联系和依存的,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研究事物,才能真正理解事物的实质,探索了解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坚持系统观念,以科学全面的思想方法观察和分析事物,才能深刻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持续深化认识。**系统观念是创新理论体系化的有效手段。**事物的发展具有整体性,必须从总体上把握发展状况,并在系统性实践基础上推动创新理论的体系构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并根据新的实践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以系统性理论指导应对发展道路上的突出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一系列系统性实践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规律,深化对理论产生于实践、完备于实践重要认识的过程,逐步形成了系统全面、内涵丰富、论述深刻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征程上,理论创新要更加自觉地掌握和运用系统观念这一基础性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理论创新必须深刻认识系统观念的重要性。**充分理解系统观念是把握历史规律、创造科学理论的基础方法。面对新征程上复杂形势和深层次矛盾,保持全局系统的眼光,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特殊和一般的关系,进而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理论创新必须掌握系统性思维方式。**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系统思维等,并统筹运用各种思维方式,做到预见性思考、战略性谋划、系统性推进,着力形成与时俱进、系统全面的创新理论以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1).

[2][9] 习近平.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N].人民日报,2023-7-2(01).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4][7]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5-19(02).

[5] 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J].求是,2023(20).

[6][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6、23.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责任编辑:陈童敏】

以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四个认同”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陈 蔚

(湖北省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咸宁 437100)

摘 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 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将这一指导思想转化成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共同行动, 对增加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需增进“政治认同”, 巩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 增进“思想认同”, 增强中华民族的亲和力与趋同力; 增进“理论认同”, 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执行力; 增进“情感认同”, 增强中华民族的吸引力与向心力。惟其如此, 才能凝心聚力地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认同; 共识; 中华民族凝聚力

中图分类号: G122,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3-0017-05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全体中华儿女当“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共圆”, 就须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作为中华民族生存统一发展的动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力,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多种条件共同作用的产物, ‘认同’是其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2]。有了认同便有共识, 有了共识才能凝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写入党章载入宪法的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将这一指导思想转化成共同意志和共同行动, 就应“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3]。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四个认同”, 戮力强化全民共识, 是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共圆“中国梦”的重要保证和必要遵循。

一、增进“政治认同”, 巩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

政治认同, 是指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 人们依据一定的政治立场和目标确定自己的政治身份, 把自己看作是某一政党的成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观念的信奉与尊崇者。信仰, 就是人们对某种观念、思想、宗教、文化或主义的信奉与尊崇, 它可以是个人的选择, 也可以是集体的认同。对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的信奉与尊崇, 既是集体的, 也是个人的认同。增进“政治认同”, 是要强化对党的创新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括蕴含其中的政治立场、政治观念、政治态度的认同。这种认同最基本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最核心的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认同。

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指导, 是我们党的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中,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考察社会现实、指导社会发展, 即从我国新的社会实际出发, 对党和国家事

收稿日期: 2024-05-24

作者简介: 陈蔚(1984-), 女, 湖北省咸宁市人, 讲师, 湖北省咸宁职业技术学院中专部财经系主任, 研究方向: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业发展的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正确判断,科学地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现代化强国建设以及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明确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新方略,“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4],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形成了新时代党的创新性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党的创新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5],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认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既要确信马克思主义阐释科学真理的逻辑力量,又要确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尤要确信只有在党的创新理论的指引下,道路才会方向正确,才有理论底气,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有能力有办法应对各种问题、风险和挑战。故而,在学习贯彻的过程中,“全面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各项工作”^[6],是增进道路认同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认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须真心实意地热爱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增强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向心力。“民族向心力的主体是全体民族成员,客体是民族整体。整体,必须是有组织的,有领导核心的”。^[7]中华民族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这是被中华民族的百年发展史充分证明的。民主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创举。新中国成立后,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了由贫穷落后到进入小康的历史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已形成新常态新格局,经济结构快速提升,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在这个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奋力拼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全面依法治国,强化反腐倡廉,国家治理能力得到快速提升,成功应对了各种社会风险和自然灾害;在这个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努力进取,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国计民生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全方位改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愈加充盈……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其志存高远的理想和团结奋进的精神凝聚起巨大的民众伟力,发展振兴,改天换地,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由衷向心,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强大凝聚核心。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正逐步实现,更加离不开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团结一致,而增进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形成真心爱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的向心力,才能不断巩固中国共产党的凝聚核心地位,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二、增进“思想认同”,增强中华民族的亲和力与趋同力

思想认同,是对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所形成的观点及观念体系的肯定性认知行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新时代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肯定性认知,必然会强化观念,统一意志,形成强大凝聚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领域,构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相互贯通的理论体系。增进思想认同,应从思想上认同其创新观念和鲜明主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观念主要体现于五个“新”:一,新时代,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二、新目标,明确新时

代奋斗的目标是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三、新判断，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四、新方略，明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五、新要求，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这些创新观念是基于对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辩证认识而确立的，是基于对中国发展现状和世界百年未有的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而提出的。从思想上加强引领，全面把握，深刻认同，才能真正确立新观念，并以之指导新时代的国家发展和各项工作的具体实践。

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认同，应强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主题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8]，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宣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道路、使命和目标。对这一涉及新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性质、发展道路、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的重要主题，全党和全国人民理应从思想上认同。

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认同也是一种文化认同。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基本特质。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具根本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9]，它对于维护民族国家统一具有标识民族特性、塑造认同心理的特殊功能。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引领作用的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能保障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稳定和发展，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导向和支撑，是凝聚民族成员的基础和纽带，理当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指导思想，理当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和遵循。由此看来，在新时代，应以新思想为引领，牢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对国家、发展道路、历史使命及奋斗目标的认同。最基本最核心的是要认同党的创新理论所阐明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并与之产生观念契合和思想共鸣，从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纽带，夯实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建设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目的性的角度看，增进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认同事关重大，它关乎全党的政治取向和实践，关乎意识形态的导向和稳固，关乎全国人民的思想认知和强化，关乎全党和全国人民通过思想的认同来达成观念的统一、情感的亲和乃至行动的趋同。行动的趋同衍生于观念的统一，依赖于情感的亲和。情感亲和就会产生亲和力。民族亲和力，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因思想观念统一、相互关系和谐而形成的力量，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直接消弭隔阂，化解矛盾，促进团结，而且能够促成肝胆相照、相濡以沫、和衷共济、同舟共进的民族整体协同观。增进了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认同”，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观念就会同频共振。思想观念是处事行为的先导，有了思想观念的同频共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情感就会亲和，力量就可凝聚，行动就能趋同，中华民族凝聚力才能突显。

三、增进“理论认同”，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执行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创新性理论。理论创新，是指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所作出的新的理性分析和理论解答；对认识对象或实践对象的本质、规律和发展变化的趋势所作出的新的揭示和预见；对人类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所作出的新的理性升华。”^[10]新的理性分析和理论解答乃至新的理性升华，只有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才有存在的价值，只有形成广泛共识，才能产生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凝聚力。所以，必须增进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认同，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增进理论认同，要全面把握理论结构和精神实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世界观方法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历史方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鲜明主题，以“新目标”即，“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奋斗目标,以五大发展为“新发展理念”,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为发展布局,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治理指向,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社会“新矛盾”,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外交理念,以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为政治保证,以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为安全保障,以“人民为中心”为理论灵魂。其精神实质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作贡献”。这一集时代性、学理性和系统性于一体的科学理论,明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路径。对这一的理论认同,不能仅停留于局部认识,而是要形成全党全国人民广泛的社会共识。

“社会共识,也称社会合意,即社会成员对社会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的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看法”^[11]。作为统一的整体,任何社会都需要其全体成员对该社会存在的某些重要事物(包括正确与错误、真美善与假丑恶)有一致或接近的认识。这种一致或接近的认识就是“共识”。对社会认识的一致或接近,是人们判断和行动共通的基础。有了认识的一致或接近,社会生活才能协调,社会凝聚力才会增强,社会目标才可实现。形成社会共识是传播的重要功能。这一功能,在传统社会主要由教育承担,在现代社会则是大众传播的主要任务。传统社会中的教育活动是在一定的规模和范围内进行的,其受众有限。现代大众传播则是通过记录和传播,把信息内容和价值理念传达到社会的所有阶层和所有角落,让广大民众以之作为判断、认识和行动的基础,突破受体的局限,拓展凝聚的范围。有鉴于此,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认同,需要拓展传播途径,利用各种各样、线上线下的大众传播方式,让广大党员干部、普通人民群众接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广泛认同,产生社会共识。

理论认同的目的不仅要让人民群众能更好地理解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普遍地认同新思想,将党的创新理论内化于心;而且要主动地传递新思想,自觉地将此思想贯彻落实到社会生活实践之中,将

党的创新理论外化于行。因此,增进思想认同要科学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意义和实践效能。既要把握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世界观方法论,能以之武装思想,又要切实认可此创新理论能够攻克长期没有解决的各种难题,能够办成事关前途的大事要事,能够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问题。增强理论认同,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真功夫,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心任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贯彻落实到发展改革工作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积极拥护者和努力践行者,从而不断增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向心力和执行力。

四、增进“情感认同”,增强中华民族的吸引力与向心力

情感认同,是发源于内心、存在于精神、根植于骨血的情感归属感和依赖感,是“四个认同”中最朴素最基础的认同。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情感认同,要求从情感深处认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认同往心里驻,往深里去,往实里走。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反复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2]。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1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遵循着“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其思想主题、奋斗目标、发展方式、总体规划、战略布局、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方略等,都代表了全党全国各族和全体中华儿女的利益,因而具有强大的民族吸引力,必然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向心。

民族吸引力与民族向心力共处于民族发展进步的统一体中,它们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民族吸引力决定民族向心力,民族向心力增强民族吸引力。民族吸引力强,必然民族向心力强,民族

向心力强，必定是因民族吸引力大。中国共产党坚持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看到了党的真诚用心，就必定会回馈以真挚的情感。“共产党是咱的领路人”“共产党关心咱老百姓”“总书记和咱心连心”“俺想对总书记说句话”……这些由衷的心声表达了全中国人民对党的深情向心。一个值得强调的问题是，从不同的视角看，民族整体及代表该整体的领导集团与人民群众个体，既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这种兼具主、客体双重身份的情况，决定了领导集团与人民群众双方都存在着积极主动的一面，都需要在增强民族吸引力、向心力中承担着重要的主体责任。增进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情感认同，需要对“当人民群众作为主体时，就要从增强向心力的角度增强民族大局意识，提高民族责任感，维护和服从民族整体利益，与民族领导集团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大业向前发展”^[14]的理解。

有了情感认同必然会增强向心力。在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情感认同中，广大民众的向心力将催发出崭新风貌。其一，振奋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其主干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除此之外，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以及诚实守信的从业精神、敬老尊贤的伦理精神、天人合一的和合精神等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15]振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强劲支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源泉。广大民众振奋起民族精神，构筑起精神高地，振兴中华的伟业就必定会成功。其二，迸发创造伟力。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正深刻调整，我国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和新的科技挑战。在新形势面前，如果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丰富智慧和无限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就一定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三，协同共建行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阐明了“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这是新时代中国和平发展、

科学发展的模式，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愿望，是全中国人民向往的美好愿景，具有无比强大的民族吸引力。因为，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整体吸引力形成发展的重要因素，故土家园是中华儿女的精神依赖和心灵归宿，亲土爱家是中华儿女共通而永恒的情感向心方式。目标与模式的一致，愿望与愿景的统一，必将激发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民族认同感包括对同一民族的符号和称谓的认同，也包括对共同目标共同利益的认同，是民族凝聚力形成的重要动力和纽带。中华大地上，共同的民族、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愿望、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归宿，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激励中华儿女树立起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有理念，齐心协力共建美好家园。

综上所述，认同和共识，是形成向心力的前提。切实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就会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由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应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团结凝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B/OL]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219/c64094-24399558.html>.
- [2][15] 陈载舸、陈剑安、殷丽萍. 中华民族凝聚力学概论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63、124.
- [3][6]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EB/OL] https://news.cnr.cn/native/gd/sz/20230403/t20230403_526205648.shtml.
- [4][5] 陈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何以能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EB/OL] <https://www.dswxyjy.org.cn/n1/2023/0824/c427152-40063232.html>.
- [7][14] 孔庆榕、陈载舸. 中华民族向心力研究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14、104.
- [8][12][1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B/O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7nztzl/2017_zt11/17zt11_yw/201710/t20171031_317898.html.
- [9] 王国利. 民族认同与青海意识契合探析 [J]. 青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38): 3.
- [10] 阳黔花. 关于理论创新的认识论思考 [J]. 黔西南民族师范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 (4): 22.
- [11] 潘强. 新型城镇化构建中的政治沟通理论认知与思考 [J]. 经济研究导刊, 2014 (24): 161.

【责任编辑：张山】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申 奥

(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基本观点, 深刻阐明了新时期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党派合作与完善多党合作制度、“一国两制”等问题, 为发展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 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了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 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为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发展方向。在邓小平诞辰 120 周年之际, 应准确把握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精神实质, 启示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 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要求, 坚持和平与发展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 邓小平; 爱国统一战线;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3-0023-07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时期统一战线形成、发展和壮大的历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新时代, 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更加需要统一战线发挥强大法宝作用, 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在邓小平诞辰 120 周年之际, 准确把握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精神实质、范围任务、实践举措, 将对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基本观点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指导下, 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逐步形成发展的。它涵盖了统一战线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

(一) 科学阐明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问题

邓小平准确把握时代方位, 在继承老一辈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统一战线思想的基础上, 对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作出了创新发展, 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

明确新时期统一战线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重新定位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 打开改革开放的大门, 中国经济形式逐渐多样化, 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人的利益诉求也变得更为复杂多样。如何看待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新出现并发挥重要作用的群体力量, 需要统一战线作出科学的定位。邓小平深刻把握新形势新任务, 重新考察界定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 明确“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1], 提出新时期统一战线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2]。这一重要论断的提出, 增强了爱国主义的凝聚力与号召力,

收稿日期: 2024-05-20

项目基金: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3 年度特别委托项目“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与人民政协研究”(GD23WTB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申奥(2001-), 女, 江苏省盐城人, 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使统一战线团结的对象更加广泛,统一战线各方面资源优势作用更加突出,激发了全社会的生机活力,为服务新时期党的改革开放大局凝聚了强大的力量。

明确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是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统一战线的任务随社会不同历史阶段发展而发生转变。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发生重要转化,新时期统战工作的重点也随着围绕发展社会生产力转移到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邓小平深刻把握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主要任务要求,科学地提出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为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1]。这既关乎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统一战线在新的历史阶段得以发展壮大前提条件,使新时期统一战线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开拓出一个蓬勃兴旺的新局面。

明确新时期统一战线对象和范围的宽广性原则,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随着国内社会阶级状况发生根本变化,原有统战工作的对象多已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诞生了许多需要团结联合的新的群体。明确统一战线的对象和范围,对于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健康发展和统战工作的顺利开展至关重要。邓小平对社会各阶层、各团体、各民族的利益诉求进行深入分析,突破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界限,明确了应当团结的力量和应当重点关注的领域。他在 1979 年 9 月 1 日召开的中央统战部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表《新时期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爱国者的联盟》的讲话,强调统一战线的范围宜宽不宜窄,应该团结更加广泛的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他指出,爱国统一战线具有广泛性,“就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同时,他强调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也有统一战线,“工人和农民是联盟,说明工农是两者。过去把知识分子搞到另一个概念,新的

提法,知识分子是劳动者”^[2]。

(二) 阐明统一战线的党派合作问题,突出强调完善多党合作制度

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与其他民主党派结成联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重要理论指导下,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和科学的阐释。

明确了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参政党地位。邓小平根据新时期各民主党派的实际状况,明确我国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3]。1989 年 1 月,邓小平在一份民主党派成员所提建议上批示,要求组织一个含有民主党派成员的专门小组,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责的方案^[3]。在邓小平这一要求指引下,同年 12 月,中共中央制定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首次提出了参政党的时代概念,深刻表明了各民主党派是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其政治纲领和政治实践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进步性与广泛的代表性相统一的特点,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

发展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科学分析我国民主党派社会主义性质的基础上,对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进行了深化发展,将原有的“八字方针”丰富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有力拓展了多党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十六字方针”不仅强调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亲密合作关系,同时更加注重双方之间风雨同舟的共同担当,有助于加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团结合作,成为新时期正确处理中共同民主党派关系的指

南。

开展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化建设。邓小平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出发,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既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铸就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政治制度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1],这一论断不仅首次对我国政党制度作出界定,还将多党合作同我国政治制度紧密相联,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89年中共中央颁布的《意见》首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从实质上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新飞跃。《意见》不仅围绕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各个方面作出规范化的具体规定,打破了此前政党政治不敢逾越的禁区,将我国的政党制度概括为“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更是首次从制度上推动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走上制度化建设轨道。

(三) 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推进祖国实现和平统一

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港澳台问题是中国的特殊问题,做好港澳台统战工作,需要有特殊的策略方法。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开创了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的先河,特别是创造性地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伟大政治构想,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了基本方针和原则,成为爱国统一战线的鲜明特色和显著标志。

“一国两制”的主体与补充共同统一于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一国两制”的主体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和平统一的前提和基础;补充即以社会主义为主导,以港澳台的资本主义为建立在主体基础上的必要补充。这一制度原则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不渝、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中国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共性。同时,又考虑到港澳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情况,在坚持共性的基础上两制并存、共同发展,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政治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科学的、

具体的运用。

“一国两制”是解决香港、澳门和实现祖国统一问题的最佳方案。“一国两制”允许香港、澳门保留原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使其能够保持自身独特的经济文化优势,在维持社会和平稳定的前提下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和国家发展大局,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回归后的香港、澳门在稳定发展的同时与内地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正是对“一国两制”可行性和优越性的有力证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必然为解决台湾回归问题提供可借鉴的方案,助力祖国早日实现完全统一。要而言之,“一国两制”将统一战线与祖国统一问题相结合,不仅为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现方式,同时也为最大限度地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以及全体热爱祖国的中华儿女,建立和发展同海外“三胞”的爱国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对新时期统战工作开辟新领域、统一战线思想宝库增添新内容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在新时代的继承发展

无论历史条件如何变化,统一战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继承发展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内涵更加丰富

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良好开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爱国统一战线事业发展新阶段,对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定位、性质、任务和对象范围等内容作出新诠释,为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爱国统一战线的定位更加高远。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更加需要

统一战线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作用。新时代，统一战线上升为治国方略，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成为新的战略部署。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肯定统一战线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意义，多次强调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问题，将“坚持统一战线”纳入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和治国理政战略全局，并不断赋予统一战线“法宝论”的新时代内涵，实现了统一战线由革命战略到治国方略的重要转变，进一步彰显统一战线对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现实性意义，以及对于实现中国长远宏伟战略目标的划时代意义。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性质更加明确。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我国现代化动力的主体不断扩大外延，为统一战线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通过对统一战线内部结构变化的深刻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开放包容的博大胸襟进一步发展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四者联盟”，并在第四个范围中将“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形成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拓展的“四者联盟”，深刻体现了党对统战工作政治联盟性质的科学认识和对统一战线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更加清晰。统一战线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随国家局势和发展战略的调整，与时俱进地更新自身的目标任务。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统一战线承载着崭新的时代使命与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期待，能够充分发挥其凝心聚力的优势作用。因此，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四个服务”的基本任务更加清晰明确，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提供强大动力和战略支撑。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对象和范围更加广泛。根据统一战线历史方位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做好统战工作需要遵循的内在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阶层变化，与时俱进地对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对象和范围进行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调整。2015 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明确将统一战线工作的范围对象合并调整为十二个方面。新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其他需要联系和

团结的人员”工作范围，使统战工作的对象和范围变得更加宽泛。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理论更加学理化系统化。习近平总书记用“十二个必须”对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进行了高度概括，为做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导。“十二个必须”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阐述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性质地位、基本原则等基本理论，解决了新时代要不要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对统一战线各领域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进行了新的概述，解决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统一战线的问题；对如何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提出了明确要求，解决了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的问题。“十二个必须”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形成了学理化系统化的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

（二）新时代多党合作理论更加完善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科学的制度安排，有效整合各种政治力量，在实现力量集中的同时兼顾效率与民主，赋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新的时代内涵，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政党政治模式。

深入揭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深刻内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全国两会期间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他着眼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植根中国土壤的内生性、融通性、互动性，用“三个新”从利益表达功能、决策机制与运作方式三个层面阐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新特点新优势，彰显这一制度的人民性、团结性和科学性、实效性。多党合作是新型政党制度的核心，政治协商是我国多党合作的实现方式和运行机制。这一概念不仅承袭了我们党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的思想，而且符合当代中国实际，为我国政党制度的发展提供新视野，实现了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丰富拓展各民主党派的性质与职能。做好民主党派工作是统战工作的重要环节，这既关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还关乎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心工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时代各民

民主党派的责任使命，在“社会主义参政党”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各民主党派自身蕴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赋予各民主党派崭新政治定位。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多党合作经验基础上，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将“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作为各民主党派的职能之一，突显了各民主党派在政治协商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突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协商工作的高度重视。这些新发展新定位明确了民主党派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主体作用、拓展了民主党派的政治权利，能够充分激发各民主党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团结奋斗的动力与活力。

（三）“一国两制”伟大实践更加深入

“一国两制”作为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制度保障，有效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成为必须长期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政治创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出发，全面准确推进“一国两制”新时代新实践，引领祖国统一事业取得更大发展。

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一国两制”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大力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力地促进了港澳的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香港、澳门发展同祖国发展紧密相连^[4]，“一国两制”是香港和澳门最大的优势^[5]。为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党中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国家发展战略，推出前海、横琴、南沙作为粤港澳合作的“政策试验空间”，探索更加紧密的合作机制和发展模式，为港澳同胞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平台，增强港澳发展动力。有数据显示，回归以来，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2.7%，比同期全球发达经济体平均增速高0.8个百分点；澳门本地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3.5%，人均本地生产总值由1.5万美元大幅增长至4.4万美元^[6]。“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为实现祖国统一和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提供全新的中国方案。

探索解决台湾问题新方案。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两岸同胞都盼望家园和平安宁、家人和谐相处，为此就必须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其关键是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其核心是对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基本事实有共同的认知。“一国两制”不仅充分考虑了台湾地区的现实状况和两岸差异，尊重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还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由此可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最佳方式，应当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7]，共同追求和平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共同续写中华民族历史新的辉煌。

三、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当代价值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达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既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矢志不渝的深切夙愿，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期盼的目标心愿。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邓小平所勾勒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蓝图正逐步变为现实画卷，中华民族正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深入把握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当代价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要求，坚持和平与发展的良性互动，将给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带来十分重要的启示。

（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新统战工作实践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思想武器，也是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基本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全过程，使得马克思、恩格斯能够打破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桎梏，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解放思想能够充分释放思想的

创造力,能够从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现实出发,始终以不断变化着的客观实际为着眼点,不断实现思想与实际、主观与客观的同频共振,因而能够成为调适主观与客观之间矛盾的重要手段。^[8]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1]统一战线理论的每一次突破,统一战线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正因为邓小平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根据我国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和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才有了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的新局面。这一根本原则是推动统战工作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让统一战线在不同历史方位焕发生机与活力。

人类社会的历史变革持续演进、社会现实不断变迁,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的诞生,确保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保持高度契合。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但前路艰险,新矛盾老问题交织碰撞,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面临着更加复杂严峻的形势与挑战,肩负着更加重要的使命和任务。越是面临变化和挑战,越是需要深入发展统一战线、切实落实统战工作。必须以坚持解放思想为总体引擎,切实做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锐意进取,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发挥更大作用。

（二）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汇聚同舟共济的强大合力

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和永恒主题,也是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核心要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庄严号召为全世界无产者的斗争指明了方向,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本质在于团结和联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实现自身的高度团结统一,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而要“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则需要无产阶级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

将国内一切革命力量团结和组织起来,努力与其他可以参加革命的力量结成联盟。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在时代变迁和历史进程中适应国内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和党的中心任务的根本转移,推动统一战线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前所未有的创新发展,就是因为他以开阔博大的胸襟,着眼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国家总体战略目标,始终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坚持把统一战线放在最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一战略位置上,争取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联合。总的来说,聚焦宏大目标,争取广泛团结,达成深入联合,是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总体思路的起始依据和最终指向,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远大战略目光。

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不仅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实现新时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9]不管在任何历史时期,统一战线都是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基础上的人心聚合,统战工作就是团结人的工作,团结始终是统一战线的主题^[10]。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以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为历史责任,能够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只有深刻理解、准确把握这一本质内容,把握好固守圆心和扩大共识的关系,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才能坚定不移地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推向前进,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

（三）坚持和平与发展的良性互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和平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追求,也是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时代内涵。在马克思看来,“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11],换言之,马克思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12]。只有实现无产阶级的团结联合,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才能实现最广泛、最真实的民

主。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开辟新境界、不断达到新高度，统一战线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联系日益紧密。统一战线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民主功能内嵌于中国式民主的整体运转，在无产阶级争取和平民主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邓小平高度重视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围绕无产阶级争取和平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方面作出一系列论述。譬如，在统战工作中要广开言路，让各种意见建议得到充分表达；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从各自不同角度审视问题，形成互补，从而更全面地揭示问题的本质，更有效地制定贴切适宜的方针政策，等等。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建设提供不竭动力，日益成为中国式民主的鲜明特色和有力保障。综上所述，统一战线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和平与发展的良性互动中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种良性循环既是统一战线的特色优势，也是使得新时期统一战线充满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创造性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这一重大理念站稳人民立场，始终秉持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的理念，是在和平与发展的双向互动之中构建的民主。另一方面，统一战线不仅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构成，也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力量。作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和制度载体，统一战线蕴含民主动员、民主表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等重要功能，能够发挥克敌制胜、执政兴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三重法宝作用，在各领域工作中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面发展^[13]。其三，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其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团结了广泛的界别群众，密切了党和人民的关系，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的积极

作用，丰富了我国的民主形式，拓展了民主渠道，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由是可知，坚持和平与发展的良性互动，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作用，对于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7，187，205，364.
- [2]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250，158—159，62.
- [3] 关于制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方案的批示 [EB/OL]. <http://www.cppcc.gov.cn/2011/12/16/ARTI1513333597436452.shtml>, 1989—01—02.
- [4]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5—56.
-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99.
- [6]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学习百问[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2：175.
- [7] 习近平会见马英九一行[N]. 人民日报，2024—4—11(1).
- [8] 徐艳玲. 百年大党解放思想的三重逻辑[J]. 人民论坛，2021(18).
- [9]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学习回答[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
- [10] 陈惠丰. 从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到协商民主[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216.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0—281.
- [12] 陶林. 整体性视野下的马克思民主观新探[J]. 理论月刊，2020(02).
- [13] 张峰. 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关联性研究[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05).

【责任编辑：张山】

当代西方竞争性政党结构的执政类型、 制度效应与运作情势

康喜彬

(吉林警察学院, 吉林 长春 130117)

摘要:当代西方政党结构的执政类型可分为单独执政、联合执政和地方执政,这种竞争性政党结构产生的制度效应主要体现在,通过政党竞争机制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和执政水平,以及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提升政党自身的择优汰劣功能。就当代西方执掌和参与政权过程中各政党之间的竞争关系而言,其基本运作情势则是:政党竞争是在宪政框架内的“有序竞争”;政党竞争与政党合作“并行不悖”;政党竞争的实质是在维护垄断财团利益的前提下争夺执政权。在对当代西方竞争性政党结构分析、借鉴的过程中,要避免陷入西方政党研究范式和叙述逻辑的“泥沼”,不能将西方的政党逻辑套用于中国政党政治的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竞争性政党结构;执政类型;制度效应;运作情势

中图分类号: D5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3-0030-06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认为,任何政党都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并为其根本利益、价值目标 and 政策主张而斗争的政治组织。随着时代的变迁,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也应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政党政治发展呈现出许多崭新气象。马克思的政党理论主要关注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夺取政权,而没有详细探讨夺取政权后如何建立政党结构以处理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问题。纵观当代世界政党政治所呈现出的制度化、法治化和规范化的特点和趋势,尤其是当代西方竞争性政党结构所确立的比较完备的执政类型、制度效应以及相对稳定的运作情势,对于我们总结、丰富和深化“世界向度”的政党执政规律、执政经验、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审视和镜鉴意义。

一、当代西方竞争性政党结构的执政类型

竞争性政党结构是一种政党关系模式,指一个国家中存在多个合法政党,宪法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哪个政党拥有执政权,通过制度安排和和平竞争的方式平等、独立地参选,争取执政地位。按照执政党的数量和层次,可分为单独执政、联合执政和地方执政三种样式。

(一) 单独执政

单独执政是指在大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政党独自掌握国家行政权力,自行决定政府的组建原则和内阁成员,并主要由本党成员担任政府要职。如果执政党在下次大选中失利,必须让位于赢得选

收稿日期: 2024-05-11

项目基金: 吉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资助项目(JJKH20241182SK); 吉林省公安厅公安理论及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新时代‘枫桥经验’对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启示与实践”(LLRKX02-2023); 2024 年度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计划“从 ChatGPT 到 Sora——生成式 AI 浪潮下强化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路径研究”(2024JQY-105)

作者简介: 康喜彬(1986.11-),男,汉族,河北省南皮县,吉林警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举的其他政党，实现执政与非执政的转换。需要注意的是，单独执政并非在所有西方国家都以相同方式进行，政党竞争受到民主原则、选民意愿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权衡制约。

英国是长期实行两党制的议会制国家，执政党地位由下议院议员大选结果中获得多数席位决定。其主要特点有：1. 一党单独组阁，内阁成员的全部或大多数都是本党议会领袖或资深议员；2. 执政党领袖虽然由党内选举产生，但往往是党内派系斗争和妥协的产物；3. 党内派系斗争对执政具有一定牵制作用；4. 党内压力通过任用各派实力人物担任阁员，实现政治平衡，缓和党内矛盾，保持执政党的一致性。美国两党制不同于英国之处在于实行总统制。政党执政地位取决于总统选举而不是议会选举，即使总统所属政党在国会中是少数党，也是全国的执政党。其主要特点有：1. 执政党地位的确立由总统选举结果决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即为执政党，反之则为在野党；2. 执政党的领袖即总统行使组阁权。当选总统的任务首先是进行组阁，一是政府各部领导人及其机构，二是总统直属办事机构；3. 执政党包揽政府职位。新任总统在组建新一届政府时，主要任命党内的领导骨干、实力派人物，以及在选举中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人；4. 两党竞争形成“四党政治”格局。民主党和共和党中无论哪一个政党上台，都不可避免地分为“总统派”和“国会派”，各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从而形成“四党政治”格局。

受“单独执政”体制影响，政治权力过度集中是其主要不足之处。执政党独立决定政府组建和内阁成员，这可能导致政府决策偏向于维护执政党的利益，而忽视其他政治力量的监督和制衡。反对党在这一体制下难以有效履行对政府的监督职责，增加了权力滥用和腐败的风险。此外，单独执政制度缺乏足够的制度弹性，对于社会变迁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响应能力较弱，导致政策的保守性和缺乏创新性，难以有效解决复杂的国内外挑战。

（二）联合执政

联合执政是指在议会选举或总统选举中，当领先的政党未能获得绝对多数票时，两个或多个政党可以联合组建政府。这种政治模式旨在通过合作形

成多方合力，以有效地管理国家事务和推动政策实施。联合执政往往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无论政党规模大小、实力强弱，它们都希望单独执政，以便更好地推行自己的纲领政策，维护和实现本党的利益。一般情况下，实行两党制的国家很少出现联合执政的情况。但在多党制国家，由于政党众多，力量分散，即使几个政党相对强大，也很难有一个政党能够在总统选举中取得绝对优势或在议会中获得法定多数席位来独立执政。因此，通常是几个观点相近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经过协商达成一致后联合组建政府，实行联合执政。例如，在德国，执政党地位通常是通过大选中获得较多议席的政党与几个意见相近的小党联合组成政府。而在法国，执政党地位由总统选举结果决定，通常是几个政党经过谈判、讨价还价后联合推选总统候选人。

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联合执政类型，即瑞士委员会制。瑞士联邦委员会由7名联邦委员组成，其人选由参加政府的政党提名，并经各党、各州反复协商，最后由联邦议会选出。按照惯例，参加政府的激进党、社会党、基督教民主党分别选出2名，中间民主联盟选出1名。这一比例大致反映了各政党在联邦议会中的席次，但是政府更迭或政府成员的易人不因议席变化而变化。根据瑞士法律，联邦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委员之间权力平等，互不从属，联邦委员会主席由各委员轮流担任。

在联合执政体制下，尽管旨在通过多方合作有效管理国家事务和推动政策实施，但联合执政通常需要不同政党之间进行复杂的协商和妥协，导致政策制定过程的延迟和效率低下。此外，联合组建政府的政党代表不同的选民利益和意识形态，政策执行时面临权衡和妥协，难以有效推动深化改革或应对紧急局势。联合执政也可能因为不同政党之间的合作关系和利益平衡随时增加政府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影响政策的长期连续性和执行效果。

（三）地方执政

就西方政党执政的一般含义而言，政党执政通常指掌握了国家最高层次的行政权力，而不一定包括地方各级政府。在当代西方政治实践中，中央和地方行政权力由不同政党掌握的情况较为常见。因此，地方执政是指政党没有获得国家政权，但在—

些地区拥有执政地位，这也可以看作是竞争性政党结构下的第三种执政类型。

比如，在美国的联邦制下，国家总统的党派归属与各州和城市政府的党派掌权并没有必然联系。通常情况下，共和党的总统当选后，可能有很多州政府由民主党控制；而当民主党的总统当选时，也可能有很多州政府由共和党控制。在英国，尽管实行单一制，但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并非由中央政府任命，而是通过地方选举产生。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党派掌权往往是相对独立的，可能由不同的政党掌握。此外，还存在一些政党虽然是全国性政党，但从未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而仅在特定地方执政的情况。例如，印度共产党在西孟加拉邦等地相对稳定地获得多数选票，并在地方层面执政。意大利共产党在中央政府中长期处于在野党地位，但仍稳定地掌握着一些城市和地区的政府，从事地方执政。

总的来说，这些情况展示了地方自治和多元政治的原则，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选民在不同层级上的政治偏好和支持，但由于地方政府掌握局部行政权力，其政策执行可能与中央政府的整体发展战略不一致，权力分散导致治理效率低下和政策协调困难。地方执政的分散性也可能导致资源配置不均衡和地区发展差异加大，一些地方因此长期陷入经济困境或社会问题难以解决。此外，地方政府由竞争性政党掌控，会出现政党轮替频繁、政策变动较大的情况，影响长期治理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二、当代西方竞争性政党结构的制度效应

当代西方竞争性政党结构，在长期演化的过程中已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其运作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既确保了资产阶级政党始终掌握政权，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同时又在客观上通过周期性的竞选机制的压力增强了资产阶级各政党的局部活力。正如罗伯特·A·达尔所言：“允许给党派和利益集团的独立程度是现代民主制度使自己不仅区别于独裁主义制度，而且区别于象威尼斯那样更早时期的共和国一种特征。数世纪以来一直被

认为是共和国的致命毒药的宗派精神，在现代民主制度中，在党派和利益集团里已变得制度化了。”^[1]从客观效果上看，这种制度化的竞争性政党结构至少产生了以下制度效应。

（一）政党竞争机制，要求政党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和政策水平

“政治发展就是政治体系自身具有自我变革的能力”^[2]。政党之间的竞争能够扩大选民的选择机会和选择空间，政治竞争的激烈程度与政党对选民的依赖程度成正比。当政治竞争激烈时，政党需要更多地关注选民的需求和利益，以吸引选民的支持。作为执政党，只有不断适应时代和社会的新变化，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和超越，才能及时应对社会发展的需求，回应公众的利益诉求；只有敏锐地察觉公众的声音，通过制定政策和提供解决方案来满足人们的期望，这样才能获得选民的支持，并在政治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亨廷顿在谈到政治体系制度化这一问题时曾指出：“一个组织或程序的适应性越强，其制度化的程度就越高；反之，适应力越差、越僵化，其制度化的层次就越低。通常来讲，每个组织都是为行使某种特定的功能而创立的。当不再需要这种功能时，具有这种功能的组织便会面临危机：它要么找到一种新的功能，要么只能苟延残喘、坐以待毙。”^[3]一个善于适应环境变化、几经功能变更而继续发展的政党通常是一个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政党。这样的政党能够不断吸收社会各个群体的新要求、新关切和新期待，将其转化为政策和行动，以满足选民的需求。在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下，选民能够以投票的方式选择他们认为具有变革能力的政党。政党之间的竞争促使自身不断改进和创新，以获得选民的支持和信任。而那些在时势面前缺乏应变能力政党，在政治交换市场上便成为落伍者或失利者。处于竞争关系中各政党，要不断地提高自身制度化水平，不断地增强自身的适应性、创新性和灵活性才有出路。

政党竞争机制虽然有助于提升政治制度的活力，但也导致了政党间竞争的过度政治化，使政策制定更注重选举周期内的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发展规划和长期社会利益。激烈的政治竞争使政党更倾向于强调差异化的政见，而非寻求共识和整合各

方利益。政党之间缺乏建设性的合作，政策实施的连贯性和稳定性受到威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方政党实践中，选举策略和宣传内容已严重偏离事实真相，导致公众信息的不对称和政治信任度的下降，以至影响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

（二）定期的竞争性选举，作为一种选择机制具有“择优”“汰劣”功能

在竞争性政党结构下，定期选举确实是民众选择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的过程，因此可以被看作一种“择优”的过程。选民会根据自身利益、期望和要求来选择最能代表他们的政党。但这种“择优”过程通常是通过试错的方式实现的。当执政党出现政策失误、政治丑闻、重大事故或腐败问题时，会丧失选民的信任和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党有机会表现出自身作为民众利益、愿望和要求代表的形象，与执政党对立，以获取选民的支持，从而在定期选举中实现权力转移。这就展示了竞争性政治市场中的“择优”“汰劣”的特点。这种权力的转移可以通过选民的选择来体现，在形式上保障了政权的公正和政治体系的稳定。

尽管定期的竞争性选举作为一种选择机制，在保障民众利益、政治体系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择优”与“汰劣”的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选举过程往往受到金钱政治、媒体操控和选民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导致选举结果不完全反映民众的真实意愿。其次，选举周期固定，可能使得政策制定和实施缺乏连续性，特别是在需要长期规划和稳定执行的政策领域。再者，竞争性选举可能加剧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使得不同政见之间难以达成妥协和共识，影响国家治理效率。最后，选举竞争中的负面竞争手段，如诽谤、攻击对手等，可能损害政治生态，降低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度。

（三）合法并存、公开竞争的政党格局，达成了动力机制与制衡机制的统一

在竞争性政党结构下，执政党和在野党都需要从社会中获取支持和动力，而赢得选民的心意是获得执政地位的主要途径。政党之间的对立以及选民选择政党的自由使得各政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这种竞争压力可以成为动力，激发政党的活力和创造力。同时，如果将执政党、在野党和社会民众放

在平等互动的位置考虑，可以看到政党与社会民众之间的政治代表关系是变动的，形成了相互制衡的机制。在规范的竞争机制下，社会民众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越来越明显，他们对作为政治代表的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监督和制约作用也越来越强。这种相互制衡的关系促使政党更加注重民意和选民的需求。因此，政党需要认真倾听社会的声音，并根据选民的需求和利益来制定政策和改革方案。如果政党无法满足选民的期望，选民将会在选举中对其进行制约。

合法并存、公开竞争的政党格局虽然在理论上有利于动力机制与制衡机制的统一，但在长期实践中，竞争压力可能促使政党采取极端立场或煽动性言论以吸引选票，加剧社会分裂与对立，损害社会和谐。再者，复杂的政治竞争环境可能增加政治腐败的风险，如金钱政治、利益交换等现象，影响政治清廉与公正。此外，公开竞争要求高度的透明度和媒体监督，也可能导致政治议程被媒体偏好或特定利益集团所左右，影响决策的公正性和全面性。

三、当代西方竞争性政党结构的运作情势

在分析考察当代西方竞争性政党结构的运作情势时，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外，我们更应从当代西方竞争性政党结构中的地位从属、复杂关系和宪政规范等因素来考量。就当代西方执掌和参与政权过程中各政党之间的竞争关系而言，其基本运作情势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政党竞争是在宪政框架内的“有序竞争”

在当代西方政党政治条件下，各个政党并非对立敌手，而是在承认、支持和共同保护现行宪政体制的基础上进行“有序竞争”，这也是当代西方政党获得合法地位的前提。在多党共存的格局下，各个政党在法律上享有平等地位，并且理论上都有机会争夺执政权。这种制度确保了政党之间的“有序竞争”，使得不同政党代表有机会参与国家的决策和治理。对于哪个政党执政，哪个政党在野，主要取决于它们自身实力的强弱以及在选举中获得的支持票数。政党是否能够取得执政地位，以及如何取

得执政地位,执政地位能够保持多长时间,或者失去执政地位的方式和过程,通常是党派间利益权衡形成的结果。换句话说,政党的执政地位是根据政党力量对比,在不同时期和环境下的变化,通过法律化和规范化的“有序竞争”实现的。政党之间的正常轮换实现了政党之间的“文明”相处和“合法”竞争。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取得是通过既定游戏规则来实现,这种制度保证了政党之间的参政平等和政权的和平传输。

(二) 政党竞争与政党合作“并行不悖”

在当代西方国家里,政党发展具有突出的多元化特点,政党与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多样的。其中,同一个阶级可能存在着多个政党,这也就隐含了政党之间可以通过结盟、合作的方式来争取执政权的可能性和实现利益最大化。实践证明,当代西方体制内的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既有对抗又有妥协、既有分歧又有共识、既有差异又有弥合、既有分化又有结盟,呈现出一定秩序下的矛盾运动状态。譬如,在北欧国家,尽管政党数量众多,但一些较大的政党往往能够合作组建稳定政府。在英国、美国等两党制国家,虽然存在两个主要政党之间为争夺执政权不择手段的情况,然而它们又能够保持必要的协调性。同时,这些两党制国家通常在排斥第三势力分享权力方面展现出高度默契的合作,这种合作旨在维护两大政党的主导地位。这些都表明了当代西方竞争性政党结构所蕴涵的“合作”特性。“竞争—合作”的政治运作机制,既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政党间的利益趋同,同时还以一定的妥协保证了各阶级利益的共同增长,并在客观上推进了社会的政治异化。这也是当代资本主义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潜能的重要原因。

(三) 政党竞争的实质是在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前提下争夺执政权

从一般形式上讲,在维持现有宪政基础上,政党之间的竞争必然是适度的、有限的,其竞争主要是执政权的争夺,而政策主张或者分歧往往成为次要的。对比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动态表现的政党竞争,相对于争夺执政权,其政策、行动均以“实效”为转移。无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各政党的政策与立法的趋同现象,已成为战后西方

政党政治的显著特点。这种情况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争夺执政权的关键在于赢得选民手中的投票,因此各政党通常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对待选民,只要某项政策能够为本党争取选票,就可以被采用。在这种实用主义的竞争取向,虽然表面上确保了政党的选民吸引力和政权的稳定性,实际上却可能导致政策的表面化和空泛化,忽视了对社会长远利益的考量。因此,尽管西方政党竞争声称以政策为导向,但其背后的实质往往是为了维护特定利益集团的统治地位,这种虚伪性削弱了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阻碍了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比较优势显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4]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演化的结果。在对当代西方竞争性政党结构分析、借鉴的过程中,要避免陷入西方政党研究范式和叙述逻辑的“泥沼”,不能将西方的政党逻辑套用于中国政党政治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已经坚定地走过了百年奋斗历程,书写了辉煌的发展历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智慧。这一制度以团结、民主、和谐为基本精神,通过广泛协商、科学决策的运行机制,不仅在政治体制上体现优势,更在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效能上展现了深远意义。它有效地实现了人民民主的真谛,即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通过合作、参与、协商的方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在政治决

策上相较于西方政党实践体现了优势，更在广泛代表性、奋斗目标的一致性和科学决策施策的有效性上，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有益参考。我们要善于总结中、西方政党结构的成功实践，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建设理论，不断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党制度和党的建设规律。在充分尊重和利用中国特有的历史传统、文化底蕴、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持续推动政治制度的创新，确保其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未来，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更好地服务人民、推动国家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罗伯特·A·达尔. 多元民主的困境 [M]. 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29.
- [2] 王沪宁. 比较政治分析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41.
- [3] 塞缪尔·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15.
-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86.

【责任编辑：余伟】

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的四重审思

张龙华¹, 张倩²

(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4; 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4)

摘 要: 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严重破坏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但任何形式的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都离不开渗透主体、渗透客体和渗透介体这三个核心要素的相互作用。为了更好防范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 从谁来渗透、渗透给谁、如何渗透三个维度, 对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的主体、客体、介体进行辩证审思; 再从何以应对这一维度, 审思高校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对策。当前, 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的主体主要为境外宗教组织和境外敌对势力等; 客体主要包括高校大学生、专任教师和管理服务人员; 介体画像多样, 呈现三个特点。高校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对策是构建对渗透主体的精准识别机制, 加强对渗透客体的系统深入教育, 完善对渗透介体的综合监管体系。

关键词: 高校; 境外宗教渗透; 校园传教; 四重审思

中图分类号: B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3-0036-06

境外宗教渗透是境外团体、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从事各种违反我国宪法、法律、法规、政策, 企图与我争夺信教群众、争夺思想阵地、西化分化我国的活动^[1]。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与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许多境外宗教渗透势力把中国视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宗教信仰市场之一, 积极在中国传教布道, 以“宗教自由”之名行“宗教渗透”之实。高校是立德树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阵地。近年来, 我国高校愈发成为境外宗教渗透的重要目标, 高校中信仰宗教或受宗教影响的人数呈上升态势, 高校意识形态等领域斗争更加激烈, 高校反宗教渗透的压力与日俱增^[2]。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坚决抵御境外宗教渗透, 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3]。尽管境外宗教渗透“无孔不入”, 但任何形式的境外宗教渗透

都离不开主体、客体和中介这三个核心要素的相互作用^[4]。学界关于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的定性研究主要包括相关概念界定、价值阐释、特征分析、问题探讨、对策建议和机制构建等^[5]; 定量研究主要是对在校大学生宗教信仰情况、宗教了解程度、宗教认同态度和宗教政策认识等调查分析^[6]。相关研究为我国高校防范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提供重要参考, 但一定程度上存在主体研究重国外轻国内、客体研究重学生轻教工、介体研究重显性轻隐性等问题, 用辩证的眼光系统剖析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主体、客体和介体关系的研究较少。鉴此, 用全新的视角审思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的主体、客体和介体, 并针对性探索高校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应对之策, 牢固树立高校师生员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引导高校师生员工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

收稿日期: 2024-06-01

基金项目: 2020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思政专项项目“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进宿舍的理论逻辑与育人模式实践路径”(2020SJB0065); 2022 年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辅导员工作研究委员会专项课题“支部建在公寓中: 大学生党团组织育人的路径和机制创新研究”(22FYZD005); 2022 年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统战研究课题“高校防范和抵御宗教渗透的挑战及对策研究”(2022TZ010)

作者简介: 张龙华,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 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张倩,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工程学院讲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可靠接班人十分重要与迫切。

一、谁来渗透: 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的主体审思

宗教渗透功能强大, 向外传播欲望强烈, 常会成为不同社会、思想、文化和政治角力的工具。境外宗教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 既有正常的宗教交流, 也有宗教渗透。当前, 境外宗教渗透进我国高校的主体构成复杂多变, 主要包括境外宗教组织、境外敌对势力等。

(一) 境外宗教组织的直接渗透

境外宗教组织是对我国高校进行宗教渗透的主体之一。这既源于宗教的历史源远流长, 宗教的产生与人类的认知相互依存, 宗教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互关联, 宗教领域内的历史矛盾与现实问题相互交织, 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相互交错。宗教的特质决定它与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教育、民族等密切关联^[7]。这又源于宗教想要长久存在, 需要不断世俗化和向外扩张, 需要不断对外宣传宗教思想、扩大宗教影响、争夺信教群众、赢得信徒支持、引导信徒传教等, 以维护自身长远利益^[8]。因此, 我国同样是境外宗教组织竞相争夺的宗教信仰市场, 我国高校师生员工自然成为境外宗教组织渗透的对象。

诚然, 在尊重人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 宗教一定程度上可以为高校师生提供多元的文化认知与体验。但为了维护高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任何可能影响高校师生员工树立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宗教活动都需要谨慎对待。无数事实也证明, 我国高校反宗教渗透进校园的必要性。例如, 境外宗教组织指使国内一些教会与宣教团体发起“福音传回耶路撒冷”、高校师生团契等运动, 一段时间内产生广泛影响, 成功吸引大众眼球, 起到了在我国进行宗教渗透的目的。再如, 国内一些和境外宗教组织密切关联的新天地教会、上帝的教会、耶和華见证人、宣教中国2030等基督教渗透组织, 通过广宣教义、广招信徒、广传福音等方式进行非法宗教扩张, 积极吸引我国高校师生员工参与他们的宗教活动, 成为他

们的宗教信徒。境外某些天主教、伊斯兰教及其他宗教组织也不甘示弱, 通过派遣职业传教士在我国传教, 强化对我国国内宗教团体的影响控制, 巧立多种高校公益资助项目等, 精准对我国高校师生员工进行宗教渗透^[9]。

(二) 境外敌对势力的间接渗透

目前, 境外敌对势力是对我国高校进行宗教渗透的强大主体。这些境外敌对势力构成多元, 包括但不限于境外某个国家或团体组织、隐藏于宗教组织内的外籍教职人员或外籍宗教活动家、境外敌对势力的某些政要与知名人士、境外“三股势力”相关成员等。境外敌对势力长期致力于黑化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伟大实践, 恶意抨击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方针政策, 混淆高校师生视听, 试图利用宗教渗透进校园动摇高校师生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与政治选择, 争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人才资源, 培植与煽动反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员力量, 破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总体安全稳定的基石。对我国高校进行宗教渗透一直是境外敌对势力西化、分化、遏制中国崛起的一个战略部署^[10], 由美国政治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撰写并通过多次修改沿用至今的《十条诫命》就是有力证明。美国发布的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 经常无端指责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宗教信仰状况, 恶意把中国列为需要重点关注的宗教破坏国家。大国竞争与世界之变, 更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高校实施宗教渗透的力度空前。

此外, 境外敌对势力还与境内潜藏很深的达赖集团以及伊斯兰教等宗教极端势力同流合污, 利用对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或高校之中的少数民族人员进行非法宗教渗透, 大搞民族分裂活动, 破坏我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校园安全稳定。再如, 境外敌对势力与境内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沆瀣一气, 大肆开展反共反华宣传, 破坏党和国家在高校师生员工中的伟大形象, 扰动高校师生员工的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 阻碍高校师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等。这都警醒我们不仅要高度重视境外敌对势力宗教渗透进高校, 而且要高度重视境外敌对势力与境内宗教极端势力“里应外合”, 对我国高校立德树人工作所造成的严重影响。

二、渗透给谁：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的客体审思

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的目的之一就是与我争夺群众，抢占高校育人阵地，颠覆高校师生员工的思想价值观念、西化分化我国等。因此，高校中的青年大学生、专任教师和管理服务人员，无一不成为境外宗教渗透势力腐蚀拉拢的对象。

（一）高校大学生是境外宗教渗透的主要对象

贯彻“育苗计划”，加大向我国青年群体的渗透力度，与我争夺下一代，一直是境外宗教渗透的重要策略。众多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的案件说明，青年大学生已经成为当下境外宗教渗透的主要目标群体^[11]。随着国际社会出现“宗教回潮”，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愈发猖獗，大学生在校期间遭遇到境外宗教渗透的人数增多^[12]。身处物质生活丰富化、信息获取便捷化、社会思潮多元化、力量博弈复杂化的新时代，大学生的自我认知、思维范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群体特征也发生诸多新变化。高校大学生虽然成人但并不意味着成熟。他们大都思想理论学习不够深入，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不足，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对未知世界有着强烈的探求欲望，对未来人生规划也最容易感到迷茫，所具有的人生信仰、政治选择、价值取向等仍未最终定型，已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仍然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对高校大学生进行宗教渗透往往“成本低廉”又能“立竿见影”。这让境外宗教渗透势力多渠道向高校大学生进行针对性的宗教渗透^[13]，以达到扭曲青年大学生的政治信仰和价值取向、操纵高校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破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后备力量等险恶目的。

（二）高校专任教师是境外宗教渗透的重要对象

近年来，高校中的专任教师成为境外宗教渗透的重要目标群体。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高校专任教师的一言一行会对他人，尤其是对青年大学生产生深远影响。对高校专任教师实施宗教渗透，在高校教师中培植亲西方势力，削掉中国人才培养的“金字塔尖”，一直是境外宗教渗透进校园的重要手段。

和青年大学生相比，高校专任教师的政治倾向、思想观念、社会阅历、人生经验等更为成熟，具有反境外宗教渗透的一定优势。但是，随着高校加大开放办学力度，高校教师参与国际交流合作、接触国外文化、出国访学等人数逐渐增多。这让高校专任教师特别是新入职的年轻专任教师，在丰富知识、拓宽视野、深邃思想、增强本领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给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找到新的“机遇”。尤其是我国高校中具有长期海外留学或访学经历的青年专任教师群体，他们在对国内外不同世情国情党情校情的深度认知、亲身感悟和现实对比中本来就容易产生二元分裂。加之，境外宗教渗透势力潜移默化的“思想洗脑”与手段多样的“威逼利诱”，更容易让具有海外研学经历的高校专任教师偏听偏信不实信息，感染“暗黑文化”，影响自己的主观判断和思想观念，不慎落入境外宗教渗透势力的陷阱，成为境外宗教势力在中国高校实施宗教渗透的帮手。这既腐蚀了我国高校专任教师自身理想信念和正确“三观”的树立，更会把境外宗教渗透的不良影响传递给国内的高校大学生和其他群体，进而扩大了境外宗教渗透进我国高校的整体破坏力。

（三）高校管理服务人员是境外宗教渗透的必要对象

我国高校中的管理服务人员是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重要力量，是“三全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人生信仰、思想观念、价值操守、人格形象、举止行为对高校反境外宗教渗透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利用宗教渗透拉拢我国高校基层管理服务人员，松动高校日常管理服务工作，是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松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随着我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不断深入，高校中管理服务人员的构成也越来越复杂。他们的政治面貌情况不一、学习生活工作情况各异、人生信仰不尽相同。部分高校中思想认识水平较低、法律意识淡薄的管理服务人员，错误地将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等同于可以在高校自由开展宗教活动，不会受到法律约束。甚至有个别高校中的管理服务人员在被境外宗教渗透势力成功“洗脑”后，利用职务之便在大学生宿舍、教学楼宇中发放印有宗教色彩的宣传单页等，开展校园传教活动，成为境外宗教渗透

进校园的帮凶。还有部分高校管理服务人员在贯彻民族宗教政策的过程中本就缺少工作经验, 存在畏难心理, 常有“不愿讲、不好讲、不敢讲”等现实情况。如果他们再被境外宗教渗透势力所侵蚀蛊惑, 就会在高校反境外宗教渗透的过程中放松要求或充当“保护伞”, 最终对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放之任之。

三、如何渗透: 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的介体审思

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的切入点非常精准, 渗透手段多样且不断变化, 具有很强的计划性、针对性、隐蔽性。这就要求我们需要对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的介体进行全面扫描画像, 掌握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传播介体的主要特点和一般规律。

(一) 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的介体画像

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的介体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具体主要有: 一是通过发放宗教经书、单页、手册、信件、明信片、小礼品等实物, 吸引高校师生的眼球和注意力进行校园宗教渗透; 二是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电子邮件、新媒体平台等数字传媒技术, 植入宗教内容、炒作宗教话题, 强化宗教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进行校园宗教渗透; 三是利用高校文化互鉴、学术讲座、人员交流、合作办学等活动宣传宗教思想, 影响高校师生的思想价值观念进行校园宗教渗透; 四是以各种基金项目、捐资助学、主题培训、节日派对、团建辅导、高薪兼职、语言学习等手段引诱欺骗高校师生, 博取高校师生的好感与支持后进行校园宗教渗透; 五是通过专职宗教教职人员或信徒的“现身说法”, 披着自由主义与普世价值的外衣进行校园宗教渗透^[14]; 六是通过礼金贿赂、溜须拍马、免费消遣娱乐等“糖衣炮弹”, 腐化利诱高校师生“为我所用”进行宗教渗透; 七是用权术、计谋拿捏高校师生的弱点和把柄, 胁迫高校师生参与校园宗教渗透; 八是先对高校师生的亲友进行精准“宗教洗脑”, 再间接通过高校师生的亲友影响高校师生本体的思想与行为, 最终实现校园宗教渗透; 等等。

(二) 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的介体特点

综合来看, 当前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的介体花

样繁多、特点鲜明。一是线上与线下并举。过去传统的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多是人对人、面对面的线下实地宣教传教, 宗教渗透的群体、场地、规模、影响等受到一定限制, 但“一对一”宗教渗透的效果明显、成功率高。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 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广度更大、宗教渗透危害更高。线上直播夹带宗教信息、线上交流互动宣传宗教信息、线上广告植入宗教信息、线上游戏影射宗教信息等, 成为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的惯用伎俩。二是校内与校外并行。在高校内部, 境外宗教渗透势力费尽心机打着公益活动、交流互动、资助帮扶等名义, 利用高校中的学生信徒、外籍教师、专家学者等进行校内秘密传教。在高校外部, 境外宗教渗透势力以高校周边租借的场地或就近教堂会所为据点, 利用各种手段诱导高校师生员工前去参加宗教活动, 实施宗教渗透。有的境外宗教渗透势力甚至不惜花费重金, 通过邀请高校师生员工出国访学、国外旅游等方式, 费尽心机实施宗教渗透。三是显性与隐性并重。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需要通过显示方式宣传教义、招揽信徒、扩大影响。但是, 随着高校反宗教渗透的力度越来越大, 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也“改弦易帜”, 积极更换渗透方式、隐蔽联系渠道、隐藏真正意图, 在暗处开展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隐性宗教渗透, 加大了高校反宗教渗透的难度。

四、何以应对: 高校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对策审思

我们在审思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的主体、客体和介体时, 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充分认识到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主体、客体和介体间的辩证与统一关系。他们不是绝对割裂和完全孤立的关系, 而是可以相互依存和转化, 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15]。例如, 被境外宗教渗透势力影响的高校师生在校园开展传教活动时, 他们的身份就由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的客体转变成为实施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的主体, 同时他们也成为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的介体之一。因此, 面对复杂多变的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 需要准确把握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主体、

客体 and 介体的动态变化,在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中优化应对之策。

(一) 构建对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主体的精准识别机制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对“敌人”和“朋友”进行精准识别,是我国高校反境外宗教渗透进校园的首要问题。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高校要坚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从战略高度认识到反境外宗教渗透进校园的重要性。高校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协调好党委统战部、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保卫处、教务处、人事处、国际交流中心、后勤服务部门、各群团组织及二级学院等组织部门,打造多元化、专业化、科学化、协同化的反境外宗教渗透进校园工作队伍。要统一谋划,明确高校各组织部门和具体成员在反境外宗教渗透进校园工作中的使命任务、职能边界、分工合作,形成对境外宗教渗透进校园主体精准识别的顶层联动机制,发挥好高校顶层设计在反校园宗教渗透中的“主心骨”作用。

二是强化“主体作用”。高校要跳出过去呆板的自上而下、层层下压的单一线性反境外宗教渗透进校园的工作模式,充分意识到高校青年大学生和教职员工在反境外宗教渗透进校园中的“主人翁”作用。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主题培训等方式方法,积极调动高校广大师生员工识别、抵制、举报、处置境外宗教渗透进校园的综合能力和主观能动性。在发动师生群众、组织师生群众、依靠师生群众中,进一步夯实高校对境外宗教渗透进校园主体的甄别、预警、监察与处理机制。

三是强化“外部合力”。高校反境外宗教渗透绝非一日之功、一人之力,需要久久为功,多措并举。高校要持续密切与上级主管部门、其他院校组织、政府安保部门及宗教管理部门等的沟通交流与紧密合作,构建多方共商共建共享共防的反境外宗教渗透进校园的长效机制。高校要善于汇聚多方力量,不断丰富反境外宗教渗透进校园多方联合协同创新的“统一战线”组成,及时破解境外宗教渗透进校园主体的新构成、新伪装、新动向,在动态优化中更好落实反境外宗教渗透进校园的工作任务。

(二) 加强对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客体的系统

深入教育

高校反境外宗教渗透从根本上说还是要做好人的教育工作。要不断提升高校师生员工的法制意识和思想政治觉悟,强化校园文化和文化校园建设,引导高校师生员工正确看待宗教问题,增强高校师生员工抵制境外宗教渗透的本领和担当。

一是加强校园普法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1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我国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17]。《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学校进行宗教活动^[18]。《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指出在我国高校内严禁进行传教及宗教聚会等活动^[19]。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强调高校必须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决抵御境外宗教渗透,防范校园传教活动^[20]。因此,高校可通过校园普法专题教育月、校园安全讲座、主题推文等形式,大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用好法律武器反境外宗教渗透进校园。

二是加强校园思想政治教育。高校要发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育人作用,通过“第一课堂”教育师生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要广泛开展正能量充沛、主旋律轩昂的校园“第二课堂”育人活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进学生公寓、进办公楼宇、进民族餐厅等形式,在贴近师生生活实际、锻炼师生意志品质、解决师生实践困惑中,引导高校师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热爱美好生活、投身强国伟业。高校要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员全程全方位开展高校师生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工作,强化高校立德树人工作实效,用好思想武器反境外宗教渗透进校园。

三是加强校园文化涵育。高校要通过校园文化和文化校园建设,强化校风校训、师德师风、教风学风建设,加强对校内师生的人文关怀,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熏陶中培育高校师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用好文化武器反境外宗教渗透进校园。

四是加强赋能教育。高校要加强同校内外有关

部门人员的育人协同, 线上线下通过境外宗教渗透进校园的主题宣讲、典型案例分享、专题警示教育、应急处突培训等, 有计划、有重点地持续增强高校师生员工识别、防范和应对境外宗教渗透进校园的斗争本领, 用好“看家本领”反境外宗教渗透进校园。

(三) 完善对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介体的综合监管体系

完善对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介体的综合监管体系, 切断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传播链条, 堵住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的常用切入点同样不可或缺。

一是完善对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数字网络介体平台的综合监管体系。万物互联时代, 抖音、微信、QQ、网页、广播、电子书、线上直播等媒体平台已经成为境外宗教势力实施宗教渗透的重要媒介。高校要成立具有较强网络监管能力的融媒体中心, 强化对校园多种数字网络平台的内容审核、信息发布和日常舆情监管, 确保校园数字网络空间的风清气正, 不给境外宗教渗透进校园以可乘之机。高校要加强同政府网络监管等部门的长久联系和监管技术能力的持续升级, 及时发现和切断境外宗教渗透势力通过大众网络渠道或其他非法线上渠道进行校园传教的情况, 共同呵护好健康文明的校园网络环境。

二是完善对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线下介体平台的综合监管体系。高校要发挥师生群众的群策群力作用, 优化校园传教的动态监管和实时举报等机制, 强化对校园发放宗教宣传单页和读物的跟踪监察; 要连同有关部门及时清除境外宗教渗透势力为了进行非法传教而设置在校园内部或校园周边的“根据地”; 要严格在校园举办的线下学术讲座、文化交流、公益服务等活动的审批、中途监督和事后跟踪, 多措并举堵住境外宗教渗透进校园的惯用渠道。

三是完善对高校特殊人员群体的严管与厚爱。高校对有宗教信仰的师生员工要依法划定“红线”, 在尊重他们合法宗教信仰的同时, 要明确禁止他们在校园开展宗教活动、参加非法宗教集会和进行校园传教。对没有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群体师生、困难群体师生、外籍人员群体师生和境外留学访学群体师生, 高校要强化对他们的重点关注、指导帮扶和人文关怀, 及时了解他们思想动态和学习生活等

情况, 纾解他们的现实困难, 强化他们反境外宗教渗透的教育引导, 关注他们的一言一行, 谨防他们被境外宗教渗透势力所蛊惑, 成为帮助境外宗教渗透进高校的助手。

参考文献:

- [1] 国家宗教事务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学习读本 [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4:70.
- [2] 卢建华, 林怀艺.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我国高校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的现状、反思与机制构建 [J]. 科学与无神论, 2022(04):42-50.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170.
- [4] 张桥贵. 云南跨境民族宗教社会问题研究 (之一)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39.
- [5] 杨延圣, 郑斐然. 境外宗教渗透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J]. 科学与无神论, 2021(02):30-36.
- [6] 于光胜, 石明霞. 新时代大学生宗教信仰的特点及防范机制探究 [J]. 理论观察, 2021(12):162-164.
- [7] Jawad Rana, B é land Daniel, Pavolini Emmanuele. Introduction: Populism, Religion and Social Policy [J]. Social Policy and Society, 2021, 20(2).
- [8] 杨延圣, 邢乐勤. 宗教渗透与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J]. 新疆社会科学, 2018(05):79-84+163.
- [9] 林怀艺, 林清龙.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反境外宗教渗透教育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9(09):131-136.
- [10] 林怀艺. 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开展“抵御渗透”探析 [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01):55-59.
- [11] 王康, 诸英, 陈剑. 当代大学生宗教认同的现状调查 [J]. 世界宗教文化, 2017(03):81-94.
- [12] 韩轶, 戴艳军, 张远航等. 当代大学生宗教观实证研究——基于大连地区八所高校的调查分析 [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32(01):76-82.
- [13] 黄爱萍, 余俊渠, 杜环欢. 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关于高校防范境外宗教渗透的思考 [J]. 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04):69-72.
- [14] Hjelm Titus. Mapping the Discursive Study of Religion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2020, 88(4).
- [15] 毕红梅, 谭江林.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问题的三重论域

-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1(06):24-30.
-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N]. 人民日报, 2018-03-22(001).
-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N]. 人民日报, 2016-02-23(023).
- [18]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zhengce/guizhang/202112/t20211206_585064.html.
- [19] 教育部, 外交部, 公安部. 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 [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0001/t20000131_81859.html.
- [20] 教育部等八部门. 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 [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2/moe_1407/s253/202005/t20200511_452697.html.

【责任编辑：温开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内容框架与时代特征

李文珍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我国“大一统”理念的文化底蕴、“一国两制”实践传承和港澳发展的现实需要, 针对港澳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重要论述彰显了党对“一国两制”实践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新的高度, 丰富了党治国理政的新经验, 为做好新时代港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重要论述完整擘画了新时代港澳工作系统科学的内容框架: 以推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为核心、以共同谱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标及以促进港澳地区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战略举措。

关键词: 港澳工作; 生成逻辑; 内容结构; 基本特征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3-0043-06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判断国际国内发展的新形势, 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 提出了新时代港澳工作的新思路、新理念、新举措, 为做好港澳工作和推动“一国两制”事业提供了根本遵循, 指明了方向。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 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其生成逻辑、内容结构与时代特征, 对于做好新时代港澳工作和推进“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源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厚植于中华民族“大一统”理念、承启于“一国两制”伟大实践、立足于推动港澳地区实现繁荣稳定的新需要。

(一) 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坚持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当社会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需要一种社会力量来缓和社会矛盾的时候, 国家就产生了。“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 就是国家。”^[1] 马克思在关于国家性质的论述中, 强调国家的阶级本质, 即国家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国家需要通过建立“秩序”来抑制阶级间的冲突与矛盾。就国家职能而言, 国家具有政治治理和社会治理两种职能。“国家职能都集中在阶级统治(政治统治职能)和对社会生活与秩序的管理(社会职能)上, 其实质都是国家阶级统治职能。”^[2]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 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体, 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日益凸现, 要实现这样的目的, 这就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 通过国家的主导来实现国

收稿日期: 2024-06-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与经验研究”(23&ZD031); 2024 年度广东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中山大学研究基地项目“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重要论述研究”(SYSUW202414)

作者简介: 李文珍(1973-), 女, 汉族, 黑龙江绥化人,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博士, 硕导, 研究方向: 港澳青年国家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家的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重要论述正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央政府在港澳工作中必须要积极发挥国家的治理职能,保证国家对香港和澳门的主权享有权和行使权。新时代的港澳工作要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机统一起来,为促进港澳地区的发展寻找新思路和新想法。

(二) 文化逻辑: 中华民族“大一统”理念的传承

“大一统”是中国发展之轴,是中国历史整体存续的基础与价值。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思想从以天地为宇宙中心的自然观不断发展到追求社会人文系统的和谐、一致和统一的理念。它不仅体现为中国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而且也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观念。“大一统”的国家治理表现在以中央权力为中心的“统一”的国家形态、政治形态和国家治理体系。“大一统”的文化表现在国人心中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和兼收并蓄的思想观念。我国在港澳工作中既要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又要不断促进港澳同胞与内地人民的心灵契合;既要加强对港澳的全面管治,坚决制止“港独”等分裂国家的行为,又要不断增强港澳同胞获得感、幸福感,赢得港澳同胞对国家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信念,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3]新时代,港澳工作需要铸牢“一国”之本,夯实中华文化之“根”。

(三) 历史逻辑: 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新发展

“一国两制”构想萌芽于新中国成立后西藏和平解放时的《十七条协议》,探索于毛泽东同志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纲四目”主张,形成于邓小平同志解决对香港、澳门恢复主权问题的谈判主张。邓小平提出解决香港、澳门回归问题应该主要抓关键的三个问题:主权、政策和过渡。他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个新事物不是美

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中国特色。”^[4]新时期,在“一国两制”的制度背景下,我国对香港和澳门顺利恢复行使主权,港澳地区实现了平稳发展。进入新时代,在面对新的世界变局和港澳地区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港澳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同时也是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5],必须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四) 现实逻辑: 港澳地区实现新的繁荣稳定的需要

十八大以来,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上,世界经济中心正从西向东转移,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发展迅速;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程度不断加深,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部分发达国家逆全球化而行,为中国的发展制造各种障碍。港澳地区的经济发展由于受着全球性金融危机及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呈下降趋势。受“西方化”影响的香港教育、文化和思想使部分香港青年对自身的身份认同迷茫,对香港发展的信心也有所下降,甚至出现“港独”苗头。面对这些新的问题与挑战,为了实现港澳地区新的繁荣稳定,我国需要不断完善港澳工作,推进港澳工作的法治化、系统化发展。针对新时代的港澳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6]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重要论述的内容框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重要论述的内涵极其丰富,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一国两制’伟大实践”这一主线,系统阐述了新时代港澳工作中的基本点、目标和战略安排等问题,构成了关于港澳工作重要论述的基本框架。

(一) 港澳工作的基本点: 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系列论述中，最核心的要点是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实现港澳地区新的繁荣稳定。

1. 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

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是坚持“一国两制”的前提和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在“一国两制”中要“始终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7]“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在现实生活中，部分港澳居民并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一国两制”，存在着对“一国两制”的认识偏差问题。针对这些错误认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关键是把握好“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特别行政区政府广泛团结社会各界，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8]“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9]

2. 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

“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应有之义，是“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坚实保障。早在《基本法》起草时邓小平就提出爱国者治港治澳的问题。“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10]^[74]“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不仅仅是政治伦理的要求，也是法律的要求，更是建立健全、发展完善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和制度必须遵守的根本原则。事实证明，没有“爱国者治港”的“港人治港”会严重威胁国家的主权、发展和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香港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再次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那就是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这是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事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11]选举制度的完善为“爱国者治港”的落实提供了制度和法律

上的保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样、不走形，也有利于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推进“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完善。

3. 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完善法制体系

港澳各项事业的成功实践是“一国两制”制度自信的来源。“一国两制”方针充分发挥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领导人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时，就坚信这个方针是对头的，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30多年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的成功举世公认。”^[12]他强调“‘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正在向纵深推进，大家要增强对‘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和实践自觉。”^[13]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需要完善“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建设。港澳工作必须坚持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治权，这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源头，同时中央充分尊重和坚定维护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14]完善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要完善“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问题。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15]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国两制”应该坚持什么、完善什么、如何完善的系列论述为港澳工作提供了系统的战略部署和制度设计。

（二）港澳工作的目标：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胸怀，擘画出新时代“一国两制”事业的宏伟蓝图。

1. 凝聚港澳力量，共担民族复兴历史责任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人民幸福。”^[16]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实现，需要充分发挥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港澳工作问题时始终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推进“一国两制”实践。“港澳同胞继续以真挚的爱国热忱、敢为人先的精神投身国家改革开放事业，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香港、澳门更好的发展，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篇章。”^[17]血脉相连的内地人民与港澳台同胞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香港、澳门与祖国内地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香港、澳门与祖国内地坚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需要港澳同胞与内地人民坚持守望相助、携手共进。”^[18]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彰显了我们要以中华文明凝聚港澳同胞的力量，共担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责任。

2. 港澳同胞在改革开放新征程中续作新贡献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香港和澳门在推进改革开放中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功不可没。在新时代新阶段，改革开放依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19]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港澳同胞凭借自身的优势和地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40年改革开放，港澳同胞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是受益者也是贡献者。港澳同胞同内地人民一样，都是国家改革开放伟大奇迹的创造者。”^[20]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香港、澳门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独特优势，仍然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21]“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港澳同胞大有可为，也必将带来香港、澳门新的辉煌。”^[22]在改革开放新征程中，港澳地区将进一步发挥其国际优势、制度优势和金融、管理、技术优势，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舞台上续写新的篇章。

（三）港澳工作的战略举措：支持港澳地区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转换给我国经济社会的

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港澳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充分抓住并利用这一战略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是香港、澳门探索发展新路向、开拓发展新空间、增添发展新动力的客观要求。”^[23]

1. 港澳地区要充分抓住国家“一带一路”等战略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港澳地区要充分利用良好的区位优势、“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等独特优势，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香港、澳门来说，‘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势，国家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舞台，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是新的重大机遇。”^[24]“一带一路”为港澳经济转型带来了新的机遇，也为港澳发挥自身优势提供了宽广的舞台。港澳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大有可为：能够利用金融优势加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资金融通，建成“一带一路”投资融资枢纽；可以利用国际自由港的优势打造国际贸易、航空和航运枢纽，建成“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枢纽；可以发挥东西文化共生共存，不同文明相互借鉴和融合的精神品格，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我国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支持港澳参与、助力国家全面开放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功能平台。”^[25]新时代，港澳工作需要在推进港澳与内地共建“一带一路”中为港澳发展提供更大助力。

2. 港澳地区以大湾区建设为新契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上极具特色的一流湾区。它是在“一国两制”的大框架下，更能体现各城市之间的协同特色。粤港澳大湾区是推动港澳地区融入内地发展大局的重要平台，在港澳地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重点，全面推进祖国内地同香港、澳门优势互补、互利合作。”^[26]粤港澳大湾区践行“协同发展”理念，体现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精神实质。在粤港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深圳前海合作区和珠海横琴合作区在粤、港、澳合作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要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加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27]、“进一步推动澳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围绕‘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目标定位，选准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主攻方向，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把握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做好珠澳合作开发横琴这篇文章。”^[28]这些新的实践创新了粤港澳大湾区深化改革的试验平台，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向新的高度，将有效地推进港澳地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彰显“一国两制”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

为了支持港澳地区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国也需完善港澳青年在内地发展的配套措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29]加强港澳青年的国家认同感更是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中之重。中央和港澳特区政府要引导港澳青年增进对国家的认识和认同，筑牢爱国爱港、爱国爱澳的中坚力量。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重要论述的时代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于新时代，结合当前港澳工作的新实践，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特征。

（一）彰显港澳工作中的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途中去定位港澳工作而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发挥港澳的独特优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一个中国意识为引领推动港澳地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香港、澳门与祖国内地坚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需要港澳同胞与内地人民坚持守望相助，携手共进。”^[30]港澳工作要从中华民族共同利益角度出发去做总体规划和布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家领导人为“一国两制”奠定了坚实的社

会主义制度基础。这是铸牢港澳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前提。新时期，国家领导人提出并运用“一国两制”完成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并推进了港澳地区的平稳发展。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根本利益所在。新时代，我国港澳工作又呈现出新理念、新举措、新格局。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环。“在实现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香港一定能够创造更大辉煌，一定能够同祖国人民一道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31]。

（二）彰显港澳工作的法治体系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将“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列为全党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标志着我国对“一国两制”的规律性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意味着我国港澳工作更加清晰、全面、系统。港澳工作的系统化最重要的体现是港澳工作的法治体系越来越健全。我国对港澳恢复行使主权后，作为中国整体法治一部分的港澳新法治必须适当体现国家法属性。在新时代，港澳地区必须完善包括人大释法权在内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才可能继续保障港澳的繁荣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重要论述为港澳工作的法治化发展指明了方向。一方面，他强调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明确厘清宪法与基本法是母法和子法的位阶关系，坚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在实现国家对港澳工作中的法治权威。这构成了“一国两制”的宪制秩序和法治体系。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32]《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通过是我国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法治体系的又一重大举措，是不断推进港澳地区依法施政的重大进步。

（三）彰显港澳工作中的家国情怀

在国家治理层面上，家国情怀表现为对人民利益的维护和对国家政权的拥护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重要论述彰显了港澳工作中强烈的为民、为国的深厚情怀。一方面，这些重要论述强调了改善民生是我国港澳工作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指出港澳工作要始终做到发展为了港澳同胞、发展依靠港澳同胞、发展成果由港澳同胞共享。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重要论述强调港澳工作的底线就是维护政权统一，反对分裂。习

近平总书记谈港澳工作时明确强调“坚持以人为本,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坚持发展的目的是为广
大市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采取更加公正、合理、普惠的制度安排,确保广大市民分享发展成果。”^[33]
同时,我国的港澳工作一贯强调要坚持国家主权的
原则和底线。这表明港澳工作既要保证港澳地区国
家安全又要推进港澳地区的长期繁荣稳定,彰显了
用稳定发展的办法下大力气解决港澳民生问题的信
心和决心。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
民出版社,2012:187.
- [2] 张有恒.“一国两制”构想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J].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04):31.
- [3]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
时强调[N].人民日报,2018-3-21(001).
-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8.
- [5][7][8][9][12][33] 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
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7-7-2(002).
- [6][15]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
社,2022:57/58.
-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4.
- [11] 习近平听取林郑月娥述职报告[N].人民日报,2021-1-
28(001).
- [13] 习近平会见中央驻港机构和主要中资机构负责人[N].人
民日报,2017-7-1(002).
- [14][31][32] 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N].人
民日报,2022-7-2(002).
- [15]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001).
- [16][26][2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001).
- [17]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N].人民日报,2021-11-17(001).
- [1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
社,2018:39.
- [17][20][21][22][23][24] 习近平.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
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
11-13(002).
- [18][30] 李寒芳.习近平会见梁振英崔世安[N].人民日
报,2013-3-19(001).
- [19]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
民日报,2018-12-19(002).
- [25]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N].人民日报,2021-03-
13(001).
- [27] 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2020-10-15(001).
- [28] 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澳门特
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
报,2019-12-21(002).

【责任编辑:陈童敏】

同心圆理论视角下网络意见人士的统战工作研究

蔡 伟

(中共湘潭市委党校, 湖南 湘潭 411100)

摘 要: 网络带来了一个更为开放的传播空间, 重塑了传播影响力的格局, 挣脱限制的意见人士在这里变成影响力不断崛起的网络领袖。网络意见人士作为网络社会的产物, 催生了一支社会精英“发声”群体, 不仅影响我国网络舆情走向、传播新的话语思想, 同时也将转变社会治理格局、推动网络问政的发展。本文以同心圆理论为分析框架, 从同心圆排序格局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入手, 探究两者的高度契合性, 并以此分类, 探究新时代网络意见人士的新变化以及面临的挑战, 提出基于“同心圆”理论的网络意见人士统战工作策略。

关键词: 网络意见人士; 同心圆理论; 精准统战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3-0049-06

中央统战部在官方解读中指出: 网络意见人士主要是以自媒体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内容制造者^[1]。这是一个覆盖广泛的群体, 涉及社会各个领域、行业、阶层, 是新时代互联网传播环境中的一支独特力量。“要加强和改善新媒体代表性人士的工作”^[2], 新媒体代表人士的主要成员即网络意见人士, 这是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政治同心的角度对中央统战工作提出的要求, 也是网络意见人士首次正式纳入我国统战工作的对象中。

一、同心圆理论与网络意见人士分类研究的契合性

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方针: “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 关键是坚持求同存异”^[3]。这个“同”和“异”,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了: “同”是指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 这是不可触碰的政治底线, 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爱国主义等; “异”是指保持多样性, 不能一刀切, 要包容审慎, 才能画出最大的同心圆。

(一) 同心圆: 排序格局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同心圆理论告诉我们, 只有牢牢抓住坚持党的领导, 坚守党的领导这个固定的圆心, 才能动员各族人民、各方政治力量沿着包容多样性的半径依次排开, 掌握基本的排序格局, 守住各族人民与各方力量与圆心的距离, 便能绘就出一副排列有序、结构平衡的同心圆图。延伸到网络空间, 网络意见人士无论从可能性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能在排序格局中找到对应位置。

同心圆理论的基本前提: 网络意见人士政治生活态度的多元分化特点, 这是理论上的可能性。网络是一个开放且自由的公共空间, 无论谁都可以随时进入、随时退出, 任何力量都无法独自霸占网络空间。网络上任何一条公开的政治信息可能都隐藏着发布者和讨论者个人的政治倾向, 他们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在网络公共区域宣传着多元分化的价值观, 无论你是赞同还是反对, 抑或是保持中立、漠不关心的态度, 都可能影响着我们对以后发生的政治性事件的判断。当众人视线转移到网络意见人士这一群体时, 排序格局会充分展现他们的政治立

收稿日期: 2024-04-10

作者简介: 蔡伟 (1988-), 女, 汉族, 硕士研究生, 中共湘潭市委党校讲师。

场和人格特征,在不断的网络传播中形成稳定的政治态度,最终累积形成一个个特色鲜明的、具有共同志趣的同心圆。因此,在网络公共领域中,网络意见人士政治生活态度的多元化特点和相对稳定性为网络统战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

同心圆理论的必要条件:主流价值观对于不同网络意见人士的吸引能力,这是现实中的真实性。

在网络公共区域,敌人与朋友的分别,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给了我们提示,以主流价值观为标准,认同的即为朋友,不认同甚至反对的则可能是敌人。从排序格局中来看,越靠近圆心的网络政治群体越认同我们的主流价值观,他们的政治立场更与我们相近,同心圆的圆心对其吸附作用更加明显。反之,距离圆心距离越远,甚至有背离圆心发展的网络政治群体,他们对主流价值观并不支持,甚至强烈反对。处于中间地带的网络政治群体,则需要加强引导和控制,才能越来越靠近圆心。这时候,法律和行政手段往往无法有效引领,依靠主流价值观对于不同网络意见人士的吸引能力,用同心圆理论来做统战工作,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二)同心圆理论与网络意见人士分类的高度契合性

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是同心圆理论的基本观点,我们在统战工作中需要协调不同群体的构成、不一致的思想认识、不同群体的功能作用。网络意见人士,就其群体构成的复杂性、思想认识的多样性、政治功能的强弱度,极其需要同心圆理论的科学指导。一是从群体构成看,对象特殊的多样发展需要一致性统一性来引导。网络意见人士不仅包含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农业领域的“发声”代表群体,也囊括工人、农民等基层人员代表,由于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领域,群体呈现复杂多元。怎样保持群体的同心同向力量,又能并存差异化、保留特色,这就要求同心圆理论既尊重群体的共同意见、又能保留部分个体的特色特征,以延长半径,整合最大的同心力量^[5]。二是从思想认识看,政治思想的多元趋势需要主流意识形态来引领。网络意见人士群体由于利益目标不一致、人员身份复杂,政治观点也不同每个人对于同一社会问题的思考方式、考虑视角不同,对主流思想意识不能完

全认同,这对国家治理和政治生活稳定不利。同心圆理论以明确的国家意识形态为主导,通过与圆心的距离来“丈量”网络意见人士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弱,分类加以引导,把握政治思想的多元化趋势。三是从功能作用看,社会舆论的健康发展需同心圆理论来正向作用。网络意见人士的强大舆论力量,对社会可能产生正向或反向的影响。一方面,利用网络意见人士强大的影响力可以帮助消除错误思想,澄清封建迷信,鼓励网民问政、参与社会治理,形成良好社会舆论风尚。另一方面,利用网络意见人士去吸纳同心圆中远离甚至背离的消极群体,加强正向群体建设,化解不良舆论在网络的扩散压力,这也是网络统战的关键。因此,利用同心圆理论,趋利避害,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健康发展。

(三)同心圆理论视角下网络意见人士的分类

1. 忠诚追随型。这一类型群体最靠近圆心,高度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世界里,越能吸附人心的往往具备很大的优越性,并且是心甘情愿的与其一起拥护所代表的主流观点。对于政治权利中心的圆心来说,他们也希望更多吸纳各类群体,扩大其政治影响力、高度认同官方主流观点,甚至网络意见人士能死心塌地到近乎疯狂的状态来维护政治核心的权力。

2. 理性批评型。这一类型群体次接近圆心,更多倾向理性分析评判。从圆心依次往外延伸,对于理性批评型的网络意见人士来说,他们摆脱了对政治核心的狂热拥护,在立场上表现出以拥护国家政治体系为目的价值取向和政治态度,在行为上从现实出发更多的理性分析和批判社会事件,毫不避讳的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态度。这不仅有利于政治团体的和谐发展,更利于政治体系和社会治理的进一步完善。

3. 激烈批评型。这一类型群体离圆心较远,集中表现丧失理性偏激。网络意见人士除了有忠诚追随者、理性批判者,也不乏有激烈批评型,这类型群体远离圆心,不再热衷追随主流价值观,更多的是激进的随意发表不实的观点或谴责谩骂,散布流言、辱骂英雄、恶意炒作、歪曲历史事件等,甚至被某些利益群体利用。庆幸的是,这部分群体还未脱离圆心对其的吸附范围,还可以加强引导和控制,

使之向理性批评型、忠诚追随型转变^[4]。

4. 敌对势力型。这一类型群体处于同心圆外围，主要善于蓄意攻击煽动。因为背离圆心，对圆心不产生任何吸附能力，多是制造矛盾、瓦解民族团结、破坏社会和谐的反对分子。对于这一类型的网络意见人士，我们统战工作的包容性在网络空间中也绝不是毫无边界，将以法律或行政手段加大对这类型的处罚，绝不允许破坏分子在网络世界里逍遥法外。

二、新时代同心圆理论视角下网络意见人士的新变化

“大网络大统战”是我们新时代统一战线要坚持的工作理念，网络媒体和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更新，在同心圆理论视角下带来了新时代网络意见人士的新变化。

（一）多元的思维价值。网络意见人士主要活动空间在新媒体，因为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获取信息方式也改变，这就决定了大量高学历、高学识的年轻人成为了网络意见人士的中流砥柱，他们关注较多、搜集信息较为方便，能及时的发表独特观点，有独特的判断能力，思维方式也比较多样^[6]。

（二）复杂的来源渠道。因为网络意见人士的组成群体比较复杂，各自职业身份也不相同，所从事的专业领域更是千差万别，其中以自由职业者、演艺明星、媒体从事人员居多，他们的观点和价值观也会有差别，所以来源渠道比较复杂。

（三）热点的关注议题。网络空间开放、及时、便捷的特征，就决定了任何人只要上网都会有自己关注的社会问题或社会事件，这也就让网络意见人士更加方便参与到国家治理和政治事务中，他们通过各种电子终端自由的发表自己的观点，持续关注自己热衷的社会议题。

（四）缺乏的群体规范。在网络世界里，每个人都是平等公正的发表自己的观点，具有扁平化特征。网络意见人士可以随意的游览其他人的观点、任意的发表评论，甚至宣泄情感，有些是真实故事，有些是为引起轰动而编造的虚假信息，导致群体缺乏规范。

（五）自由的话题表达。网络的开放性也让更

多网络意见人士随时随地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喜欢还是厌恶，都能直言不讳，甚至言辞犀利的去抨击，任何人都可以毫无拘束、毫无避讳的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观点，分享自己每时每刻的心情。

（六）虚拟的身份信息。正是网络的开放性，也让众多网络意见人士保留自己真实信息不被暴露的选择权力，他们的言行在网络毫无拘束，必定会带来反对者的报复，所以更多人注册信息时都会采用昵称或虚假身份，为的就是能够保护隐私，同时可以任意发表言论。

三、新时代同心圆理论视角下网络意见人士统战工作面临的困境

复杂的群体往往具备多样的特征，矛盾重重。网络意见人士的统战工作伴随着新特点的出现，同时也面临着重重困境。

（一）宏观上：统战思维和工作理念滞后

中国是全球拥有网民最多的国家，网络意见人士汇聚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身份特征、不同职业阶层的代表人物，汇聚了新的思想价值观点，未能形成大网络大统战的格局。首先，舆论引导方式还不健全，碰到舆论问题“一刀切”现象普遍存在，不能分类识别和引导大众往正确的价值观方向转变。其次，缺乏系统思维，认识片面化的思维，将网络统战简单理解为将统战工作搬上网，统战范围局限在已知领域，未能建立“大网络大统战”的系统思维^[5]。再次，现代化观念不强，缺乏专业人才及时与网络意见人士平等对话的机会，缺乏沟通交流的信息平台。出现这类困境主要是因为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比较落后。

（二）中观上：沟通与协调机制还不健全

网络意见人士的统战工作受网络自由性大、传播范围广的影响，沟通和协调机制还不太健全。一是网络意见人士利益错综复杂，舆情引导不畅通。对于正面新闻的传播力度还不够强，局限在一些官方新媒体上，与政府部门的互动性也不够强，极易产生各种歪风邪言，造成谣言四起的局面。二是对主流价值观的拥护还不够，特别是我们现在拥护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部分网络意见人士特别是青年一代对主流价值观深不知意、词不解义。三是未能分类鉴别不同类型的网络意见人士,对社会和民众有危害的舆论和舆情未能在第一时间加以鉴别,遏制舆情的发生。造成此困境的原因主要在于沟通和协调机制的不健全。

(三) 微观上:统战工作对象复杂且多变

新媒体时代,社会利益分化,不同类型的网络意见人士处理信息的方式也不一样。忠诚追随型的网络意见人士充分信任主流价值观拥护的政府,但也避免不了有时错误的政策缺乏试行就大面推广。理性批评型的网络意见人士,评论和建议都带有批判性,缺乏引导。激烈批评型的网络意见人士,对社会事件缺乏理性的思考,使得其他受众容易产生激烈的反感行为。敌对势力型的网络意见人士,缺乏辨识能力,甚至污蔑执政党和当今执政政府的指令,造成人心涣散、分崩离析的局面。微观上来看主要是因为统战工作对象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极易受其他群体影响而多变。

四、基于“同心圆”理论的网络意见人士统战工作策略

针对新时代网络意见人士的新变化,不仅要把握新变化带来的新特征,从宏观、中观、微观上对引导机制进行探索,更需要针对网络意见人士的分类,精准实施统战工作策略,坚决拥护圆心的政治立场。

(一) 宏观上:树立同心圆网络舆论统战观念,寻求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1. 科学遵循“刚柔并济”的舆论引导方略

统战工作最大的核心便是思想的团结,思想坚定,才能凝聚人心、汇聚统战力量。网络意见人士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对于舆论引导方略,要坚持刚柔并济的方式。“刚”,是指采用行政、法律等方式治理的刚性管理,主要针对恶意抨击英雄人物、无端描黑历史事件、煽风点火乱传流言等网络行为,思想上基本不认同主流价值观。这类网络意见人士应该要以刚性的行政或法律手段对其管束,避免事态恶劣发展,避免扩大传播范围。“柔”,是指以

疏导、沟通等方式约束的柔性管理,主要用于认同国家制度和主流价值观,但对某些观点提出善意的评论和反对。这部分网络意见人士的出发点是理性提出评论和建议,但是在政治态度表达和思想观点发布的时候持批判态度。因此,统战工作者要善于辨析,针对不同群体采取刚柔结合的方式。

2. 明确树立“大网络大统战”的系统化思维

系统思维,是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掌握的六大思维方法之一,科技越发达,人们交往越密切,社会的关联度和系统性就越强^[6]。网络意见人士的统战工作也是一项关联极强的系统性工作,更离不开“大网络大统战”的系统化思维。要坚持党的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汇聚网信办、宣传部、新媒体运营等各部门的行政力量,形成大统战的工作格局。因此,网络意见人士的统战工作要立足统战对象的实际需求,构建各部门统战联动机制,联合各方主要统战力量,加强统战的系统化思维。

3. 有序建立“新对象新方式”的时代化观念

新时代的统战成员对社会活动的变化敏感性极高,并且具备现代科技意识,易于接受新鲜事物,这意味着时代化观念在统战工作人员中变得必不可少。新对象就要有新方式来进行,以新媒体的运用带动工作方法方式的创新。一方面,要加强人员队伍建设,培养一支既懂网络技术又能掌握统战规律变化的人才队伍。另一方面利用网络数据平台的优势,分类监测管理。同时,利用不同领域网络意见人士的知识和智慧,不断挖掘政策研究和咨询决策优势,建设统战智库,共同建设网络统战新阵地,才能形成大团结大联合的统战合力。

(二) 中观上:健全完善新时代精准统战机制,构建最大半径的同心圆

1. 协调多元利益,改进舆情引导机制

网络作为收集民意、传达政意的传播窗口,是网络意见人士表达诉求、提供建议的“大众麦克风”。网络意见人士的利益表达机制,涉及民众对社会问题和政策解疑的畅通性,必须要建立利益诉求平台,可以通过运用多元方式参与统战舆论中,加强其影响力和互动性。一是扩大正面新闻的传播,加强辟谣平台建设。从新闻发布的广度和深度扩大受众群

体，加强正面可信赖的新闻传播，从传播源头上杜绝谣言的产生。二是以主流价值观为引导，让网络意见人士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和新闻观，拥护和爱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鼓励正面积极谏言的网络意见人士，遏制和打击对社会和民众有危害的舆论和舆情传播。

2. 健全发声渠道，加强网络互动机制

网络意见人士的统战工作要做实做深还有待依赖健全发声渠道，构建“线上+线下”的“网络朋友圈”。一是丰富“发声”渠道。从交流需求的角度出发，采取网络意见人士喜爱的方式开展线上交流，而不能以政权去压制，开发特色的公众互动平台。二是转换关心角度。联络双方感情，全面了解网络意见人士的生活、工作、家庭等问题，做好子女教育、工作晋升、政策待遇等相关服务工作，给予人才、政策、资金、信息等方面的支持，为其排忧解难。三是关注意见表达和回复。让网络意见人士提建议、对策感受到重视，未有轻慢、懈怠的感觉，加强其在网络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3. 完善民主监督，创新政治参与机制

民主监督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更好的为民服务的桥梁。网络意见人士作为代表，最能收集民意，代表广大网民的社会诉求和群体意见，他们分布在广大社会分工的各领域，能一手获取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也能够及时发现社会运行中存在的弊端和短板。一方面，充分发挥智力处置舆情，通过协商民主平台，扩宽网络意见人士参与政治协商的方式。另一方面，加强网络监督作用，提高政府治理效率。积极引导网络意见人士参与到政协、纪检、质监、公安等部门担任特邀监督员，方便沟通和协商，加强民主监督执行能力，提高政府执法部门的治理效能。

（三）微观上：实施差异化对象统战艺术，形成“大统战”工作格局

1. 针对忠诚追随型的网络意见人士，要全力支持、充分信任

这一类型的网络意见人士最接近圆心、最拥护主流价值观、最忠诚维护国家制度体系，是网络世界里充当正面角色的主要群体，是社会正常稳定发挥作用、政府稳定运行管理的重要支撑。执政党和

各层级政策都要高度重视这一类型群体，且这类群体数量在我国占据较大，能团结这部分群体，很多统战难题迎刃而解。一方面，政府要多多支持和鼓励这一类型群体的扩大，吸引更多这类群体参与到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的实践工作中，并给与优惠政策，全力支持忠诚追随型的网络意见人士。另一方面，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让这部分网络意见人士中的代表者参与挂职锻炼，扩大他们的参政议政空间，并能利用其影响力加大宣传，吸纳更多有志之士奉献自己的力量。

2. 针对理性批评型的网络意见人士，要适当鼓励、引导发展

这一部分群体更执着于理性发表言论，深度思考并给与带有批判性的建议，往往能带动一部分群体追随。对这一类型的网络意见人士，政府要适当鼓励和引导发展。一是弘扬其正能量，给予这一类型的网络意见人士发表建议的空间和渠道，可从安排政治身份和职位等方面入手。二是引导正面发展，网络空间中的反腐倡廉和政府问政都需要一定的监督者，这一类型的网络意见人士不畏权力敢于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同时敢于批评和监督，是最能引导政治正面发展的力量。三是提高政治效率，各种座谈和政策的执行等都离不开网络意见人士的协商探讨，这类型网络意见人士可发挥其沟通和协调的作用，提出更具创新的建设性建议，提高政府的执政效能。

3. 针对激烈批评型的网络意见人士，要充分包容、重点关注

激烈批评型网络意见人士的典型特征就是政治思想比较偏激，对社会事件或政治问题的批判带有浓重的情绪化。这一类型的网络意见人士，执政党和政府要充分包容、重点关注，因为这一类群体是处于同心圆较边缘地带，也是统战工作最为紧迫的关键群体。一方面，要谨慎筛选出这类型网络意见人士，建立监管库，加强线上和线下的沟通联系，加强思想引导。另一方面，要以宽容之心接纳他们的激烈言辞，触碰法律和行政底线的行为要依法依规处理，对于谏言的有利措施，要及时给与奖励，帮助解决相关难题。

4. 针对敌对势力型的网络意见人士，要坚决打

击、全力管制

敌对势力型的网络意见人士，是代表远离同心圆的圆心、背离主流价值观、不拥护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的这类群体，主要活动是分离中国国土、抹黑历史事实、思想洗脑涣散人心等，政治意图是瓦解政权、阻碍国家体系制度的团结等。这类人士在中国并不是很多，并且非常隐蔽，可能分布在大家日常生活中，但是其破坏力特别大。一方面，统战部门要时刻保持警醒的状态，能实时监测到网络上的具体活动，及时依法处置，不留空间让其壮大。另一方面是从根源上切断其联系，依靠公安、金融等部门依法切断利益输送链条，冻结有异动集团的资金，阻碍敌对势力的扩大。

参考文献：

- [1] 白郢. 政治参与视角下的网络意见人士统战工作思考 [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 20(01): 52-54.
- [2] 李娜. 关于加强和推进新媒体代表人士统战工作的思考 [J]. 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 (04): 54-57.
- [3] 宋俭. 关于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学习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一点思考 [J]. 决策与信息 (上旬刊), 2016, (05): 26-31.
- [4] 李大棚. 同心圆理论视角下网络意见人士的分类与精准统战研究 [J]. 理论月刊, 2019(07).
- [5] 侯天佐. "互联网+"背景下网络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研究 [J]. 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 2018, (01): 30-36.
- [6] 李小燕.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发展研究 [D]. 西安工业大学, 2018.

【责任编辑：余伟】

统一战线引领民营企业家助推共同富裕：理论依据、实践探索与优化进路

张佳慧

(浙江红船干部学院, 浙江 嘉兴 314001)

摘要: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作用, 团结和引领广大民营企业家助推共同富裕, 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和重要目标。统一战线引领民营企业家助推共同富裕具有深厚的理论依据, 作为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民营经济大省, 浙江省积极探索统一战线引领民营企业家助推共同富裕的新范例、新样本。但同时, 当前实践探索中仍存在着统一战线实现对民营企业家助推共同富裕有效引领的一些制约因素。为此, 应从树立共富理念、推进共富进程、汇聚共富力量、打造共富平台等优化路径出发, 以高质量统战工作赋能民营企业家参与共同富裕建设, 推动形成更多统一战线引领民营企业家助推共同富裕的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与经验。

关键词: 统一战线; 共同富裕; 民营企业家; 浙江省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3-0055-06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目标,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动者及共同富裕的构建者, 民营企业家肩负着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责任和历史使命。坚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之一, 习近平同志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多次强调统战工作的重要性, 并指出“统一战线是全党的工作”。统一战线在引领作为统一战线重要成员、统战工作对象之一及“自己人”的民营企业家助推共同富裕中具有独特优势, 因此, 研究如何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作用, 实现对民营企业家助推共同富裕的有效引领, 对于丰富统一战线理论, 推动新时代统一战线创新发展、积极助力“两个健康”、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都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民营企业家助推共同富裕的理论依据

(一) 夯实共同富裕的财富基础

截至 2023 年底, 我国民营经济占 GDP 比重达 60.5%, 全国经营主体总数达 1.84 亿户, 其中 92% 以上是民营企业 and 个体户。作为最具创富能力的社会群体, 民营企业家在财富创造中扮演着“做大蛋糕”的重要角色, 他们通过企业规模成长与利润增长来创造财富、积累社会财富、追求企业社会价值, 发挥共富作用、增富效应, 成为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做大蛋糕”的主力军。民营企业家把创造的社会财富通过制度创新在区域、城乡及群体之间进行合理配置^[1], 从而有利于以点带面地实现先富带后富、帮后富到逐步共富, 为全社会共同富裕做出重

收稿日期: 2024-05-20

基金项目: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研究”(22ZDA07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佳慧(1988-), 女, 江西上饶人, 浙江红船干部学院文化与社会学教研室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统一战线、政府治理创新。

大贡献,并使政府能够对我国区域、城乡及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进行有效宏观调节,最大限度地促进城乡协调、地区均衡及群体包容性发展,夯实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财富基础。可以说,没有民营企业家的崛起,就没有社会财富的增加,而没有共同富裕的坚实物质财富基础,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构建共同富裕的财富结构

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国内外理论和实践均证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和低收入群体规模的缩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制度^[2]。作为共同富裕财富结构的重要构建者,民营企业家是初次分配、再次分配的强大支撑力量,创造了“五六七八九”的突出贡献,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特殊的价值。改革开放推动了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及民营企业家的健康成长,民营企业家完整展现了改革开放四十五年来我国共同富裕参与者、构建者的鲜明特质和时代特征。作为财富分配主体之一,民营企业家在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中扮演着“分好蛋糕”的重要角色,通过发展壮大民营企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支撑政府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等途径,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及贫富差距,助力我国逐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共同富裕社会的财富分配结构,成为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分好蛋糕”的生力军。

（三）承担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

根据美国学者卡罗尔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的金字塔模型理论,企业社会责任依次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慈善责任四个层次,处于塔尖的慈善责任能够为企业带来实现经济利益之外的良好社会效益,而多维责任将有助于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3]民营企业家参与共同富裕属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方式,与金字塔模型理论的层次逻辑相契合,从“必尽责任”到“愿尽责任”渐次向上推进,而这与共同富裕所包含的第四个方面“逐步共富”也是相一致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7月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的:“只有真诚

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4]民营企业家要做回报社会的典范、精神富裕的榜样,把助推共同富裕作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行动自觉。作为先富人群,民营企业家在第三次分配中扮演着“扶弱济困”的特殊角色,通过参与公益慈善、精准扶贫、光彩事业等方式积极践行企业家精神,成为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扶弱济困”的志愿军。

二、统一战线引领民营企业家助推共同富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一）统一战线引领民营企业家助推共同富裕的必要性

首先,民营企业家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是统战工作对象之一,也是统战工作参与者,兼具统一战线工作范围中多重身份。改革开放促进了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的诞生,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的发展又作用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的诞生与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是相互作用与互为促进的。可以说,民营企业家是我国经济社会、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动因和结果,主要体现在“三个多样”:一是个体户、民营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发展壮大使我国所有制形式更加多样;二是与民营企业相关职业关系的自由职业者、行业商会等社会组织工作者的增多使我国社会阶层更加多样;三是民营经济的机遇、风险挑战的增多使民营企业家思想观念、利益诉求更加多样。以上“三个多样”也给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内容带来“三个变化”,即:统战社会经济基础变化、统战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变化、统战工作对象的变化^[5]。民营企业家群体首先是社会影响巨大、社会关系层面广泛、组织网络广大的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重要成员;其次,民营企业家是统战工作对象之一,既是单一主体又与其他工作对象身份相交叉;再则,民营企业党组书记、党员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党务工作者是统战工作参与者。正是由于民营企业家群体身兼多重身份的特殊社会属性及统战性,而使其成为统一战线引领和助推共同富裕的关键群体、重点对象。

其次，民营企业家作为“自己人”，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同心圆内的诤友关系^[6]。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7]作为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向同德的力量源泉，民营企业家在我们党治国理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都必须担负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8]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民营企业家群体在促进共同富裕进程中作用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是社会主义对全体人民的政治承诺。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必须团结和引领包括“自己人”的民营企业家、新生代企业家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提供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广泛力量支撑。

再次，统一战线通过发挥思想引领优势，可以帮助民营企业家正确认识自身在助推共同富裕中的责任与使命。作为统一战线工作范围中涉及面最为广泛、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民营企业家群体中各类型成员思想观念差异较大，如一些民营企业家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淡薄，认为企业发展业绩、自身社会地位完全是靠自身打拼出来的，与党和国家的事、经济社会的发展无关。同时，由于社会上存在“国进民退”“民企离场”和误读“三次分配”等谬论，使一部分民营企业家对我国民营经济地位、作用的认识与信心不足，并对共同富裕内涵、本质产生了认识上的模糊，淡忘了自身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社会责任。针对这些问题，统一战线可以通过发挥思想引领优势，帮助民营企业家树立共同富裕的价值导向，清醒认识到自己与国家、社会是命运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大多数人“奉献红利”的最大享有者、受益者，应

自觉把党和国家的事业与企业发展、个人前途命运紧紧相连，不断增强先富带后富的责任感、使命感，努力成为共同富裕的责任担当者、重要贡献者。

（二）统一战线引领民营企业家助推共同富裕的可行性

1. 从浙江省自身现状和条件来看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新时代党和国家赋予浙江的光荣使命和重要任务，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再次强调“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9]。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为加强民营经济、民营经济人士统战工作及发挥统一战线优势提供了新的工作重点和有利契机，而这两项工作的协同能形成助推共同富裕美好社会的合力，巩固共同富裕统一战线。截至2023年底，浙江省登记在册经营主体达1034万户，其中民营企业333万户，占全省企业总数的92.05%。由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3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显示，浙江省共有108家企业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并已连续25年位居全国首位。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最大优势和特色，而民营企业家是浙江发展的宝贵资源和财富，民营经济及民营企业家的发展壮大对促进共同富裕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统一战线要充分发挥优势，不断凝聚实现共同富裕、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浙商力量，引领广大民营企业家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彰显担当。

2. 从浙江各地已有实践和探索来看

近年来，作为民营经济大省、强省，浙江全省各地通过思想引领、党建引领、行动引领等方式，把浙商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与浙江区位、产业、市场、“山海”生态等优势有机结合，引导民营企业家在创新创业、财富创造、就业供给、公益帮扶、慈善捐赠、乡村振兴等助力共富上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实践探索。

思想引领上，杭州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第一城”优势，大力弘扬“四千”精神，积极创新民营企业家理想信念教育形式，打造云上平台“杭商直播间”，邀请市直部门领导、专家教授等及时在线辅导学习各类重大会议精神、传递最新政策解读，不断强化民营企业家思想引领。湖州市南浔区把“新时代新生代的新担当”主题教

育作为建设南浔区共同富裕示范样本的重要内容,全面加强对新生代民营企业家的思想引领,引导新生代在共富道路上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树立共富好形象。

党建引领上,杭州市紧紧围绕“杭商永远跟党走”统战工作主线,探索以数字统战赋能新时代民企党建的新形式,打造杭州市线上“民企(商会)党建红色长廊”,为全市民企提供“可看、可听、可学”的120家代表性民企(商会)党建优秀范本。温州市永嘉县工商联创新“1+N”基层商会大党建模式,成立11个商会党委(党总支),推动综合型商会党建工作品牌化,着力探索出一条以党建引领民企助推山区大县共同富裕的新模式。台州市玉环市实施“红色领航”计划,组织新生代企业家赴井冈山、遵义等革命老区开展红色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引导新生代企业家不忘初心跟党走、增强爱国情怀。

行动引领上,湖州市南浔区引导新生代企业家积极践行浔商精神,通过产业扶贫、投资建厂等形式,主动融入乡村振兴事业、东西部帮扶协作,与四川省广安市共同探索的“国企建厂、民企定制、三产联动”扶贫模式,成功入选2022年度国务院扶贫协作典型案例,扶贫协作经验在全国进行交流推广。宁波市、宁波市江北区、市委统战部联合启动“之江同心·红石榴”——“奔富山海”项目,引导民营企业家参与先富带后富。依托“山海市集”振兴乡村电商、“山海情·共富工坊”等平台,帮助越西彝族地区农副产品、特色文创产品打通销售渠道,2023年“同心共富”销售额达1000万元以上。

省内其它地方也在积极探索如何最大限度发挥统一战线作用优势,做好民营企业家助推共同富裕的引领工作,以高质量民营经济统战工作赋能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促进企业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双循环、双推进,努力为实现统一战线对民营企业家助推共同富裕的有效引领提供浙江模式、浙江经验、浙江样本。

三、统一战线引领民营企业家助推共同富裕的优化进路

利用统一战线优势,引领民营企业家更好助力共同富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也是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虽然浙江省积极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在引领民营企业家助推共同富裕上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实践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民营企业家践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尚未成为常态,部分企业家社会价值观、慈善公益理念较为薄弱,未能正确理解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履行社会责任与共同富裕及企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还存在统一战线引领民营企业家参与共同富裕建设的协调机制不够健全、方式载体相对单一等问题,而这些都将制约统一战线对民营企业家助推共同富裕的有效引领。为此,还需要从弘扬企业家精神、健全协调机制、加强组织建设、创新多元形式等方面,构建统一战线引领民营企业家助推共同富裕的共建共享共富的优化路径,以高质量统战工作赋能民营企业家助力共同富裕建设。

(一) 弘扬企业家精神,树立共富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弘扬和发挥优秀民营企业家精神,早在2014年,他就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10]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并从爱国、创新、诚信守法、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五个方面阐述了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内涵^[11]。一方面,企业家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构建者、责任担当者,促进共同富裕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而企业家精神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生要素、动力源泉,这也是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思想内涵及表现形式。从本质上说,优秀企业家精神就是不断创造财富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精神。另一方面,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既需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也需要有精神力量的支撑,而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共同富裕本身即包涵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因此,统一战线、工商联要积极发挥思想政治引领作用,激活民营企业家的优秀企业家精神,强化企业家使命担当,树立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的共富信念,提升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共同富裕的自主意识、主体意识。进一步激发企业家主观能动性,通过企业

家精神的内在驱动力、创业创新的活力，增强民营企业家助推共同富裕的责任感、获得感、幸福感，责无旁贷地投身于新时代共建共享的共同富裕美好社会构建。

（二）健全协调机制，推进共富进程

引领民营企业家助推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和全方位工程，涉及众多职能部门。因此，需要构建以党委统战部门、工商联为主要牵头，发改、经信、市监、组织、民政等相关部门参加及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企业主体参与的网络化、社会化的引领民营企业家助推共富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完善各部门联动协作及常态化协调工作机制。一方面，统战部门、工商联要发挥牵头作用，重点是做好民营企业家的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等工作，使其牢固树立共富信念。组织部门要做好优秀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代表人士等人员的政治安排工作，这些举措将有利于提升民营企业家促进共同富裕的荣誉感、使命感。另一方面，发改、经信等部门要进一步消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壁垒阻碍，市场监管部门要维护促进民营企业家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持续优化共同富裕营商环境，这些举措将有利于推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为助力共同富裕蓄能，激发其参与共同富裕建设的动力。民政部门要加快打造一体化社会公益服务信息平台，积极为民营企业提供社工机构、志愿者组织等社会公益资源对接，及时发布公益慈善、扶贫项目清单并鼓励支持在线认领，使民营企业家参与公益慈善、精准扶贫更加便捷化。同时，要建立各部门定期沟通协商机制，针对民营企业家在参与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堵点、淤点问题予以及时协调解决，以此形成多方联动、互为协作的“大合力”“共同体”，不断推进全社会共同富裕进程。

（三）加强组织建设，汇聚共富力量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指出：统战部、工商联按照同级党委安排，参与民营企业党建工作。^[12]统一战线要实现对民营企业家助推共同富裕的有效引领，一方面，应加强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提升党对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的领导力、凝聚力，把党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引领民营企业家助推共同富裕的坚强保障。通过发挥民营企

业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将分散于工业园、产业园、创客园等的大中小微民营企业、企业家有效聚合起来，让党建之根深深融入并扎根于企业文化之中，使企业制度建设与党组织建设相融合，使共同富裕理念注入民营企业家思想、行动之中，使企业经济利益、企业家自身价值与党和国家、社会价值高度统一。另一方面，各级工商联、商会要积极发挥组织优势，进一步推动民营企业家之家、民营企业联谊会等联谊型组织建设，实现统一战线向商会组织全面、有效覆盖。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中的“引导者”“黏合剂”作用，搭建起政企沟通的桥梁纽带，及时掌握民营企业家对共同富裕的所思所想，全面开展共同富裕政策宣传教育，组织开展企业家社会责任担当、和谐劳资关系构建、慈善捐赠文化等主题公益培训，寓服务、团结、引导等统战工作于联络联谊活动之中，使民营企业家对共同富裕树立正确的认知，强化民营企业家作为“自己人”“社会企业家”的意识，明确其自身在共富路上的角色，在引领民营企业家参与共同富裕过程中推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四）创新多元形式，打造共富平台

推进共同富裕进程需要发挥统一战线联系广、智力密集的独特优势，团结引领广大民营企业家结合自身生产经营特征、业务优势，不断开拓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思路，通过多元形式、多种方式来创新公益慈善、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工作的手段，常态化践行自身社会责任，在助力“同心共富”工程中展现新作为。如在公益慈善方面，可通过以统战部领导、工商联牵头、共富小组实施的运作方式，引导民营企业家通过设立企业共富发展基金及共富慈善信托等模式，打造“企业+社会组织+公众”“企业+社会组织+媒体”等形式的公益慈善创新项目，使公益慈善项目能多元高效地覆盖、连接更多群体；在公共服务及民生产品供给方面，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家结合国家战略实施中的薄弱环节，将自身经营优势与养老托育服务、医疗卫生、优质教育等民生问题相结合，积极参与公共服务社会化供给。在促进农村农民共富方面，引导民营企业家群体积极搭建“共富工坊”“共富大棚”“共

富码头”等载体,促进乡村产业发展,通过灵活设置“共富工位”“共富车间”,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各地基层商会与新乡贤联谊会、华侨华人联谊会资源共享、阵地共建,开展“新乡贤回归”“海燕回家”等民营企业反哺家乡活动,依托农产品直播助农、互联网公益筹款等互动体验活动,持续引领、汇聚更多社会公益慈善资源助力共同富裕;在对口帮扶方面,开展“民营企业进边疆”“山海协作”,通过搭建民营企业脱贫结对平台,依托产业扶贫帮富、“造血”扶贫创富、开发式扶贫致富等共建共享富裕模式,积极助力贫困山区“后富”群体、社会弱势群体共富,不断扩大企业家参与共同富裕建设的平台及履行社会责任的辐射范围,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贡献企业家的强大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 [1] 隗斌贤. “先富”与“共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N]. 人民政协报, 2021-07-27:7.
- [2] 吴跃农. 民营企业家: 共同富裕的重要构建者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5.
- [3] 陈英.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实践 [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9.
- [4] 习近平. 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EB/OL]. 国务院公报 2020 年第 22 号.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532611.htm.
- [5] 吴跃农: 民营经济人士与新时代统一战线研究 [EB/OL].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https://idei.nju.edu.cn/e2/02/c26523a582146/pagem.htm>.
- [6] 杨卫敏. 共同体视阈下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开创性发展 [J]. 江苏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5.
- [7] 习近平.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8-11-02:2.
- [8] 正确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3-03-07:1.
- [9] 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 [N]. 人民日报, 2023-09-26:1.
- [10] 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 [N]. 人民日报, 2014-11-10:2.
- [11] 习近平: 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EB/OL]. 国务院公报 2020 年第 22 号.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532611.htm.
- [12]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N]. 人民日报, 2021-01-06:1.

【责任编辑: 秦院院】

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性思想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溯源

康渝生, 侯 畅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过程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西方经典作家的辩证法体系为出发点, 又在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之中完成和实现了辩证法。人的劳动过程是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 人的发展过程是自然界的生成过程。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哲学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思想武器, 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逻辑底蕴。综上, 过程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体现出其独有的优越性与实质性特征。2019 年, 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被首次提出, 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关键词: 过程性思想; 辩证法; 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3-0061-06

一、过程性: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

在方法论上, 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哲学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思想武器, 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逻辑底蕴。批判、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叙事方法与逻辑起点。诚然, 只有马克思才真正的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与发展规律, 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提供现实的实践依据。

通常, 我们总是着眼于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开展学术研究。

1. 对立统一的规律: “对立面的同一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1] 客观世界的一切现象与过程是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斗争的两个对立面, 事物的矛盾运动即来自于这种对立统一的社会实践之中, 构成事物永恒于联系、变化与发展之中。换句话说,

内在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世界的现象与过程之中, 对立统一规律就是蛰居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核心地位, 是它永恒的灵魂。

2. 否定之否定规律: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 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 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地运动中, 因而也是从它暂时性方面去理解;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 按其本质来说, 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 否定之否定的本质属性即它的批判性与革命性。所谓批判与革命即是分析、纠正且驳斥思想理论中错误部分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而这种“否定之否定”过程中的批判与变革是建立在科学性基础上发生的。

3. 质量互变规律: “只要发生质变, 便总是由相应的量变引起的。”^[3] 事物的质变简言解读为事物的核心本质发生改变, 然而质变的发生需要一个阶段性的过程, 即是量积累过程。一方面, 我们可

收稿日期: 2024-06-01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研究” (136KS002)

作者简介: 康渝生 (1950-), 男, 黑龙江大学哲学院教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现代化研究; 侯畅 (1992-), 女, 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现代化研究。

以说,只有当量变发生到一定程度时,事物才会产生质的飞跃。然而当质变发生时,必然是其相适应的量变所引起的。另一方面,质量互变的活动过程总是阶段性与总体性的统一。当量变引发新的质变后,事物的新质伴随时间与空间的发展作为新的量会再一次引发新的质变。这个过程是循环往复的,永不停息的。

在现实的认识活动中,唯物辩证法则表现出三个基本的实践特征:

1.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发展的学说

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运动、变化的,因而人们的思维必须遵循发展的原则,即:用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客观世界。“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4]唯物辩证法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有力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将其定位于支撑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原则。首先,实践活动主体就是客观物质世界本身;其次,蕴含于辩证法之内的一切规律均来自于它的联系的学说与其发展的学说。诚然,正是存在于事物内部的普遍联系才能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与发展。最后,辩证法的对象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而是事物最一般的、最普遍的规律。科学研究的对象整体概括为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思维范畴,辩证法的作用从不是替代这些分门别类的具体学科以内容上的填充,而是予以科学性的指导。

2. 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学说

自然界是一个联系的整体,正是林林种种的事物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完整的物质世界。“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5]列宁曾经从认识论的方法论角度概括了辩证法的实质,厘清了唯物辩证法与相对主义的本来差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6]

3. 辩证法是关于过程的学说

相对于世界存在的无限性而言,每一具体事物都只是一个有限的发展过程。所谓过程,即是事物

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和秩序。因此,在这一过程规律中,我们可以说,“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7]。换句话说,一切物质世界的历史均翕然于过程性之中。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是一个运动的过程;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犹具备过程性思维方式。过程是物质世界的存续体式,全部的客观物质世界表征于为一种过程的集合体。并且,“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8]重要的是,当客观事物的这一过程结束时,它的新的过程将无间隔的被链接起来。在无数个有限的、具体的事物过程中集合成整个永恒的、无限的物质世界。

事实上,存在是同一的,认识则不尽相同。综上,在唯物辩证法的过程性理论中,事物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究其本性而言,辩证法是批判的、革命的。对于既定事物的理解,是在肯定理解中且包含着的否定理解,要认识某一既定事物,就要从事物的持续运动中,从它的暂时性阶段中去理解现象本身的内在规定性,即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性。“我是用这一个运动规律来概括所有这些过程……而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9]马克思在他本人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将探索其研究的这些现象的规律作为他自己哲学建筑的主要任务。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个规律。更“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10]也就是说,作为研究对象,那些现象从这一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的过程本质是自身在转化过程中联系序列的规律。马克思将社会运动看作是不受任何意志干扰,而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11];将历史理解为人的形成过程,“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12]。因此,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变化规律,“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

内在规律性”^[13]。

二、过程性：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发展的基本考量

毋庸置疑的是，历史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一个最重要范式，也是其本身最根本的概念之一。其中，它的过程性思维被表征为其所言喻的首要意蕴。如经典作家所阐述的那样：“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4]这句话明确阐述了全部的人类社会历史无不以劳动实践活动作为一种过程而发展着。进而，马克思表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5]社会历史的生成过程必然适应于生产方式的变革过程，这是马克思辩证法批判逻辑过程必然本性。因此，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引起上层建筑或快或慢的变换模式，这种变换模式，经典作家称之为革命或变革。从而促使社会历史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低级向高级的过程性进阶。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离不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6]

在经典作家看来，只要找到这个基础，“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17]基于唯物史观的实践观点思维方式，马克思运用现实的人来解释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生与发展，历史是作为主体的现实的人同自然、社会的对象性关系的实践活动所创造而成的。综上，历史的存在方式被展现为一种过程性特征。因此，历史只能是人的历史，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8]。人的存在在本质上就是它现实实践性，实践性特征变现为人的生活活动过程及其生产活动

过程，我们可以说，实践作为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就是人的存在，就是现实的人的存在的方式。诚然，历史是基于人的过程性而存续的，简言之，历史本质上是过程的积累。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实践过程即是辩证法最为现实的理论前提，由于“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应”^[19]。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过程性思想原则，人的感性活动、人类的实践就是世界的本质。而人的感性活动规定性恰恰是马克思哲学所由生成的客观依据。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人的问题自始至终贯穿于其思想本身，并且是探索马克思主义过程性思想的轴心论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曾激动地表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由此，人以及人类社会开始进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视野，并成为他们的理论出发点。并在他们合著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这一基础理论做出了更为准确详细的阐释。经典作家表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20]马克思紧随其后声明表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1]。基于经典作家的思维体系，现实世界的人从不是抽象的、向隅的人，而是必定存在于实践中的人，从而任何一种实践活动也必然都是一道过程，每一个人的实践活动都会凝结而成各自的关系，譬如，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等。这些实践过程形成一种关系合力时，即被表现为历史的活动过程。如此，按照列宁的解释，“如果他（马克思）创立了‘崭新的’历史过程观，用新的观点说明了人类的全部过去，总结了至今有过的一切历史哲学理论，那他当然会同样竭尽心力地做到这一点的，也就是说，他会真正重新审查并批判地分析

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研究世界历史的大量事实。”^[22]对于历史的创造必定附属于历史。经典作家承认,存在就是过程,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人的对象化过程。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3]重要的是,辩证法的过程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展现出其本体论的重要意蕴。

三、过程性：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属性

在厘清马克思主义过程性思想的有理性以及过程性思想对于社会发展的基本考量之后,进一步探讨过程性思想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思维发展方式的滥觞之意蕴。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凭空而来的政治臆想,它是通向现代式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我国新时代新征程的社会主义发展中,过程性思想的研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性思想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生前提与基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概念表明,“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24],这种运动和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它包涵着事物的起源、发展、成熟和衰亡等阶段。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包涵着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方面。“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25]的过程产生的。

1. 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性思想强调抓住事物根本属性的发展过程和内在矛盾的阶段性推动作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性思维方式首先表征为民主政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内涵的联系性、发展性特征。全过程人民民主同古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文明、人类社会早期的政治文明态势存在钩连,即人民与民主两方面。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基于对民主政治沿革规律的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26]。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

念提出是一个概念的生成过程。202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决定》将“全过程民主”写入其中。同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车大会上再一次表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同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重申,要“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同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重申“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并将全过程人民民主思想理论纳入到《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2年10月,二十大报告确定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的一项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撑;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即全过程人民民主。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做主”提出了明确要求且作出了整体部署。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的提出,鲜活地诠释了现代式中国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的内涵旨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大理论创新。

2. 就人民民主的整体过程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体现出鲜明的过程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创立“三三制”政权,实现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结合。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发展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和方针,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开始建立并稳步推进人民民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言论自由法规的建立使得人民群众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民主政治之中。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的政治体制得到不断完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民主建设帷幕。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总任务是全力构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987年,党的十三大将人民当家做主确立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内在属性和本质内容。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中国共产党将定不移的奋斗目标。2002年,党的十六大继续提出了党内民主对于人民民主具有示范作用与带动作用。2007年,党的十七大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

主义的生命”^[27]。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务必要做到丰富民主形式、健全民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的权力。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强调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提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健全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保障体系,持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的第6部分,即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做主。我国人民民主道路的发展过程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演进逻辑,也彰显了民主政治建设的辩证发展过程。

3.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性思想考量,“运动形式变换的规律是无限的、自我闭合的规律”^[28]。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无论是从人民群众的主体范围、民主形式的多样渠道、民主过程的环节体系、还是民主秩序上的完整性都体现出民主过程的科学性。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明确区分了选举权与普选权的属性概念与使用方式,选举权仅掌握在少数有产者的手中,无产阶级的苦难首先来自于民主权利的缺失。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29],并且将普选权认定为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30],指出人民群众拥有普选权将会“显著扩大活动自由(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取消警察监视等等)”^[31]。

4. 人类的发展历史就是健全民主过程的历史。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曾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32]这一重大理念具备完满的制度架构,其中包括对民主的认识、对权力的认识以及对法律的认识等。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科学认识是从现阶段民主政治建设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开始的,民主政治建设理论并不是被固定在某一框架体系中一成不变的,是随着实际国情的现实情况而变化的。其中,在考察人民民主全过程的概念时,对其认识过程的本质就是从变化的民主制度程序的联系、运动以及产生和消逝的逻辑过程

中加以阐释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提出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伴随时代发展由低级攀升高级的运动过程,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因此,在唯物辩证法的过程理论中,“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33]形成产生的。“人民民主是一个全过程的民主”^[34]的真理性论断,外化于现实即表现为:“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35]。人民民主的概念,是全人类的价值共识,是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关键理论。

综上,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性思想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属性,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性思想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过程、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旨与规律。在马克思过程性思想的指导下,人民是全过程的承担主体,而全过程则是人民民主的载体,是赋予人民民主自觉能动性的内在动因,人民在全过程中生成自己的民主主体属性。唯物辩证法的过程理论是指导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法论原则,“我们要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36]。只有这样,才能深入贯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及过程理论,才能深入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参考文献:

- [1][2][15]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人民出版社,2009:148,94,82.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04.
- [4][5][6][8][9]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20,841,97,399,520.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40.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
- [11][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

- 社,2009:21,211.
- [13][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2,519.
- [14][29][30][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31,544,544,470.
-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3.
- [17][18][19][20][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3,152,270,146,30.
- [22]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6.
- [25][12][26] 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J].理论导报,2022(09)1.
- [27][32][34][35][36]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7,248,245,245,249.
- [24][28][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9,501,269.
- 【责任编辑:温开照】

深入把握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发展 脉络与重要建设规律 ——以广东政协实践为例

周 云¹, 胡鹤姿², 陈童敏³

(1, 2.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41; 3.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00)

摘 要: 历经七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 人民政协围绕民主和团结两大主题广开言路, 集思广益, 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解决民生难题作出了突出贡献, 成为党和人民认可与信赖的专门协商机构。围绕“走在前列”的目标定位, 广东政协积极探索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高质量发展的新途径新方法, 敢为人先地进行了大量具有开创性的政协协商工作, 并取得了丰富的实质性成果。针对广东政协的生动实践进行深入探究及剖析, 能够更好地把握建设专门协商机构的重要规律, 为人民政协事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展现新面貌提供科学指导。

关键词: 人民政协; 专门协商机构; 实践; 规律

中图分类号: D6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3-0067-08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 提高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水平, 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和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发扬人民民主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对于维护爱国统一战线、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效能发挥着重大作用。人民政协作为落实这一制度的实体机构, 担负着体察民心、汇聚民意、广纳民智、解决民忧的重要使命。加强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建设, 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更加成熟稳固的需要, 是切实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一环, 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上, 如何更好地

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特定优势, 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需要深入把握的重大议题。

一、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建设的历史脉络

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历经七十多年的伟大实践, 逐步发展成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 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突出优势, 为国家繁荣和民族振兴的历史伟业做出了伟大贡献。专门协商机构是党和人民在新时代下赋予人民政协的新历史定位, 但在实践层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直在承担着专门协商机构的职能, 因此梳理新中国

收稿日期: 2024-04-20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与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研究》(GD23WTB04)、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3 年度重大项目 (GD23ZD15)、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3 年度特别委托项目 (GD23WTB02)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周云 (1970-), 男, 甘肃陇西人,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广东省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协理论, 统一战线理论与历史, 中共党史; 胡鹤姿 (2000-), 女, 江西新余人,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陈童敏 (1985-), 女, 广东湛江人,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理论研究部副教授, 广东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省社会主义学院研究基地副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协理论、统一战线理论、中共党史。

成立以来人民政协建设发展的历史脉络有助于深刻把握专门协商机构的根本内涵及重大意义,为未来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实现新突破提供历史借鉴。

(一)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建设初步开展

1949年9月,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及海外华侨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参加政协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历史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2],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多年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建设从基本性质、组织等方面为其后续建设确立了基本框架。首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统一战线的活动开展与有序扩大提供了切实的组织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卓著的成效,但在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建设方面,相对比较欠缺。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应包含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3],这为统一战线确立了明确的组织载体,围绕统一战线进行组织建设与开展活动也拥有了切实的事实依据。其次,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机构职责得到了初步阐发。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阶段,周恩来便对新政协同旧政协之间的根本区别进行了阐述。“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 and 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4],而非由少数人在开会时临时拿出意见供大家商讨,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专政下的新式民主,而非以往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第三,明确人民政协将长期存在。刘少奇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讲话中谈到,“它在今天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后,将长期地继续在中国存在,并将在一切必要的地方建立它的地方组织”^[5],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设立人民政协之初便产生了对人民政协进行长期建设的规划与设想,有意将其建

设成为一个常态化、体系化的组织机构,也意味着人民政协协商的职责也将长期存在下去。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召开,这不仅代表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确立,也意味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顺利完成了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历史重任。此后,人民政协真正开始作为一个重要组织机构,独立发挥着维护人民团结、服务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作用。一方面,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基本定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不同于任何权力机关和行政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6],而非政权机关或权力机构。195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更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以避免将其与权力机关制定的强制性法律条例相混淆,这使得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政治属性得到进一步确认。另一方面,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基本任务进一步清晰。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政协的核心作用在于维护好革命阶级联盟内部的团结与稳定,而其针对重大社会事项进行协商的功能并未凸显。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展及推动国家工业化目标的提出,人民政协的任务重心发生了转移,逐步调整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团结一致,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为贯彻宪法的实施,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7]。同时,本次会议还规定了人民政协的四大主要协商内容:第一,国际问题;第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政治协商会议组成人员的人选问题;第三,社会生活中各阶级相互关系问题;第四,政协内部和党派团体之间的合作问题。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针对党与非党的关系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一方针为日后处理政治协商会议内部执政党与参政党、人民团体的关系提供了确立了基本原则。

(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建设接续进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

幕, 人民政协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更为重要的是, 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发展目标参与重大事务的协商和决策, 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事实认同进一步加深, 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方位发展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82年, 党的十二大将“八字方针”扩充为“十六字方针”, 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并要求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等爱国人士的合作, 这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建立亲密友党关系的基本设想, 也表明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协商合作的坚定决心。

这一时期, 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发展首先体现在人民政协性质、任务和方针的完善上。1982年12月, 审议修改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提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人民已逐渐结成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意味着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在代表性上已具有空前的广泛性, 政协协商更加有力地彰显了我国人民民主的核心优势与效能。同时, 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三大基本职能也进一步明确, 即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及民主监督, 这为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治理效能、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提供了现实路径。1994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进行了再次修订, 章程明确指出, “政治协商是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 明确了政治协商的时间节点和主要内容。此外, 章程还指出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发起程序, 框定了参会人员的基本范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可根据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提议, 举行有各党派、团体的负责人和各族各界人士的代表参加的会议, 进行协商, 亦可建议上列单位将有关重要问题提交协商”^[8]。

与此同时, 人民政协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完善,

1989年1月, 政协全国委员会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经过充分酝酿, 颁布了《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 第一次系统地对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目的、主要内容、主要形式和基本程序等作出了具体规定。中共中央极其重视并大力支持该规定, 要求各级党委参照执行, 有力地推进和支撑了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建设。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在法律上确认和巩固了人民政协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主体的地位, 也同时阐明了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权威性和长期性。

进入21世纪后, 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蓬勃开展, 这为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2007年11月, 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强调,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 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 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协商民主”的概念, 并将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特征。同时, 白皮书还指出,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 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经过充分的政治协商, 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 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 保障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民主,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9], 协商民主的重要地位和深刻意义得到完整阐发。2010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政治协商的意见》明确规定了省级党委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政治协商的原则、形式、内容、程序等内容, 为各级政协的协商民主实践指明了发展方向, 提高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水平。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建设日趋成熟

党的十八大之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进行了缜密的思考和周密的部署, 为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10]。也正是因为有了“推进协商民主广泛、

多层、制度化发展”的任务，才更加凸显出了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的讲话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将人民政协定位为专门协商机构，并要求“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不断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11]。自此，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定位和职责得以明确，人民政协的建设方向进一步清晰。人民政协建设中，如何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成为重点。同时，中共中央先后颁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其中，前者对于政协协商的内容、形式进行了规定，成为新时代政协开展协商的重要指导文件，对于发挥政协协商专门机构的作用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政协要“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提高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水平，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和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12]，这对发挥人民政协专门机构作用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意味着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建设的现实样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面临愈加复杂的局势，社会结构发生深刻转变，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不断凸显。在这种形势下，人民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化解矛盾，汇聚民意，建言献策，凝聚共识，就愈发重要。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一）协商工作开展更加常态化

开展协商是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解决社会痛点难点的关键一招，近年来围绕人民群众关注的急盼愁难问题，人民政协形成了“多种类、高频率”的良好协商局面，促进专门协商机构工作朝着常态化、日常化、稳定化发展，进一步彰显政协协商在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机构优势。在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意见的指导下，全国各级政协组织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汇集人才、联系广泛的优势，着重在丰富协商形式上下功夫，综合运用专家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远程协商等多种协商方式，引领着政协协商朝着“场景多元，形式灵活”的方向迈进，推动专门协商机构搭建了多维度、多层次的协商体系，进一步彰显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和民主效能。丰富多样的协商形式增添了政协协商的易得感和便捷度，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常态化发展势头显著，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可以打破时空局限，更高效地参与到政协工作中来，共同汇聚工作合力，书写专门协商工作的新篇章。

（二）协商水平朝向高质量迈进

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政协建设的总体目标，也是专门协商机构发展的重要特征。首先，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实现了精准协商。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难点、痛点，各级政协组织通常会邀请各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深度、反复的协商讨论，力求将相关问题的核心矛盾和关键问题呈现出来，更加充分地发挥人民政协应用型智库的重大作用。同时，重大议题的协商成果逐步实现了面向党政领导的精准报送，高水平意见建议转化为政策措施的道路更加畅通。其次，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各项职能实现了交叉融合，融会贯通。为有效提升政协协商质量，增强深度协商中的互动感，政治协商、参政议政与民主监督之间的融合力度和配合默契度逐步提高，三大职能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协同产出了不少实质性协商成果，展现了新时代政协工作的新面貌新气象。最后，政协协商逐渐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占据引领地位，发挥核心作用。近年来，各级政协组织主动推进政协协商与政党协商、基层协商、人民团体协商等其他协商民主形式组合发力，打好协商民主的组合拳，共同发挥凝聚民意、汇集共识的民主优势，切实构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发展的新格局。

（三）政协协商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政协有效推进政协工作

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在此基础上,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民主优势、制度优势、组织优势得以全面、充分发挥。加强政协制度建设是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充分发挥我国民主集中制核心优势的必要举措。为了更高效地体察民情、听取民意、聚焦民忧,各级政协全方位推动社情民意听取制度的建设,多地逐步建成委员联系界别群众体制机制、信息专报工作机制,力求进一步畅通民情上升通道,提升专门协商机构工作的时效性。在政协委员履职方面,多地创新打造委员履职档案制、政协委员工作责任制等制度,用以规范政协委员的履职行为,在新征程中展现政协委员的新担当。此外,在“以制度促发展,以制度提实效”理念的指导下,各级政协在提案办理制度、专项协商制度、监察监督制度等方面的建设也卓有成效,真正实现了政协协商工作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效率最优,成效最大,增强了专门协商机构运作的规范性和稳健性,进一步稳固了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新定位。

(四) 国家治理效能日渐增强

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建设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制度设计和独特治理平台。因此,政协协商的核心任务是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框架下,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中心任务,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国家治理效能,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的全局。近年来,各级专门协商机构在工作中更加注重协商的实效而非形式,强调协商的质量而非数量,大力推进协商成果高效转化为党和国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十八大以来,人民政协协商的实质性成果遍及经济发展、政治建设、生态保护、社会民生等多个方面,委员履职成果惠及老人养老、学生教育、妇女权益等多个领域,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和效能得到了充分发挥,真正实现了协商为民、发展为民、治理为民之间的有机统一。

三、推进专门协商机构的广东探索实践与典型案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担任着“排头兵”“实验田”的重要角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能够先行一步,保持领先,为全国树立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良好典范。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视察广东,对广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总的来讲,就是要求广东继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全国走在前列。广东省政协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记人民政协的初心和使命,在协商实践中,创新新方法,探寻新思路,在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一) 积极发挥党政合作的协同效应

广东省党委和政府一贯支持政协工作,成为人民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强有力的支撑。广东省开省级领导牵头督办政协提案之先河,并且在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带头之下,全省党政系统主要领导督办政协重点提案便成了极具广东特色的政协实践和协商品牌,为多省借鉴学习。目前,围绕着省内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广东省已建立起相对完善系统的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重点提案督办体系,形成了强大的督察合力,发挥了显著的协同效应。比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广东省也面临着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难题。为推动广东省区域协调发展,广东省政协提出了“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简称百千万工程)的系列提案,以推动广东省乡村全面振兴。该提案由省长王伟忠同志督办,自启动以来,开展了多次议政协商、民主监督和专题调研,各县镇的发展布局进一步优化,优势资源实现高效统筹,一批又一批发展势头强劲的县乡镇得以涌现。

(二) 多途径多渠道密切联系群众

坚定不移地走好群众路线是加强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实现高质量协商的必由之路。广东省政协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人民情怀,充分发挥人民政协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牢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初心使命,不断创新联系群众的新机制新平台,逐步形成了“线上线下,双管齐下”的群众联络格局。从线上来看,省政协依托“粤省事”粤政协服务专区开设“委员会客室”,定期安排委员值班与网友

互动,开辟了一条委员与群众沟通的线上渠道。从线下来看,广东政协主要通过开展专题调研、专项监督及协商座谈会等方式深入基层一线,通过同人民群众进行充分交流与商讨,破除惯性思维和有限视野带来的局限,真正摸到实情,听到实话,从而为相关议题提供更具综合性及专业性的意见建议。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是广东省委、省政协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建设制造强省为目的,探索出的高层次政企协商平台。座谈会上,政企双方围绕企业转型升级、涉外法律服务、开拓多元化市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交谈与商讨,政府能够进一步了解粤商在发展方面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企业也可以尽早了解相关政策的动态动向,从而为共同为推动广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大动力。

(三) 不断创新协商议政的平台载体

协商议政是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切实参与国家治理、发挥协商民主优势的重要手段,因此,与时俱进地推动人民政协协商议政平台多元化、多样化发展是促进专门协商机构高质量履职的应有之义。2020年初,“数字政协”平台作为广东省“数字政府”体系有机组成部分正式全面上线,一键开启了政协委员“掌上履职”的新时代。正逢国内新冠肺炎全面爆发之际,近百位委员通过“数字政协”平台开展网络协商与讨论,不仅为抗击疫情汇聚了智慧与力量,同时也为疫情特殊时期下委员进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可以说,“数字议政”平台的出现是广东省政协信息化改革的重要一步,也为全国政协信息化建设树立了新风向新标杆。同时,各地级市也紧紧围绕政协信息化发展的新方向,打造了一批新的议政协商平台,如广州市政协的“有事好商量”平台、深圳市政协的委员议事厅以及顺德市的“论道顺德”建言资政平台等等,这类新型协商平台和载体极大地激发了政协委员体察民情、建言献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四) 政协体系化制度化建设取得成效

加强专门协商机构体系化制度化建设不仅是政协协商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发挥引领作用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十八大以来,广东省政协积极探索优化各级政协单位的组织架构,力求发挥出专

门协商机构在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上的最大潜力。2016年,广东省政协在专门委员会中增设联络工作委员会以进一步完善委员联络制度,提升委员间沟通协作的效率。联工委自创立以来,在协调部门、上下联动、队伍建设、委员履职等方面卓有成效,提高了政协委员履职的现代化水平。2018年,为更好地解决省内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广东省政协又增设农业和农村委员会,集中资源与力量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政策扶持。此外,广东省政协也十分注重各级政协组织之间的联动与沟通,着力探索有关重点提案的省、市、县、区多级联合督办机制,迸发了强大的协作效能,为解决重大区域性发展难题提质增速。

四、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建设的重要规律认识

人民政协走过了七十多年的历程,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建设,走过了同样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重要的规律。

(一)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建设的根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独特优势的根本保障,在党的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和政协同发力,才能推动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取得扎实成效。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建设首先需要向党的大政方针看齐。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政协建设,正是走过了这样一条道路,始终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在首位。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机构,也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进行建设。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才能有序开展,协商民主的效能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的建设才能有明确的目标和坚实的基础。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努力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民政协发扬协商民主,开展政治协商,也必须围绕这一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来进行。人民

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建设,重心应该始终同党的中心工作保持同步,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心工作推进到哪儿,人民政协的工作就跟进到哪儿,真正把人民政协的民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强大效能。

(二) 专业性、权威性、广泛性和高质量开展协商民主是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建设的突出特点

通过人民政协开展政治协商,是我国协商民主的先声。也正是因为如此,人民政协在长期开展的政治协商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完备的制度,体现出了开展协商民主的专业性、权威性、广泛性和高质量的特点。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这些优势和成果,奠定了我国协商民主全面深入发展的基础,也造就了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地位。

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提出,要“发挥各协商渠道自身优势,做好衔接配合,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各类协商要根据自身特点和实际需要,合理确定协商内容和方式”^[13]。人民政协由于其在协商民主中专业性、权威性、广泛性和高质量的特点,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优势,能够参与到各种协商渠道中去,为各种协商作出表率,为协商民主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 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是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建设的重要目标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协开展政治协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协商民主全面展开,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更为充分地发扬人民民主。人民政协在七十多年来实践中,坚持通过协商,广泛地汇集民意,进而达成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形成共识,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和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最为真切地实现人民民主。人民政协专门机构的建设,也是遵循了这样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锚定发扬人民民主这一重要目标,发挥政协的优势,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四) 深入调查研究是专门协商机构建设的首要方法

人民政协一贯注重调查研究,1954年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就提出,“密切联系群众,向有关国家机关反映群众的意见和提出建议”^[14],1982年修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更加

具体地提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组织委员视察、参观和调查,了解情况,就各项事业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向国家机关和其他有关组织提出建议和批评”^[15]。在实践中,70多年来,人民政协坚持走进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在社会现实中真正挖掘出人民群众面临的急盼愁难问题,真实了解到增进人民福祉的政策制度的落实状况,把最真实的情况以及改善和解决方案反映到了党政部门,解决了人民群众的诸多问题,从而充分发挥了协商民主的效能,构成了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建设的宝贵经验。

(五) 坚持守正创新是专门协商机构建设的重要路径

人民政协成立70多年来,一直坚持守正创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政治协商、统一战线、参政议政、民主监督,都是人民政协的根本,始终坚持不渝。另一方面,政协协商也始终在理论上、实践中,不断进行创新。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正是创新的产物。坚持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有机构成了专门协商机构守正创新的三位一体格局,是着力提升专门协商机构民主效能和治理优势的必然要求。

(六) 加强制度化建设是专门协商机构建设的关键支撑

人民政协在70多年的历程中,一直把制度建设放在重要地位。制度是一个组织的灵魂与根基,制度建设水平的高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机构整体运作的条理性、规范性。人民政协的制度建设,不断地提高了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化体系建设水平,人民政协制度优势、组织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同时,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建设中,推动和开展协商民主规范化、程序化、体系化也是其中重要的经验和规律。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38-39.

- [2]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43.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4.
- [4]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29.
- [5]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47.
- [6]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219.
- [7]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219.
- [8]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中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540-541.
- [9] 中国的政党制度 [N]. 人民日报, 2007-11-16 (15).
- [10]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12-11-18 (1).
- [11] 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93.
- [1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38-39.
- [13]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EB/OL]. (2016-06-25) [2023-12-25] https://www.gov.cn/zhengce/2015-06/25/content_2884439.htm.
- [14]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212-213.
- [15]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中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409.

【责任编辑: 余伟】

中国书法——书写伟大民族精神的绝世瑰宝

徐兵兵

(汕头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汕头 515071)

摘要: 中国书法如无言之诗、无图之画、无形之舞、无声之乐, 撇捺纵横间书有尽而意无穷, 不仅是神州大地独有的文化瑰宝, 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外化图腾。千百年来, 华夏民族涌现出众多人格璀璨的书法名家, 同其作品一道在传承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七个着力”之一要求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这为中国书法的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指明了前进方向。

关键词: 中国书法; 民族精神; 习近平文化思想; 传承弘扬

中图分类号: J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3-0075-0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 承载着大量民族精神内核,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中国书法, 将爱国主义、自强不息、传承进取等伟大民族精神书写得淋漓尽致。

一、中国书法铭刻爱国主义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座谈会上指出: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近代以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

系列抗争, 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 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爱国主义就是一个民族几千年社会实践凝结积淀的对祖国最纯洁、最高尚、最深厚的感情, 它集中表现为人们形成的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的热爱以及对命运和前途的关心, 从古至今爱国主义一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旋律, 鼓舞着各族人民努力向前进。

(一) 一门忠烈颜真卿

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 他的楷书丰伟刚健、气象博大, 将大唐盛世景象映染纸面, 穿越千古。苏



颜真卿 《祭侄文稿》

收稿日期: 2024-05-28

作者简介: 徐兵兵 (1991.10-) 男, 江西鄱阳人, 汕头市社会主义学院法学教研室教师, 汕头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主要研究方向是宪法、行政法学、中国书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轼在《书吴道子画后》中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但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可谓字字泣血，“潦草凌乱”的卷面抒发出的是书家的无限悲愤与痛心。

唐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气势汹汹，一路上诸多郡县相继被破，其他部分郡县望风投降。国家危难之际，平原太守颜真卿被共推为统帅，集合 20 万大军，联络其从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逆，受颜氏兄弟影响，许多投降安禄山的郡县纷纷倒戈。期间往来于平原、常山之间联络义军的侄子颜季明，在叛军攻陷常山后战死并被砍掉头颅，颜氏一门战死者多达 30 余人，十分惨烈。唐乾元元年，凝望爱侄首骨的颜真卿奋笔疾书，将颜杲卿父子英勇抵抗安史叛乱、以身献国的英雄事迹和内心的哀愤都倾注在了书帖的字里行间。后来，颜真卿奉命劝降叛军淮宁节度使李希烈，被扣下囚禁，不畏惧叛军威逼利诱，最终也被缢杀。

北宋先贤张载讲君子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特别是在烽烟乱世之中，像颜真卿一样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大丈夫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那份担当和使命，历代以来传诵不衰。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引用“为官避事平生耻”。并将其作为好干部标准的重要一条，勉励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不要逃避责任，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国家和人民利益第一。

（二）精忠报国岳飞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曾说书陪伴着他的成长，童年就看过《岳飞传》等小人书，母亲也常给他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故事。总书记对母亲说：“把字刺上去，多疼啊！”母亲回答道：“是疼，但心里铭记住了。”此后，“精忠报国”四个字，一直记到现在，成了总书记一生追求的目标。

杭州岳王庙的匾额上镌刻着岳飞书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从字里可以看出岳飞并不只是征

战沙场的武将，书法也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如果必须在岳飞身上贴一个精神标签，那一定是“爱国主义”，这也是他的书法区别于其他书家的鲜明特色。

岳飞一生用生命践行“精忠报国”精神。北宋末年爆发了耻辱的“靖康之变”，为报效国家岳飞毅然投军。十余年间，率领岳家军同金军进行了数百次战斗，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原因为何？一方面是主帅的精神信仰。岳飞主张“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惜死”的为官为将之道，这种精神信仰是封建王朝皇权稳固、社会稳定、军力强盛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是纪律严明。其所率领的“岳家军”坚守“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作战底线，这些直接提升了岳家军的战斗力。岳飞的精神信仰和岳家军军纪严明共同保住了南宋半壁江山，令金兀术无奈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慨。

岳飞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在面对外敌入侵特别是民族危机空前强化的抗战时期，能够汇聚起仁人志士杀敌报国的巨大精神力量，亦可以激励当代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担当。

（三）心怀天下王阳明

王阳明的《龙江留别诗卷》舒朗有序、清劲洒脱，极具强烈的个人风格。之所以世人知之甚少，皆因其哲学光芒掩盖，明代徐渭曾说：“王羲之以字掩其人，王守仁则以人掩其书”，用“书为心画”形容阳明先生恰到好处。

“万物一体”是王阳明心中理想社会境界的集中体现，他将人的仁爱之心推及万物，本质是建立有序、守德、公平、活力、向上、富强的社会，即“一体之仁”的社会理想。“万物一体”将爱己、爱人、爱物、爱国，巧妙地融为一体，其中就蕴含着朴素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一生都在以实际行动践行爱国主义。15 岁便怀着报效国家的决心，实地考察明朝的北部边境“居庸三关”，而后平叛宸濠（宁王）叛乱、巡抚南赣、征伐思田，一生都在为家国百姓立功、立德、立言、立行。

阳明先生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传习录》中

共有2处提到“忧患”、18处提到“忧”、16处提到“患”、27处提到“虑”，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王阳明笃志圣学、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历史反复证明，增强忧患意识，不仅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智慧，更是爱国主义十分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社会进步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深谙阳明心学并在许多重要讲话中引用其经典。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总书记指出：“我常说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就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智慧，尤其注重知行合一，时刻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二、中国书法蕴藏自强不息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中国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奋力攀登，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创造”。铿锵豪迈的宣示，温暖坚定的话语，激励着每个中国人奔赴梦想、一往无前。自强不息取自于《易经·乾卦》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意是天体运行，周而复始，刚健有力，作为“君子”，应当效法天道，永不懈怠，自强不息。

（一）池水尽墨王羲之

东晋永和九年，在会稽郡（即今浙江绍兴）举行了一次文人集会。与会者曲水流觞、临酒作诗，公推笔墨风流的王羲之为此作序，记录此次兰亭雅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由此问世。而后世事变迁，《兰亭集序》辗转至唐太宗李世民手中，据传其深得太宗喜爱，认为其是“尽善尽美”之作，下令死后将它一同葬入陵墓。

“书圣”王羲之对中国书法的意义不仅在书法技术上集时代之大成，创造了形式妍美风格典雅的正书、行书和草书，开一代之新风，更可贵的是他学习书法勤奋刻苦、自强不息的精神。王羲之出身

名门望族，身世家境非常人可比，即使“躺平”亦可获得一官半职。然而他并没有“躺平”，或许是书香环境的熏陶，或许是受祖辈、父辈们的感染，王羲之自小读书、练字就很刻苦，时常废寝忘食。王羲之喜欢临池书写，就池洗砚，天长日久，池水尽墨，后世称之为“墨池”。在王羲之的精神感召下，其夫人及所生七子皆擅长书法，尤其是王献之。王献之同样有着父亲那种刻苦向上的冲劲和持之以恒的决心，在良好的家教家风中其书法最终大成。

（二）少年上人号怀素

草书历史上并存两颗巨星，分别是草圣张旭和僧人怀素，张旭的草书早已闻名于世，登峰造极，苏轼曾言：“知者创物，能者述焉。”虽说张旭草书早已“珠玉在前”，怀素硬是靠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打出另一片天地并与之齐名。

怀素学习书法十分勤奋痴迷，缺少纸张练习他发明了漆盘，将木头做成盘子形状，涂抹油漆反复练习。后因漆盘太过光滑，笔法难以掌控，便在寺庙的周围种上万余株芭蕉树，在芭蕉叶上继续挥毫，芭蕉叶具有纸张的一些特点，并且还可以不断再生，切实解决了书写用纸的问题。习书过程用坏的笔堆满数瓮被埋在了山下，称为“笔冢”。后不远万里从长沙赶赴长安寻访名师颜真卿、贺知章等问道书理，以一篇真诚恳切、自信十足的《自叙帖》自我推荐，终得到颜真卿的肯定与举荐。李白看到《自叙帖》后发出感慨，“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

毛主席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曾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习近平总书记也在2023年新年贺词中引用《荀子·修身》“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名言激励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王羲之和怀素只不过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里众多勤劳智慧者中的两颗明珠，其自强不息的精神将激励着无数默默奋斗的人走向成功。

（三）一蓑烟雨苏东坡

习近平总书记擅长引经据典，2009—2019年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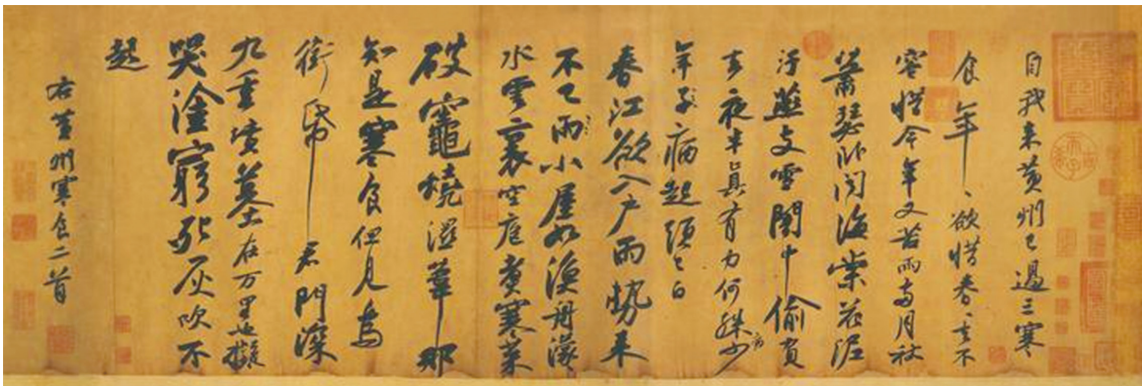
年间，平均每年都引用过东坡名言，涉及了纪法、生态、青年、外交等多个方面，可见苏轼名句颇得总书记亲睐。

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帖》，写于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个寒食节。从作品来看，作者提笔时思绪心情还稍微平和，行笔至“年”字时，悬针竖一垂到底，表达对于被贬生涯的未知与彷徨，特别是“破灶”“哭途穷”几处，实实在在感受到他的绝望与挣扎。几处悬针竖一改东坡扁平的书风，就像是一颗种子，种下对未来的期望，与命运抗争，自强不息、顽强成长，最后“死灰吹不起”几个字又回复到提笔时的心境，整幅字像是一曲传达心声的“交响乐”，在起承转合间展现出乐观与豁达。

	引用文句	引用时间与场合
1	腹有诗书气自华	2009 年 5 月于中央党校
2	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	2012 年 11 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
3	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	2014 年 7 月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4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2014 年 9 月印尼世界事务委员会演讲
5	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2014 年 10 月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会议
6	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	2016 年 11 月秘鲁国会演讲
7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2018 年 1 月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
8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2018 年 5 月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
9	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世不改也。	2018 年 6 月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
10	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	2019 年 10 月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习近平 2009—2019 年引用苏轼名言汇总表 （来源：中国新闻网）

苏轼
《黄州寒食帖》



纵观苏轼的一生，总的可归纳为三句话。一是颠沛流离，逆境逢生。北宋时期党争激烈，苏轼的仕途也因为党争变得崎岖坎坷。因反对王安石变法急于求成被贬谪出京，后又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差点丢掉性命。在旧党的内讧和新党的打击下，苏轼最终被贬往海南。政治上的失败并没有让他彻底沉沦，他的乐天知命和自强不息使他成功

地驾驭了自己的人生。二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苏轼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北宋，从杭州、黄州到惠州、儋州，基本都在为民办实事，如徐州抗洪、杭州筑堤、黄州救儿、儋州开化等，真正地用实际行动践行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三是乐观豁达，光芒闪耀。人是打不倒的，才华也是藏不住的，苏轼在诗词书画等很多领域取得了超高成就。论书法，

宋四家“苏黄米蔡”排第一；论文章，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论词，开豪放派先河，与辛弃疾并列“苏辛”等。苏轼才华卓绝、能力突出的形象品质；乐观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勤政务实、为民造福的为官之道，对当下全国党员干部提升履职能力、激励干事创业、树立正确政绩观都有一定的激励和鞭策意义。

三、中国书法展现传承进取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在文学艺术上，中华民族也展示强大的传承进取精神，文学上的唐宋“文风改革”及书法上的书风字体传承创新皆是如此。

（一）书法里的传承精神

书法里的传承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书法作为一种文化本身的传承；另一种则是书法对中华文明的传承。

从书法发展历史来看，可以主要从三方面来理解书法文化本身的传承。首先，书法的遵古溯源。纵观历代书家习书历程，基本都在师法古人、遵循传统。被誉为“书圣”的王羲之也是在李斯、钟繇等众多名家基础上博采众长；宋代米芾善于“集古字”遍学欧阳询等名家笔意；元代赵孟頫更是扛起“书风复古”大旗直追晋唐。其次，书法的家学传承。

书法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明显的家族特色。家学传承的代表首推王氏家族，史上有王羲之父子、王珣、王僧虔等著名书法大家，这主要得益于门阀制度的世家大族垄断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再次，书法的官方提倡。隋唐以后开科取士，科举制度开“书科”设置“六学二馆”，其中就有“书馆”，为书法更好的传承奠定了基础。今天的中国，很多高等院校设立专门的书法学院、研究院，在传承书法文化的基础上培养了大批专业书法人才。还有从上到下设置的各级书法家协会，一定程度上也在为传承书法文化发挥作用。

书法这一叙事达意的艺术形式，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千百年流传下来名篇巨作、私信手札、景观题字、院舍牌匾等都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事件的记载存档。《祭侄文稿》印证了唐朝的“安史之乱”；残存的泰山刻石见证了秦皇一统的威仪；当前我国各级党政机关雕刻的“为人民服务”等墙字，也进一步坚定了共产党人信念和宗旨。尤为重要的《史记》《资治通鉴》及“二十四史”等历史原作，这种以汉字为载体，以书法为形式的东方智慧使中华文明真实地有迹可寻。此外，寻常人家悬挂的“厚德载物”“积善为德”“和为贵”等励志名言，在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同时，对于个人修养、良好家风乃至社会和谐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书法里的创新精神

中国书法从殷商甲骨文逐渐发展演变为“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并在随后的历朝历代中都蕴含着自身特色，如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态等。中国书法在时代变迁中不断地进行自我革新，以适应各个朝代的审美意趣，与此同时也见证了王朝兴衰和民族融合。

商周至秦统一六国，书法处于“自在”阶段，殷商甲骨文是刻在兽骨龟壳上面的文字，多用于祭祀和占卜；西周金文则是镌刻在青铜礼器上面的文字，多用于祭祀、征伐，也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秦统一六国后，书法则进入到“自觉”的阶

段,更多的服务于统治需要,著名的“书同文”则是秦以小篆为官方通用文字。汉以后,较为简洁的隶书逐渐取代书写繁琐的篆书。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思想文化多元碰撞,魏晋玄学之风盛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建立,这种时代背景下书法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楷、行、草等书体也趋于成熟,涌现出众多杰出的书法大家。晋代“二王”及兰亭雅集已成后世学者仰慕的一次盛会;唐代楷书法度森严,水平已至历史顶峰,无不反映恢弘博大的盛唐气象;宋人自知晋唐书法成就难以超越,独辟蹊径开创“尚意”书风,这也是两宋三百多年“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体现;元明清以后,封建王权制度已经强化到极致,彼时的文人只能在书法传承古法的过程中追寻晋唐的开放宽容遗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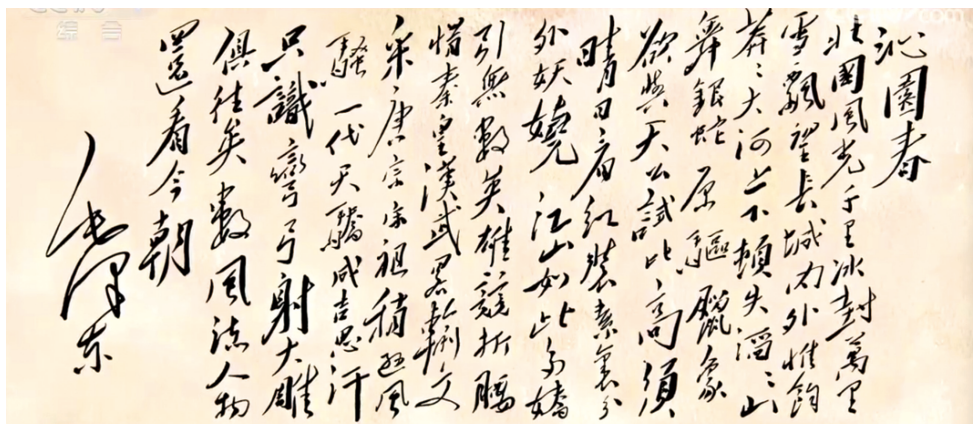
(三) 书法里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书法是中国革命的产物,是伴随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进程而不断演变的一门艺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与中

国共产党人革命乐观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分不开的,其中毛泽东的宽阔胸襟、豪放气魄起到了关键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英雄是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杰出代表,来自于群众、为了群众、代表群众、引领群众;脱离群众的英雄将是孤家寡人;而离开英雄人物引领的群众将是一盘散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和英雄观,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强调既要看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根本作用,又要看到杰出人物的独特巨大作用,辩证地看待人民群众与杰出人物的各自作用和内在关系。

1936年,毛泽东率领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东渡黄河抗日救国。在行军路上偶遇纷飞大雪,看见青山一片白雪皑皑,诗兴大发,于是提笔写下了

这幅诗词书法作品《沁园春·雪》。其中提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古代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有其不足之处,都已随风而去,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还得看我毛泽东,看中国共产党,看全中国人民!毛泽东的书法气势磅礴、挥洒自如。如果从书法的角度来欣赏这幅作品,毛泽东的字整体呈现向右倾斜并向四周发散的感觉,整个字都是“拔”起来的,但见尺素之间舒展天地之气的通达之感,一笔一画都稳如泰山、斩钉截铁,透露出作者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果将毛泽东的字放大来看,那种伟人气魄更是难以掩盖。



1936年 《沁园春·雪》

结语

中国书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绝世瑰宝,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不断传承发展,既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和民族融合,也承载了中华民族兴衰荣辱的历史记忆。书法作为一种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的“文化工具”,不仅满足了人们的文字信息传递需求,还满足了人们艺术欣赏的审美需求,最重要的是,中国书法蕴含着的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并传承下来的民族精神,在恰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世界,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要透过典雅优美的书法外形感悟其内在精神，要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国文脉、弘扬伟大民族精神的同时，不断提炼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叙事体系，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12-01 :02.

[2] 习近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4-09-04 :02.

[3] 李务起. 颜真卿《祭侄文稿》书帖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其在促进祖国统一中的启示和意义 [J]. 统一论坛, 2022.

[4] 林晖, 史竞男, 王思北等. 习近平的读书故事 [N]. 人民日报, 2022-04-23 :01.

[5] 封婷婷. 儒家“万物一体”视域下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研究 [D].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6] 习近平. 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J]. 求是, 2022:03.

[7]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 [N]. 人民日报, 2024-01-01:01.

[8] 王勒懿. 周易文化与民族创新精神探析 [J]. 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 (01): 34-37.

[9] 刘晓萌. 苏轼黄州诗文的人生哲学研究 [D]. 云南师范大学, 2021.

[10] 刘若斌. 苏轼“自我超越”的人文精神初探 [D]. 山东大学, 2008.

[11]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求是, 2023:17.

[12] 毛泽东题词墨迹选 [M].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84.

[13] 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5] 毛泽东与书法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4.

[16] 吴敏琦. 毛泽东与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建构 [D]. 湘潭大学, 2017.

[17] 张雪阳. 毛泽东书法的革命精神研究 [D]. 郑州大学, 2020.

[18] 马立党. 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和英雄观 [N]. 解放军报, 2018.

【责任编辑：秦院院】

多维统一：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的本质特征

刘亮红

(湖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4)

摘要：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体系完整、意义深远的科学体系，主要表现为从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般理论到指导思想的认识升华中生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自信、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中坚定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与热爱、在普及提高与逐渐推广革命文化中讴歌并树立对于革命文化的自信、在“双百方针”与“两为原则”的提出与贯彻中满怀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与期许。总结提炼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的本质特征，是准确把握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精髓的关键抓手。

关键词：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本质规定；多维统一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49(2024)03-0082-05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常幽默地宣称，“我用‘文房四宝’要打败国民党四大家族”。^[1]这是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的较早表露。虽然毛泽东没有明确提出“文化自信”这一概念，但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文化建设实践中，对如何坚定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做出了重要探索与贡献，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体系完整、意义深远的科学体系，他的文化自信思想主要表现为从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般理论到指导思想的认识升华中生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自信、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中坚定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与热爱、在普及提高与逐渐推广革命文化中讴歌并树立对于革命文化的自信、在“双百方针”与“两为原则”的提出与贯彻中满怀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与期许。毛泽东的文化自信思想体现了其深邃的历史眼光与强烈的实践逻辑，实现了多方面的内在统一。总结提炼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的本质特征是准确把握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精髓的关键抓手。

一、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是个体自信、政党自信与群众自信的内在统一

自信是融汇于毛泽东生命历程的高贵品格，铸就了他的英雄气概和超凡领袖的气质。毛泽东的自信不仅是对个人的自信，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集体自信与群众的主体自信，而这三个自信都统一于毛泽东的文化自信思想中。

毛泽东的自信表现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全过程与各方面，既有指点江山的底气，又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气概，还有认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豪迈，他曾写下“自信人生二百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的认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可以用“文房四宝”打败“四大家族”等。毛泽东的个体自信不是盲目乐观，而是“源于他对人类历史发展根本规律与最终归宿的洞察，源于他对社会矛盾的深入了解和精确判断，源于他对历史和哲学的理性思考，源于他为了崇高理想置生死于度外的

收稿日期：2023-12-04

基金项目：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研究（ZK20190151）”、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统一战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湖南经验研究（22YBA19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亮红（1977-），女，湖南益阳人，湖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大智大勇”^[4]。

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自信既根植于党的内在规定性，体现于党的初心与使命之中，更体现在他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的充分肯定。第一，在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规定性方面，他自信地宣称在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和政治团体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2]184}，而在这样先进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则具有“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2]449}。第二，在中国共产党践行使命与担当方面，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的领导任务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担负，“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2]651}。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并且已经为此而一直艰苦奋斗，“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5]184}，以建设一个“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2]602}。第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方面，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几万万人民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5]184-185}，不仅教育了中国的人民，而且教育了中国的政党，夯实了团结抗日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不但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2]549}；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历史成就，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2]526}。因此，毛泽东多次强调，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2]526}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一句话，“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2]651}。

毛泽东对于群众的主体自信既源于他对广大人民群众朴实的天然的亲近与了解，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具体运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工人阶

级、农民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动力。这是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根本力量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具体体现。早在1919年，他就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就指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3]271}，后来在《湘江评论》连载《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再次阐述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对于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毛泽东尤为重视，不仅充分肯定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黑暗统治、推动改朝换代的积极意义，而且指出“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2]692}“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2]559}；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后，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更是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5]144}。这系列思想都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1031}在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反映，毛泽东还强调，离开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2]649}。第二，人民群众具有伟大创造精神。毛泽东高度肯定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精神，指出，“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5]1512}，“只要我们依靠人民，……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7]1096}“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8]1512}。毛泽东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就已经注意到早年不为我们党所重视的农民的力量，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更是将农民作为革命的动力，指出，“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2]642}，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而且是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人民群众是创造精神文明的英雄，毛泽东指出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人民群众已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人民群众也是改造不合理社会、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英雄。历史上，农民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武装反抗有力地推进了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也促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民主革命以来的短暂时间内，人民群众更是极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各地农会曾经

在很短的时间以极高的效率,推翻了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做到了“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5]18}。第三,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6]324},人民群众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上帝”,说只要努力奋斗,“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人民大众”^{[7]1102}。毛泽东还指出:“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2]522}共产党人“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才能“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2]523}。“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8]1260}。

二、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是文化自信、文化自省与文化自觉的统一

毛泽东的文化自信不是盲目自信,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的深切了解、理性认知与深刻总结的基础上的,是文化自信、文化自省与文化自觉的有机统一。

毛泽东的文化自豪主要表现在对于民族传统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与共产主义的深切了解基础上。第一,对于民族传统文化,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如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诞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2]622-623},有着丰富的文化典籍与近四千年文字可考的历史等。对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溢于字里行间,随处可见。第二,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更是通过阐发其“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特质来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并对“全盘西化”“以西解中”和盲目排外两种极端思想进行批判,重建中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第三,对于共产主义文化,毛泽东高调地肯定它“是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并指出“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2]636}

毛泽东的文化自省表现在对现时文化的理性认知与审慎判断上。第一,在对待历史文化方面,既看到长久的封建社会中创造的灿烂文化,同时又指出古代文化是糟粕与精华并存,“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2]533},既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又要“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2]706-707}。第二,在对待新民主主义文化方面,毛泽东也是持非常审慎的态度,在讴歌其先进性、革命性的同时,也客观理性地指出,尽管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许多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因素,但由现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所限定,“整个的国民文化,现在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还不是完全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2]704}去参加中国革命,并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2]692}。第三,在对待共产主义文化方面,毛泽东在肯定其“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同时,也不是毫无批判地照搬照抄,而是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生动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经过中华民族的形式,而不是主观地公式地应用,提醒对于党员的教育“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2]706}。

毛泽东的文化自觉表现在自觉坚持先进文化方向、在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探索文化发展规律等等。第一是自觉坚持先进文化方向。在北京大学

的半年是毛泽东直接接触当时中国的文化精英，并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开始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阶段。早在1919年他就创办《新湘评论》并宣示“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7]294}。1920年上半年，毛泽东针对“湖南人现在的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的现状，认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所以眼下推广新文化这一当下急务的基础是给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提供新研究的材料，把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为此，他以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着手筹建文化书社，希望“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人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11]498}，醉心于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实践。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苦苦寻求救亡中国道路的毛泽东以强烈的示范和感召作用，他欣喜地发现并充分相信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理论优势，最终自觉地拿起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武器，坚定选择并成功引领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第二是充分发挥先进文化作用。从毛泽东对文化的定义以及他对于共产主义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的积极影响可以看出，他已经意识到文化的积极作用与重要意义。他曾经肯定地指出“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5]125}；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指出“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2]692}；在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直面陕甘宁边区发展中文化方面的实际困难，提出了提高民众科学文化水平以发展文化的倡议。同时，他也特别强调通过文艺活动及其教育提高人民群众道德素质与行为素养，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毛泽东对文化作用价值的强调贯穿始终，不仅特别重视文化对于开启民智的功能与作用，而且注重其对挽救国家危亡，实现民族独立自强的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更是希望通过文化与文艺来达到全面提高人民素质、更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主观上

也是希望通过一场彻底的文化洗礼来涤荡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与习俗，以更好更快的建设社会主义。第三是积极探索文化发展规律。毛泽东对于文化的发展规律有清醒的认识，他曾指出：“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新文化也是这样，二十年中三个曲折，走了一个‘之’字，一切好的坏的东西都考验出来了。”^{[2]704}这是实践在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从文化的定义中也看出，毛泽东对于文化与经济、政治关系的规律也是把握非常精准的。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更加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理念：“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7]855}毛泽东也明确认识到，“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8]345}具体到新文化建设上，毛泽东从文化“为政治服务”到“为工农兵服务”，再到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提法的转变，体现了他对于文化的自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发展原则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方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2]706}等等，都体现了毛泽东对于文化发展规律的系统总结与思想上理论上行动上的高度自觉。

三、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是国家使命、民族担当与世界责任的统一

毛泽东高扬文化自信，自觉地把文化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与义务，指出，共产党人“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2]663}。在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大背景下，一方面，“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具有高度一致性，“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2]539}；另

一方面,“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同样是高度统一的,因为“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2]521}。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现时中国的革命包括中国的文化都是服务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完成中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这两个既互相区别又互相统一的两大任务,“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2]663}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重任,也是其文化使命。这两种使命是内在地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可须臾分割,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息息相关,政治革命尤其需要文化的发动与助力。正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大背景下,中国人民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具有了高度的一致性,中国的民族革命与民族文化建设既具有国际意义、成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又承担着建设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与文化的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抗日战争及其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建设与动员就实现并体现了国家使命、民族担当与世界责任的有机统一。

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的革命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不但将影响到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推动各国首先是印度等被压迫民族的进步”^{[2]474},“不但是解放中国的旗帜,而且是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的……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5]185-186}……这些重要论断都鲜明地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肩负国家使命、民族担当与世界责任并将三者有机统一的伟大担当精神与强烈革命意识。

此外,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还是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内在统一。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体现了其深邃的历史眼光与强烈的实践逻辑。文化自信源于“古”而成于“今”,唯有源自历史的文化自信,才是有“根”和“魂”的文化自信。毛泽东强调要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裂历史,而尊重历史的辩证法就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强调当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是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并指出,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同时,毛泽东还指出,现在所要建设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尽管“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2]705},但还不是社会主义文化,这是由“现阶段革命的基本任务主要地是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的革命”^{[9]705}所决定的。既坚持科学的历史的辩证法,又不超越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及其历史实践与任务,坚持了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常说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四大家族 [EBOL]. <https://www.chinanews.com/cul/2011/08-12/3254582.shtml>.
- [2]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毛泽东早期文稿 [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 [4]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7] 《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 毛泽东早期文稿 (1912.6-1920.11) [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 [8]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9]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陈童敏】

《黄帝四经》中“理”的治世功能及其当代启示

董颖波，高春花

(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25)

摘要：《黄帝四经》是道家思想的重要文本，“理”是其中的核心概念，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含义。“理”作为“道生法”的中间环节，既是“道”的具体表现，又是“法”的正当性来源，它既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又是判断是非、善恶的依据和标准，具有价值论和实践论意义。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治理的双重视域下，“理”所呈现的治世功能，对于践行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以道为根本，以法为保障，以理为枢纽的治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黄帝四经》；理；法；道；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49(2024)03-0087-05

《黄帝四经》中的“理”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粹，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其哲学理念、治世功能，对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黄帝四经》中“理”的意蕴

在《黄帝四经》的《名理》篇中，“理”的主要内涵得到了集中阐释。首先，“理”是贯穿于事情始终的。其次，“理”是一种判断是非的标准。第三，探求“理”就是体察天道，认识自然和人事的规律。

(一) 一切事物贯穿于“理”

《黄帝四经》中所提到的“理”是事物的客观规律的具体表现。事物自始至终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那么“理”就是贯穿事物始终的，只不过随着事物发展的具体阶段、形态、特征的差异，“理”也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理”不是瞬时性的。所以人们应当“见正道循理，能与曲直，能与终始”^[1]。人们应当认识到事物在空间上的稳固性和在时间上

的延展性，认识到事物内部的自我同一性，以连续的、发展的、变化的眼光看问题。

既然“理”是贯穿事物始终的，那么“道”是不是贯穿事物始终的？“道”如果是传统主义所说的那样不可变、不可移的，那么是否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有所矛盾呢？其实不然。在《黄帝四经》中，“道”虽是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总规律，但它不具备具体的形式，能够顺随万物的特点进行变化，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不谋而合。因而尊重“道”、遵循“理”，不是一种传统或保守的态度，而是发展的、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态度。贯穿事物始终的“理”其实是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一种具象表达。

(二) 是非判断依循于“理”

“理”是判断事物是非的标准，但不是终极标准。“名[理者]循名究理之所之，是必为福，非必为灾”^[2]。在《黄帝四经》中，“道”是决定一切的力量。而因为“道”不容易被人们认识，所以，需要“理”这个判断标准为“道”服务，而又比“道”更加通俗易懂。有了“道”，就有最高的方向，有

收稿日期：2024-04-11

作者简介：董颖波（1996-），女，汉族，甘肃平凉人。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春花（1964-），女，汉族，河北东光人。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了“理”，就有具体可遵循的规则。

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理”是可以用语表达的。一件事物能讲出一种理，但是在讲出一种理的同时，又很可能否定了与此相反的另外一种理。因而，“理”是不完全的。举个例子，在很多同学读高中的时候，高中班主任经常会说“现在你只需要做好一件事，那就是准备高考，不要做与高考无关的事”，班主任强调“高考成绩很重要”这个“理”，但是否认了“做与高考无关的事也有意义”这个“理”。如果有同学爱思考宇宙人生的大问题，而因为他所思考的内容与高考无关而被班主任要求“改正”，那么他必然会感到遭受了压抑与否定。由此可知，在同一件事上，从不同的角度所看到的不同的“理”并不能互相说服。

由于“理”只是事物具体的标准而非普遍的标准，因而在“理”的层面无法化解的矛盾只有在“道”的层面才能化解。“理”作为是非判断的标准有其限度。

（三）好的结果得益于“理”

人们在实际行动中总是追求一种理想的结果，而《黄帝四经》中的“理”为人们得到一种好的结果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标准。人们的行为如果顺随客观规律，就能得到所期望的结果。当然，此处的“理”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明确、不断检验。

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理”不是一成不变的，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人们在遵循“理”的同时，不可认死理、不知变通，而应该根据特定的情境、特定的实际情况而进行变通，将那些的确能实现一件事物的“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理”进行保留，而摒除那些背离目的、规律的，已经过时的、对事物的发展有阻碍的“理”。

二、“理”的治世功能

《黄帝四经》中的“理”的治世功能主要可以从“理”与“道”的关系，“理”与“法”的关系，“理”所处的位置三个方面来进行理解。“理”由“道”所决定，而能指引“法”，这可以看出“理”在“道生法”的治世愿景中承担着重要功能。

（一）“理”承接“道”，体现以道治世

《黄帝四经》核心的观点是“道生法”^[3]。在“道生法”中，“道”是居于“法”之上的决定性的指导力量，它生发法、约束法，使法来自于道、服从于道、践行道、最终回归于道。《黄帝四经》强调道的作用，“既不像原始道家那样‘蔽于天而不知人’，也不像儒法诸家那样‘蔽于人而不知天’，而是使天人之间保持着一种合理的张力”^[4]，它克服了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弊病，克服了法家“严而少恩”的缺点，能够避免造成类似于秦国一反周王室之礼乐文明，将法家发扬到极致而造成的那种悲剧。^[5]

春秋末期，老子“首次视人的思想视野从现象界提升到‘道’的领域，从而将道与物的关系纳入到整体性的理论建构中”^[6]。但《老子》里面只有“道”没有“理”，《黄帝四经》使得“理”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抽象性的哲学概念。^[7]相对于“道”的抽象性、综合性、统一性而言，“理”更具有具体性、分析性、差异性。“‘理’反映的是‘道’与‘物’之间的关系，是具体事物合于道的属性和状态，是普遍的和统一的大道在有名有形的具体物上的一种呈现和分有”^[8]，“道”是唯一的、普遍的，“理”是多样的、不同的。

值得注意的是，“道”对“理”的决定和指引作用，不仅肯定了“道”对于万事万物恒定存在的那一面（“静”）的决定作用，也肯定了“道”对万物流转变化的那一面（“动”）的决定作用。事物之“理”中既有变化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且很有可能两面都是符合“道”的指引的。因此，任何一个被明确表达出来的“理”，不能穷尽“道”的全部，它仍承担着“道”的某种未能用语言表达出的内涵。我们按照一事物的“理”去追究其对错，一方面可以使得合理的部分得到尊重和保留，不合理的部分得到修改和调整，另一方面，也要更加学会从另一面来看问题。

（二）“理”落实于“法”，实现以法治世

“理”就是《黄帝四经》中所提到的“法”所涉及到的“抽象规律”和“具体规范”两面中的那个“抽象规律”，是黄老政治哲学将老子的道论引入到现实政治秩序和国家治理层面的重要环节^[9]。“理”是万物的“名”所对应的那个由“道”决定的不变

的部分,是“万物适合于自身的分际与分度”^[10]。但是,“理”只能通过人们的理解和接受而作用于现实的行为,而无法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强有力的约束。“理”应该落实于法,才能发挥其效用。“理”对“法”的指引和制约与现实政治秩序密切相关,《黄帝四经》中的“理”给“什么样的政治秩序是正当的”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回答,它“利用‘理’论证‘道’与‘法’结合的统治的正当性”^[11]。

“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12],法只有受到“理”的指引和约束,践行“理”所揭示的价值标准,才能准确无误地判断是非对错,而不至于缺乏价值指引而走向其自身的反面。法的制定应该以理为标准 and 方向。《老子》的政治哲学认为统治者可以通过道来进行自然无为的统治,而对于道应该如何落实于具体的实践并未进行过多论述。黄老学派提出的“道生法”突破了老子政治哲学的局限,将统治者循道而进行统治的行为变得具体、可操作。而“‘道生法’的过程,正是‘理’的作用得以凸显的过程”^[13]。

(三) “理”沟通“道”“法”,推动综合施治

有学者认为“理”有四层含义:(1)道的规律性的表现;(2)秩序、度的体现;(3)义理;(4)万物合于道的本性。^[14]也有学者从自然与社会两个层面来理解“理”的内涵:(1)自然界万物的不同性质与规律;(2)社会成员不同的分工、角色;(3)君臣之间相应的政治规范与伦理。^[15]“理”是沟通“道”与“法”的中间环节,“理”的功能一方面在于使“道”具体化,一方面在于使“法”明确化。

如果没有“理”,抽象的“道”不容易被人们理解,具体的“法”不容易呈现出理性精神。正因为有了“理”,“道”也才能够下沉到统治实践领域,“法”才有了可以理解的正当性,而“道生法”才能真正实现。“道”通过“理”来落实于“法”,“法”通过遵循“理”而通向“道”,这个过程离不开“理”的枢纽作用。人们经常提到一个词“道理”,这个词将“道”与“理”合并起来,这是汉语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双音节化现象。也正是因此,人们不容易察觉到“道”与“理”的细微差别,乃至常

常将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事实上,“理”与“道”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三、“理”的当代启示

通过对“理”治世功能进行深入探究,可以得到对于现代国家治理的启示。国家治理应该以道为根本,以法为保障,以理为枢纽,实现综合施治。

(一) 国家治理要以道为根本

《黄帝四经》认为“道”就是一切事物的来源和根本,是决定性的力量。国家的性质和发展道路选择,是国家治理的来源和根本,对国家治理起决定性影响作用。

以道为根本,就是坚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初心、使命,是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组织的心理力量来源,它直接决定了人们做事的境界高低、成果好坏、持久程度。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人只有为全人类劳动,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马克思关怀的是全人类。而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同样具有极高的精神境界,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站在了人类文明的顶端,站在了马克思这位思想巨人的肩膀上,因而对此种精神境界进行继承和转化,使得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有高度的责任意识,纯粹的使命担当,以所有中国人民的幸福为己任。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自成立以来,领导人民克服艰难困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困难和阻碍,很多时候甚至需要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中国共产党人都没有放弃,没有退缩,始终如一,团结奋斗,这些成就充分证明了坚守初心使命的重要性和实践意义。

以道为根本,就是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它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与当时欧洲社会中的现实情况紧密相关,但更有它值得学习的普遍意义。工业革命使得欧洲各国生产力飞速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确立,资本家们通过财富

积累而日益实现财富自由，但是生产线的另外一端则是劳苦功高而又衣食不饱的血汗工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分析，他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体系之内，工人们不可能获得真正平等的待遇，他们只能时刻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状态中。马克思站在底层人民的阶级立场上为他们代言，发出了“消灭私有制”的呐喊，在社会主义理想的指导之下，底层劳工的生存与繁衍才有可能得到经济和制度方面的保证，他们才可能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中国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外来侵略，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不是靠任何资本主义思想而扭转的，而是靠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因而，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就是坚持国家治理的正确道路。

以道为根本，就是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奋斗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人生的意义在于奋斗。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主要矛盾，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吃苦耐劳、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因而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而，党领导人民持续奋斗，为了解决这一主要矛盾而持续不断努力，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而作出的新贡献。

（二）国家治理要以法为保障

《黄帝四经》中认为“法”是“道”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对人们的行为实现约束的具体规范。在当代社会中，国家治理的具体法度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上。

以法为保障，从广义角度来说，首先包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思想成果，它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在党的领导之下，我们应当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道”落实于中国具体实际中所产生的具体的“法”，是人们借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的窗口和指南，人们的行为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指导和规范，能够帮助人们更深刻地体会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由此可见“道生法”的古典智慧在当代社会依然可以熠熠生辉。

以法为保障，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依法治国就是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要坚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又要扎实推进依法行政，还要严格公正司法，并且加快建设法治社会。此外，每个公民应当提高法治意识，自觉学法、守法、用法，通过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尊重和信仰法律权威，以法律为自己行为的底线。政治制度从积极引导人们向上向善的方面为人们设定了行为规范，而法律体系则从如何防范恶、惩治恶、如何坚守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方面对人们的行为实现了约束。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道”落实于中国具体实际的“法”的表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思想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重视公平正义、关心人民福祉的精神境界，能够促进人们更好地实现美好生活追求，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三) 国家治理要以理为枢纽

《黄帝四经》认为“理”既是“道”的具体化,对“法”有着指引作用。在当代社会中,我们一方面要明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本义,一方面要观察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通过这两方面的学习和思考,更好地坚持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以理为枢纽,就是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行理解和阐释。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政治经济批判,并提出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宏伟蓝图,号召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具有非常强大的逻辑性。当代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仅应该学习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还应该明确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并且通过与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对话而学到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理性思辨能力的人不容易迷信、盲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是需要独立思考的。独立思考就是要以尊重事实、追求真理的态度来客观地辨析文本的观点、自己的观点,从而更深地理解文本,理解自身。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主体视角,从而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进行对话,也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会成为看世界的不同眼光,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在当代社会中展现出不同的侧面。

以理为枢纽,就是要关心和回应中国的现实问题。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挑战,既有来自西方国家的打压,也有来自封建保守势力的阻碍,社会变革的进程是不容易的,但是一直寻求着先进思想的引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救国方略都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先生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君主专制制度,为引领救亡运动的新的思想的传入提供了条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促进

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由中国近代史可见,中国人面临的现实问题就是救亡图存,是改变悲惨的命运,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现实中出现很多具体的问题,人们在学理层面寻求指导,就必然绕不开最切实的需要。在此种境况下,马克思主义的及时出现对中国人来说就如黑夜之中见光明,因而被中国人广泛而深刻地接受,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综上所述,我们从《黄帝四经》的“道生法”的治世理念中提炼出来的“道”“法”“理”这三个层面的深刻内涵,能够对当代国家治理带来深远启示。我们应当坚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应当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应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法律制度,应当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行理解和阐释,并且关心和回应中国现实问题,并持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成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 [1][2][3][6][7][8][12] 陈鼓应. 黄帝四经今注今译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188,187,2,2,2,2,187.
- [4][9] 袁承维. 道法转关: 从《黄帝四经》道法关系看天人合一 [J]. 天津社会科学, 2022(03):147-153.
- [5] 赵明, 向达. 《黄帝四经》“隆礼重法”的治道意义探析 [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8(04):82-88.
- [10] 姚裕瑞. 从物之则到民之宜——《黄帝四经》“理”的思想和构造 [J]. 中国哲学史, 2021(04):37-46.
- [11][13][14][15] 刘世宇. “无为自然”向“法”治转变的可能性与正当性——《黄帝四经》“理”的意义浅析 [J]. 现代哲学, 2014(01):123-127.

【责任编辑: 温开照】

中国传统雕塑艺术在现代城市文化 建设中的应用与推广

吴为山¹, 余文星²

(1. 中国艺术研究院, 北京 100029; 2.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江门 529000)

摘要: 城市雕塑是城市文化和精神的展现载体, 在现代城市文化建设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雕塑历经几千年发展, 形成了独特的制作方法、风格特质、造型理念, 能够生动展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特色。新时代中国城市雕塑需要借鉴、应用传统雕塑的造型方法、形态语言、观念意境等诸多元素, 让雕塑作品展现地方特色、弘扬中华文化。从传统雕塑在当代中国雕塑中成功应用的实践案例, 我们看到传统雕塑能够推广的根本在于雕塑家们自觉将弘扬民族精神和拓展艺术形式作为创作追求, 具体方法包括突出公共艺术审美特征、深挖中华文化传统、运用多种雕塑形式语言等。

关键词: 传统雕塑; 城市雕塑; 公共艺术; 城市文化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3-0092-07

中国传统雕塑从主题和功能出发, 可分为陵墓雕塑、宗教雕塑和装饰雕塑三类; 由古至今, 秦始皇陵兵马俑、大足石窟、天津泥人张彩塑等经典作品数不胜数。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 中国传统雕塑艺术形成了独特的制作方法、风格特质、造型理念以及“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 生动展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文化传统。近现代以来, 中国传统雕塑受西方雕塑的冲击很大, 近现代中国的雕塑教育体系的发展也历经学习欧洲、苏联和本土化、民族化尝试。对于中国传统雕塑, 当前中国雕塑界的态度基本有三种: 自觉型、盲从型、否决型。自觉型和盲从型的雕塑家均对传统雕塑秉持继承、弘扬的态度, 只是后者缺乏对传统雕塑的深入研究和理性思考, 吸收浮于表面; 而否决型奉欧洲雕塑为正宗, 对中国传统雕塑唯恐避之不及。^[1]

尽管中国雕塑界看待传统雕塑的观点差别如此之大, 中国传统雕塑仍在这些认知冲突中确立了其在中国现当代学院雕塑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其造型

方法、形态语言、观念意境等在当代焕发新的魅力, 培育、诞生了一批批具有民族艺术精神的中国雕塑家和一件件能够表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征的雕塑作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3]。“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 凸显出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自觉。中国传统雕塑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更应该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发现解决存在的问题、得到时代精神的激活, 使其更好地走进新时代的新征程, 展现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自信的文化底气。

针对中国传统雕塑在当下的问题, 学界已有不少研究。陈雪华指出, 越是民族的雕塑作品越能使人产生共鸣, 中国传统雕塑的东方审美理想、造型

收稿日期: 2024-06-15

基金项目: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4 届访问学者美术学专题研究项目“中国传统雕塑艺术在现代城市文化建设中的应用与推广”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吴为山 (1962-), 男, 博士生导师, 中国美术馆馆长; 余文星 (1975-), 男, 博士,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4 届访问学者 (导师吴为山), 民建广东省委文化宣传教育委员会委员、民建江门市委会文化艺术院院长、江门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语特征影响着中国当代雕塑。^[4] 杜俊平详细分析了中国传统雕塑的意向性、绘画性、实用性特征, 并指出三个特征启示当代雕塑创作应凸显文化性、艺术性、本土性。^[5] 郭继锋则从雕塑教育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古代雕塑对现当代的影响。^[6] 此类成果均认识到传承中国传统雕塑的必要性, 强调学习传统雕塑技法、理念之于当下雕塑创作的意义和价值。不过, 现有研究缺少对中国传统雕塑如何应用于雕塑创作的具体分析。城市文化是城市现代化的根基, 是城市的气质和灵魂。现代城市文化建设离不开雕塑, 中国传统雕塑艺术元素的吸收、应用有助于城市雕塑作品展现地方特色、弘扬传统文化。

一、中国传统雕塑艺术与现代城市文化建设的关系

城市雕塑是城市文化和精神的展现载体, 在现代城市文化建设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件优秀的城市雕塑作品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有鉴于此, 中国美术家协会早在 1982 年就提交了《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雕塑建设的建议》, 并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随即, 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在北京正式成立, 各个省、市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需要纷纷建立相应的城市雕塑管理机构, 在城市雕塑建设上做一些指导性工作。^[7] 四十余年来, 城市雕塑在中国大兴发展, 各地建设了数量巨大的城市雕塑作品, 整体呈现出一种“暴进”式的发展态势。雕塑公司、雕塑之乡、雕塑主题公园纷纷涌现, 集中建造雕塑的长廊、风景线、海岸线、广场、大道等, 成为不少城市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据统计, 截止 2015 年, 仅上海一地的城市雕塑的数量就已近 4000 座。全国每年新增的城市雕塑更在万座以上, 总量应有十多万座。因城市雕塑的建设、报备、管理等并不完善, 全国城市雕塑的具体数字很难统计出来。

中国城市雕塑的总量虽在不断积累, 质量却没有飞跃。因缺乏整体的规划意识, 以及地方观念和管理相对滞后, 中国现有的城市雕塑中存在着一大批艺术水平不高、模仿严重、题材雷同、工艺技术粗糙、历史文脉偏离、与环境不协调、建立和拆

除随意性强的劣质作品。这其中就有很多“限定工程”, 它们不仅在创作主题上受甲方出资人的制约, 制作时间上也要被迫赶工期。一项调查显示: 上海曾对全市的城市雕塑进行普查, 结果平庸的占 80%, 优良的占 10%, 低劣的占 10%。上海尚且如此, 遑论其他城市。^[8] 这些劣质作品不仅没能展现城市文化, 反而破坏了城市的景观和文化品质, 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城市雕塑乱象”也一直是媒体和公众诟病的城市病理, 被反复提及, 严重影响了城市雕塑的发展。

城市雕塑之所以被称为城市雕塑, 是因为城市本身的文化、历史及环境是首位的, 三个因素是城市雕塑建立的基础。城市雕塑作为一种人文景观, 其文化属性、人文创意和人文精神底蕴是首要的。这恰恰是当前中国城市雕塑所缺乏的。现在, “罗马立柱、裸体雕塑充斥高档小区, 叫卖小贩、人力车夫林立各地广场”, 万用元素“不锈钢球”: “书籍撑球”“浪花托球”“双手举球”等各式造型千篇一律, 层出不穷, 自娱自乐之余, 对城市文化的建设而言毫无用处。^[9] 各种圆球、飘带等不锈钢配件批量化地由南京、广州等地的工厂生产, 再模仿国外作品组装成适合“腾飞”“和谐”“兴旺”等当下主题的城市雕塑作品。如图 1 作品, “中国梦”



图1 中国梦 不锈钢雕塑

虽在主题上十分契合当下主旋律的需要; 但从艺术角度来看, 该作品设计平庸、几无美感。由此可见, 中国城市雕塑“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就不是为了所矗立的这座城市而建; 既不符合这座城市的

文化、历史,甚至没有考虑最基本的空间环境。这些没有本土基础的城市雕塑被放置在城市公园、广场等处,只能是破坏景观的视觉垃圾,没有文化的空中楼阁,劳民伤财。

当前,中国的城市雕塑普遍存在诸多症结,其中十分关键的问题就是雕塑作品与本土文化不符,内容空泛、形式简单、水平一般甚至低劣;这样的雕塑作品自然无法得到公众的欣赏,引发公众的共情。实际在 2020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就在关于加强大型城市雕塑建设管理的通知中指出,一些地方的城市雕塑“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偏差”,要求“雕塑内涵与城市历史、文化、景观风貌等相协调”。^[10]近年来,随着公众文化艺术需求的增多和审美水平的提高,能够体现地方特色、讲述历史故事的雕塑作品成为现当代中国城市雕塑建设的必然选择。这就要求城市雕塑创作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学习中国传统雕塑的造型方法、形态语言、观念意境等,以求由中国传统雕塑拓展当代艺术、服务现代城市文化建设。

二、传统雕塑在城市雕塑创作中的应用实践

在一些公众甚至艺术工作者的眼里,中国传统雕塑是历史遗迹和遗物的代名词。一提到中国传统雕塑,普遍会想到历代陵墓装饰、佛教造像,或者是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工艺品。造成这一错误认知现象的原因是,中国雕塑及公众受西方雕塑艺术的影响过深。如若将中国历史上的雕塑作品置于西方审美之下,必然只能看到造型是否准确、结构是否合理等问题,难以发现其中蕴藏着的中国传统雕塑独特的本体语言和意境表达。从根本上看,中国传统雕塑便与欧洲雕塑不同,它不注重结构、形似,讲究人和物的神态及内在精神指向。在诸多程式化的中国传统雕塑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中国人的审美意趣和价值共识,看到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集体的力量。

鉴于中国传统雕塑的独特之处在于其造型方法、形式美感、观念思想等,其在现当代城市雕塑

中的应用便是这些元素的借用。线刻、浮雕、圆雕的技艺手法,“由方见圆”的空间表现,“精、气、神”等美学理念,诸如此类的传统雕塑元素均曾出现在一些优秀的城市雕塑作品之中,如钱绍武的《李大钊纪念像》《闻一多像》《阿炳像》、吴为山的《天人合一——老子》《空谷有音——老子出关》《孔子》、曾成钢的《神鹿》《绵羊》,如此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与当代雕塑语境形成了很好的结合。

钱绍武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公派留学苏联的雕塑家之一,在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雕塑系深造,深受苏联现实主义雕塑的影响。他在创作的雕塑作品中,充分借鉴了中国传统雕塑线刻、浮雕的造型方法,整体注重彰显中华传统。其代表作《李大钊纪念像》(图 2),李大钊的肩膀宽 7.5 米、厚近 3



图 2 钱绍武《李大钊纪念像》1991 年

米,从头顶到衣领也高达 3.1 米。该纪念像省去李大钊肩部以下所有部位,艺术地夸大李大钊的肩膀,并在头部突出方正特点;汲取汉魏“方多于圆”的传统理念,将一切细节做浮雕处理,在方硬中展现李大钊的个性特点。

钱绍武等老一辈雕塑家西学东渐、博学众采,他们将中西雕塑融会贯通的特质深深影响了之后的中国雕塑家们。当代著名雕塑家吴为山基于对中国传统雕塑的梳理、研究,提出写意雕塑的概念与审美理想。他的写意雕塑重视生活体验和情感表达,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晶;从审美理想来说,是朴拙的大美,是中国道家哲学所涵盖的朴素之美。^[11]其代表作《天人合一——老子》(图 3)塑造了一个

硕大中空的身躯,“空”字型山洞表征老子“无,名天地之始”“有生于无”的哲学思想;内空外实、上实下虚的整体造型容易使人联想到老子“虚怀若谷”的处世原则。外形处理上,粗犷的、流线的、大块面的表现语言,不禁感叹吴为山所追求的流畅的线性审美。吴为山的写意雕塑展示了中国艺术的精神,它与中国传统

绘画、书法中追求的意象表达有异曲同工之处。从作品中可以看到,吴为山有意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雕塑作品中的精神主导。

与前两位雕塑家一样,曾成钢亦受过严格的西方艺术写实语言训练,但他认为写实语言在中国雕塑界始终有一种“未烧透”的感觉。与此同时,对“东方性”的迷恋,促使他考察、研究中国传统雕塑,并将之进行现代性转换。代表性作品《神鹿》(图4)的结构就脱胎于青铜器——鼎的造型,其身体的大块块与长而尖细的腿部之间的压迫性关系,加剧了空间的紧张感,强化了动物的性格属性。这种空间处理方式是将中国古代青铜造型应用于现代雕塑创作的成功实践,青铜器的体积感、曲直和方圆节奏让他的雕塑作品富有原始的、民族的中国特色。曾成钢认为,中国雕塑与西方不同,它有自身的体系,其实践环境与国家复兴、城市更新联系在一起。我们在观看其雕塑作品时,亦应当注意到他对中国雕塑传统的



图3 吴为山《天人合一——老子》2005年

学究式考察与研究,看到他对东方雕塑的精神光芒的追寻。

综合来看,由钱绍武、吴为山、曾成钢及他们的雕塑作品案例可知,中国传统雕塑的诸多元素已经在现当代的中国雕塑创作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这些优秀的雕塑作品无论造型方法还是审美意境都具有独特的东方传统,尽显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讲,从中国传统的再发现,到“传统雕塑的现代性转换”为核心的雕塑美学建构,大体勾勒出了新雕塑美学的基本脉络与轮廓。中国传统雕塑的诸多元素在现当代城市雕塑创作中的运用成功激活了中国传统雕塑,表明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的中国传统雕塑得到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持续涵养中国式现代化。可见中国传统雕塑艺术应用与推广的必要性和意义都十分重大。

另外从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角度看,这些借鉴了中国传统雕塑的新雕塑作品也成功展现了中华文化的自信。近年来,拥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的中国雕塑作品不断走向世界,在世界平台上频繁亮相、展览,保持着与世界雕塑艺术的持续对话。如吴为山的《天人合一——老子》亮相卢浮宫国际美术展,并获得“2012卢浮宫美术展”雕塑类金奖;《鉴真像》立于日本东京上野公园;《神遇——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立于希腊古市集;《马克思像》成为马克思故乡德国特里尔市的文化地标。^[12]中国传统雕塑、中国传统艺术中有无尽的文化矿场,值得持续、深入地挖掘,这亦是中国艺术在世界的立足之本。

三、传统雕塑在城市雕塑创作中的推广方法

《新时代中国雕塑的传承与发展研究报告》指出,“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和“传统雕塑风神”是“中国雕塑的伟大传统”。新时代中国雕塑“有‘魂’有‘体’”,透现出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和以爱国主



图4 曾成钢《神鹿》2013年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13]该报告强调,中国雕塑的伟大传统是新时代中国雕塑传承的文脉。既然如此,中国传统雕塑艺术在现代城市文化建设中的推广主要就是传统雕塑的造型方法、审美理念等诸多元素在城市雕塑创作中的推广。参照中国传统雕塑在现当代城市雕塑创作中应用的成功案例,我们看到传统雕塑能够推广的根本在于雕塑家们自觉将弘扬民族精神和拓展艺术形式作为创作追求,具体方法包括突出公共艺术审美特征、深挖中华文化传统、运用多种雕塑形式语言等。

首先,城市雕塑作为一种公共艺术,其建设需要充分考虑公共艺术的六大审美特征——主体性、社会性、历史性、空间性、开放性、物质性。主体性是雕塑家个体独立的再现,社会性是社会背景、逻辑的考量,两者既有冲突亦需兼顾。历史性意味着对历史文化的传承。空间性则是城市雕塑作为一种社会空间的生产,为城市公共空间注入生机。开放性要求城市雕塑必需考虑公共审美取向,需要有公众自由的参与和互动。物质性是指城市雕塑离不开必要的物质媒介,需要依靠材质的表现力。^[14]这就要求新时代城市雕塑的创作在继承中国雕塑传统、规避完全地西方评判标准的同时,突出其作为公共艺术的六大审美特征,在保持艺术公共性的同时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

其次,城市雕塑是城市历史与文化的凝结点,一件优秀的城市雕塑作品需要挖掘所置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了解所置城市独有的人文情怀。真正从

历史文脉展开,寻找最能代表那个城市的切入点,运用传统与当代的雕塑手法,才能凝练、塑造出历史与当代共通的优秀雕塑作品。例如,苏州站南广场中央及左右两侧设置的吴为山创作的范仲淹(图5)、伍子胥、言偃、泰伯、祖冲之、孙武、白居易和顾炎武8位历史文化名人的青铜雕塑。8位名贤既是苏州的历史名人,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不仅代表苏州,更代表了中国,对中国历史社会的进程与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8座雕塑张扬写意传神,承载中华之魂,展现苏州乃至中国深厚的历史人文气息。

再次,新时代中国雕塑既可以是写意的、写实的、人物的、主题性的,也可以是传统的、当代的。中国传统雕塑诸多元素的应用推广也不能是削足适履、生搬硬套,需要考虑城市不同区域适用的雕塑艺术风格。在一些老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人文历史景点等区域,偏向于中国传统雕塑的题材、造型,将会符合雕塑作品放置的环境,能够与周围的文化氛围相得益彰。而对于放置在现代化的城市街区的雕塑作品而言,它们需要更加当代的表现语言,如此才能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将新都市的时代气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例如,坐落在上海浦东世纪广场上的景观雕塑《东方之光》(图6),是设计师夏邦杰(法国)、陈逸飞的创意,由北京的年轻雕塑家仲松设计,有文称其是“民族文化和现代艺术的完美结合”。该雕塑的创意取材于中国古代的计时器——日晷,设计、建造却是借助现代不锈钢管、



图5 吴为山《范仲淹》2012年



图6 夏邦杰、陈逸飞创意,仲松设计《东方之光》2000年

辅助钢材,技术上还需现代天文测定的支持。这座垂直高度达20m的金属雕塑,既雄伟大气,又通透灵秀;既引人注目,又不妨碍行人和车辆的视线。

最后,除雕塑家个人的自觉外,中国传统雕塑艺术在城市雕塑中的应用推广还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管理、中国和地方雕塑学会(协会)的引导、普通公众的参与。第一,城市雕塑作为一种公共艺术作品,其规划建设需要建立完善的多元决策机制,充分听取雕塑家和公众的意见,避免因过多行政干预、领导个人意见而造成“审丑”、粗制滥造、艺术性低等问题。政府相关决策机构领导也应提升自身决策水平和审美能力,不能盲目实施城市雕塑建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其发布的关于加强大型城市雕塑建设管理的通知中指出,城市雕塑建设要“保护和传承历史文脉,塑造城市特色风貌,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中国精神”,并强调“雕塑形体与城市功能、环境、空间尺度相匹配,雕塑内涵与城市历史、文化、景观风貌等相协调”。^[15]第二,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负责对各地城市雕塑建设、维护的指导监督工作,可以在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同时,提倡、鼓励、要求各地雕塑家在设计作品时适宜权衡传统与现代,学习、传承、应用中国传统雕塑的诸多元素。第三,全国和地方的雕塑学会(协会)是团结、组合全国各地、各民族雕塑工作者的专业组织,推动雕塑学术研究和艺术水平的提升。就传统雕塑在城市雕塑中的应用、推广而言,雕塑学会(协会)可以借助展览、刊物、会议等形式开展引导工作,鼓励创作更多有民族特色的雕塑作品。第四,所有城市雕塑都是面向公众的公共艺术作品。故在培训、提升领导干部和相关管理人员的艺术知识水平外,还需大力开展城市雕塑宣传工作,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线下宣讲普及城市雕塑的相关知识,提高社会公众对城市雕塑的关注、认识。只有公众充分参与的城市雕塑作品才真正实现了城市雕塑的公共艺术属性。

四、结语

文化艺术是人民群众凝聚思想共识的重要载

体。城市雕塑作为一种公共艺术,其特殊的艺术语言和强烈的感染力,使其在塑造、宣扬城市文化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引领和传播优势,能够很好地凝聚人民群众的思想共识。众所周知,现代城市建设应尽力避免“千城一面”,需要保留、延续这座城市所原有的历史故事、文化传统。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有中华文化底蕴、能彰显地方特色的雕塑作品代表着本地文化、体现人文精神,既能展现这座城市的品质,又能增强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内涵,扩大这座城市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雕塑是艺术地记录城市历史和文化最有效的方式,城市的雕塑水平直接决定了城市的特色、城市的品格和城市的未来。作为公共艺术的城市雕塑是现代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文化最直观、最显见的表现载体。新时代的中国雕塑应尽力推进传统雕塑的现代转化,雕塑作品需要讲中国语言、具有中国特色,强调继承传统雕塑的诸多元素便是一种延续中华民族传统、弘扬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措施。这种传统与现代结合的雕塑创作有助于弘扬民族传统、增强民族自信,也便于和世界各地开展更多的文化艺术交流互动。另外还需强调的是,新时代中国雕塑应该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可以有多种主题、多个形式、多样风格,雕塑创作不能走向为了彰显民族特色而勉强应用传统雕塑元素的歧途。

参考文献:

- [1] 解少勃. 中国传统雕塑的发展特征及当代选择[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04):45-48.
- [2] 习近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EB/OL]. (2022-06-03) [2024-04-10].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0603/c1001-32437873.html>.
- [3]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 (2021-07-01) [2024-04-10].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7/01/content_5621847.htm.
- [4] 陈雪华. 中国传统雕塑的造型民族特征及其对当代中国雕塑的影响[J]. 电影文学, 2007(18):85-86.
- [5] 杜俊平. 中国传统雕塑的艺术特征及对当代雕塑创作的启示[J]. 大舞台, 2013(10):108-109.

- [6] 郭继锋.论中国古代雕塑对中国现当代雕塑教育的影响[D].西安美术学院,2017.
- [7] 孙峥.走向更新的城市雕塑——专访王中[J].美术观察,2021(03):12-15.
- [8] 中国城市雕塑的观察与思考:公共艺术需要规划.[N/OL].(2011-09-23)[2024-03-26].<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11/09-23/3347932.shtml>.
- [9] 李宏.城市雕塑,何去何从?[N].光明日报,2015-11-14(09).
-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大型城市雕塑建设管理的通知[EB/OL].(2020-09-29)[2024-03-26].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0/09/content_5549947.htm.
- [11] 谢渊.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吴为山写意雕塑的美学价值与时代意义探析[J].中国美术研究,2023(02):160-164.
- [12] 陈洁.让中国故事向世界永恒“塑”说[N/OL].(2023-03-01)[2024-03-26].https://wenyi.gmw.cn/2023-03/01/content_36399853.htm.
- [13] 新时代中国雕塑的传承与发展研究报告(简版)[N].人民政协报,2022-08-08(10).
- [14] 查常平.公共艺术的六种特性——对朱成作品的审视[EB/OL].(2010-12-14)[2024-03-26].
- [15]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大型城市雕塑建设管理的通知[EB/OL].(2020-09-29)[2024-03-26].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0/09/content_5549947.htm.

【责任编辑:余伟】

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路径创新研究 ——以河源市为例

河源市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

(河源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河源 517001)

摘要: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 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是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要“用好红色资源”。坚持守正创新, 才能更好实现“用好”目标。创新展陈方式、打造精品陈列; 创作优秀文艺作品、讲好红色故事; 探索与时俱进的传播方式、推进红色资源数字化……坚持在保护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火”起来, 才能更好地从革命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增强砥砺奋进的信心和勇气。

关键词: 用好红色资源; 守正创新; 讲好红色故事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3-0099-06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 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是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开发工作, 反复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河源是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它涵盖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遗址和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涉及革命战争年代内容的纪念设施, 具有革命性、传承性和实践性”。因此, 要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 必须重视保护利用开发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引导党员干部在重温经典中传承红色基因、坚定党性觉悟, 更好凝聚人心、组织力量。

一、河源市红色资源的现状

在河源这片红色的土地上, 阮啸仙、刘尔崧、黄居仁等早期的共产党员曾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 以革命思想的火种唤醒广大民众的觉悟意识; 周恩来、澎湃、叶剑英等革命先辈曾莅临指导工作, 推动武装斗争, 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中共东江特委等领导机构和东江纵队等革命武装曾战斗于东江两岸, 保家卫国, 打击日寇侵略; 粤赣边支队等革命力量曾取得震撼岭南的“五战五捷”重大胜利, 为广东乃至全国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河源人民在中国革命的斗争过程中所形成的革命精

收稿日期: 2024-06-05

基金项目: 2022 年广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良好课题成果

作者简介: 河源市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 组长: 林惠鹏(1964 年-), 男, 籍贯: 潮州市饶平县, 河源市社会主义学院二级调研员、原副院长, 主要研究方向: 党的创新理论; 成员: 林桂英(1980 年-), 女, 籍贯: 汕头市澄海区, 河源市社会主义学院二级主任科员, 主要研究方向: 红色文化; 张晓晖(1970 年-), 女, 籍贯: 河源市龙川县, 河源市社会主义学院四级调研员, 经济学管理师, 主要研究方向: 经济学; 叶彩萍(1970 年-), 女, 籍贯: 河源市连平县, 河源市社会主义学院一级主任科员, 畜牧兽医师, 主要研究方向: 红色文化; 李勇根(1985 年-), 男, 籍贯: 河源市连平县, 河源市社会主义学院三级主任科员, 主要研究方向: 乡村文化; 执笔人: 林桂英。

神,以及所遗留的革命遗址共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河源红色资源。

(一) 红色资源种类丰富。根据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 2020 年的普查结果,河源有革命遗址遗迹 685 余处。按基本类别分,有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 307 处,重要历史事件发生地和人物活动旧址 215 处,革命领导人故居、旧址 74 处,烈士墓 17 处,在册烈士共 2446 名;按保护级别分,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7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5 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52 处,尚未核定的不可移动文物 29 个,未评定级别的文物 572 个。从红色村数量看,各县区登记上报红色村 15 个,其中东源县船塘镇老围村、东源县义合镇下屯村、和平县古寨镇河东村、龙川县廻龙镇大塘村、紫金县苏区镇炮子村等 5 个村为中组部推动红色村组织振兴建设红色美丽乡村试点村。从红色旅游景区看,全市已开发利用的红色旅游景区共有 33 处,其中闽赣粤边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及兵工厂旧址、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指挥部旧址、紫金县苏区镇红色旅游区等 18 个红色旅游资源被列为省级重要红色旅游资源,闽赣粤边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旧址及兵工厂旧址于 2017 年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

(二) 精神价值凸显。一是开风气之先,勇于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精神。阮啸仙、刘尔崧、黄居仁等河源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在当时流传的各种社会思潮中,经过比较鉴别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二是敢于跳出窠臼、探索革命新道路的精神。以刘尔崧和阮啸仙的一个事迹为例,广州原有一个学生组织,即广东省会学生联合会(简称“省会学联”),这个组织的领导者秉持“和平行事,不宜过激主张,都是读书救国论者”^[1]。刘尔崧意识到不改变这种思想就无法开展爱国运动,阮啸仙等人也竭力反对闭门读书、不从事实际斗争的错误主张,认为其实质上是和平妥协,并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2]后经过两人的大量努力,影响了大多数省学联学生,最终成立广

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省学联”),刘尔崧与阮啸仙等当选为省学联负责人,为以后广东爱国学生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三是勇于实践、敢于开拓的精神。阮啸仙、刘尔崧等是广东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在新民主主义早期斗争的过程中,他们注意到青年的力量,创办青年社团,组建新学生社,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后备力量,为革命的赓续奠定了重要人才基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河源市红色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成效与做法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河源高度重视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取得良好的成效。

(一) 制度引领,保护家底。2017 年以来,河源市制定了《河源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方案》,编制了《河源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修编(2013—2025)》《河源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18—2035)》等文件。2021 年 3 月 1 日,《河源市革命旧址保护条例》正式施行,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

(二) 全面普查,清点家底。2019 年 10 月正式启动河源市革命遗址大普查工作,历经近 2 年的地毯式普查,目前全市有革命遗址 800 余处。2019 年,河源市红色革命遗址数据库正式发布上线,是全省地级市中最早建立红色革命遗址数据库的市。

(三) 抢救修缮,留住家底。2019 年起,河源市以申报“广东省红色革命遗址保护利用项目”为契机,已完成第一批中共九连地委(粤赣边支队)旧址等 19 处重点革命遗址修缮工作,并列入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市级中共党史及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其中,紫金县苏区革命旧遗址群被认定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河源市革命历史(烈士)纪念馆、阮啸仙故居、紫金苏区革命旧遗址群、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指挥部旧址被列为省级党史教育基地。

（四）活化利用，提升效益。一是充分发挥革命遗址的教育价值。绝大多数革命遗址维修后都结合革命史实进行相关展览陈列，成为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学校常态化开展沉浸式红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党性锻炼的基地。二是提升革命遗址的开放管理水平。建成了紫金县苏维埃政府旧址、红色苏区展览馆、“血田”纪念广场、塔岭烈士陵园等一批红色旅游景区，推动红色文化和旅游有机融合。其中，阮啸仙故居、紫金苏区革命遗址群、龙川南客寮兵工厂等被列为广东省红色旅游经典景点，有力提升了河源市红色文化旅游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三是弘扬宣传革命遗址的艺术价值。以文学、音乐、舞蹈、电影等形式创作了一批重现河源革命岁月、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文艺作品，如广播剧《起红谣》、纪录片《河源红》、大型山歌剧《十万挑夫上赣南》、电影及山歌剧《阮啸仙》、紫金花朝剧《赤炮风雷》《阮啸仙》等。

三、河源市红色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面临的困境

（一）保护利用整体谋划不够。河源市对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意识逐步增强，但仍然局限于红色资源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和管理权人，人群范围十分有限，一些重要项目的建设完善很多依靠民间的动议与支持，缺少顶层的前瞻性规划和决策层面的整体性推进。一是缺乏对县（区）和项目的科学统筹。如除河源紫金县外，其他县（区）都没有制定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总体规划。二是在市级层面缺少实际可操作的经费保障机制。如目前河源还没设立市级红色资源保护专项经费。

（二）保护利用协作机制不健全。点多面广、各自为战是河源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部门之间、各县（区）之间缺少必要的信息沟通与工作统筹，保护利用没有形成市县协作、部门协作的相关机制。二是缺乏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跨行政区域的资源整合。文物保护修缮、场馆建设布展、景点开发推广等都是侧重于点状布局、

区域平衡，没有一盘棋的观念，缺乏从历史事件角度、线性的角度、连片开发的角度推动资源的保护利用，以形成品牌效应和聚集效应。三是对重要红色资源的保护管理归属不统一、标准不统一。以已建成的重要纪念场馆为例，一方面是大多数难以做到专人专管而是委托不同机构管理，另一方面有专门管理机构者又无法统一管理标准。

（三）保护利用力度不够。红色资源本体修缮保护、展陈提档升级等方面资金不足，红色资源保护率低。目前河源红色资源保护的重心集中在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少保护级别较低的革命遗址得不到及时修缮，损毁严重，有的甚至面临灭失的危机。如连平县就有九连山人民自卫总队遗址等3处省级革命遗址因年久失修而灭失。同时，由于河源的革命遗址绝大部分是清末民初民居建筑，多为土木或砖木结构，均已超过其使用寿命，而且点多面广，大多分布在边远山区，大多数革命遗址亟须维修，有的甚至尚未立碑保护。据统计，河源277处省级革命遗址中未立碑保护的占45%，市级革命遗址中尚未立碑保护的近50%。

（四）保护利用力量薄弱。一是缺乏专业研究的人才。河源专门针对河源红色文化进行可持续性、系统性研究的专家屈指可数。2019年机构改革后，除了东源县、紫金县和龙川县保留下正科级的党史研究室外，连平、和平、源城三个县区的党史研究室都合并到当地的宣传部门成为一个股室，仅保留一个编制。二是缺乏专业保护的人才。县（区）、各镇（街道）缺乏专门的人员从事遗址研究的工作，导致很多亟待整理与开发的红色文化档案和事迹没有来得及收集整理就消沉。三是缺乏专业的讲解人才。大部分遗址没有专业讲解人员。

四、红色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路径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要坚持在保护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火”起来。

（一）提升红色资源保护意识。红色资源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具有培育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功能。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红色资源的重要性，从专项督查、专项经费、定期检查修复等方面加大保护力度，建立专职、专人保护制度，提升科学保护能力；构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区域联盟”和共建共享网络，实现有效整合、物有所属、责有所归、共建共享。健全红色资源保护法律法规，明确保护范围、保护主体、保护措施、违规处罚等内容，为红色资源保护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强化执行力度，对破坏、非法开发、侵占红色资源等行为依法严惩。精心设计展览陈列、红色旅游线路、学习体验线路，使革命历史、优良传统对青少年更具吸引力。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传承活动，激发广大青少年学好用好、保护好红色资源的积极性主动性，进一步传承好红色基因。地方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当好红色资源保护的宣传者，自觉当好红色资源的保护者和监督者。

（二）加强地方党史研究，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提供学理基础。要充实党史机构力量，加大力度整合全市地方党史研究人才，夯实存史基础。一是从更广的维度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地挖掘研究、定义评价河源地方重大历史事件、重点组织机构、重要历史人物的精神价值及对广东乃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深远影响。二是重新确定地方党史研究重点。更加注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党的事业发展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研究总结。三是加大党史资政与宣教力度。以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推动形成广大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学史、知史、重史氛围，为全社会建立起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之间的精神联系和价值链接，让历史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的精神财富。四是坚持制定党史研究中长期规划，并以此为引领，促进部门、项目、人才、资金的整合与组织，逐步实现地方党史对当地党的事业发展研究全覆盖，以研究成果的学理性、权威性、可及性带动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上新台阶。

（三）加强统筹规划，加大红色资源保护利用联动协调力度。应贯彻落实《广东省革命遗址保护条例》以及各地相关政策，针对红色资源管理部门分散、管理方式多样、管理目标不一且各自为政的情况，加强顶层设计，做好统筹规划。一方面，将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纳入县级以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以及相关专项规划，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另一方面，在市、县（区）两级建立由宣传部门、文旅部门牵头召集，党史研究室、档案方志、党校、退役军人事务局、农业农村局、公用事业局及发展改革、国土资源、规划、教育、财政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红色资源保护利用联席会议制度，共同研究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的规划、政策和方案，在明确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职责基础上，建立各单位共同遵守的工作规范和行为约束机制，对红色资源研究保护和开发利用情况进行督查评估等。

（四）拓宽资金来源，增强革命遗址保护利用财力保障。要拓宽思路，广开财路，探索构建“四个一点”（即上级补助一点、财政拨付一点、融合统筹一点，社会注入一点）的资金筹集模式，破解河源红色资源保护“卡脖子”难题。一是挖潜政策红利。学习借鉴江西赣南、广东梅州经验，吃透国家和省有关支持革命老区的政策精神，梳理适用于河源的政策措施清单，明确对接责任部门，全力开展向上对接，争取上级加大对河源的扶持力度，推进相关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纳入国家和省支持的盘子，为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二是加大市财政支持力度。设立市级红色资源保护专项经费，通过“以奖代补”方式，对红色资源保护利用项目进行资金补贴，激励各县（区）积极保护开发利用红色资源。三是统筹专项资金合力推进。借鉴吉安市青原区将红色资源保护资金和传统村落建设等专项资金一起使用的经验做法，整合交通、水利、农业、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专项资金，统一调度，拓宽红色资源保护资金筹措渠道。四是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对于一些重要但未列入国家和省支持的革命遗址，可吸引多元化资本特别是民间

资本,采取合作、授权、独立开发等方式参与革命遗址的保护开发利用。如推广河源市东源县黄村镇的“推红”工作经验做法,鼓励外出乡贤和商会等民间组织广泛参与,整合社会资源推动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形成燎原之势。

(五) 做好融合文章,全面活化利用革命遗址。

活化利用红色资源,要在充分挖掘并发挥其教育功能的同时,走文旅融合发展之路。一是创新展陈方式。借鉴河南省桐柏县桐柏革命纪念馆采用文物与景观、照片与影视、音乐与解说、参观与参与相结合的展示方式以及汕头市在红色交通站取景拍摄成电影等经验,深入挖掘革命遗址背后的感人故事,着力打造主题突出、导向鲜明、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精品展陈,并邀请革命先辈的后代讲解,做足“感情”文章,做到“见人见物见精神”。条件较好的重点革命遗址可加强科技应用,运用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展陈形式,提升展陈感染力。二是深化“红色+”模式。借鉴江西培育形成的革命遗址保护利用与红色精品景区建设相结合的瑞金、井冈山模式,革命遗址保护利用与特色小镇建设相结合的宁都模式,革命遗址保护利用与田园风光相结合的金溪模式,革命遗址保护利用与传统村落保护相结合的青原模式的经验做法,充分挖掘河源市水文化、恐龙文化、客家文化等地方特色资源,把革命旧址的保护利用与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田园风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开发更多经典旅游线路。借鉴汕头用潮剧讲好红色故事、用连环画传播红色故事等经验做法,探索用革命遗址蕴含的革命精神和历史文化为河源旅游铸魂,充分激发革命遗址的精神激励力、经济带动力、项目支撑力和产业创新力。三是推动革命遗址保护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借鉴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吉安市青原区等地坚持革命遗址维修到哪里,水、电、路就通到哪里,环境就治理到哪里的经验做法,从空间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与利用、资金筹措等方面,将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和乡村振兴工作深度统筹,一体推进,既保护利用革命遗址,又改善人居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因地制宜,将部分革

命遗址开辟为农家书屋、群众文化活动室、村史馆、老年人活动室、农民剧团、农村留守儿童中心等,全力打造“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的河源样板。

(六) 筹建革命历史陈列馆,搭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综合平台。河源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很多,由此形成的革命旧址、遗迹及纪念设施的丰富程度和历史影响在全省名列前茅,但河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市级层面革命历史综合性陈列场馆。河源重要的红色资源包括重要人物阮啸仙、刘尔崧、黄居仁,重大事件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四二六”暴动、“五战五捷”,重点组织中共东江特委等领导机构和东江纵队等,对其事迹的介绍或展陈基本由各县(区)甚至乡镇分散承担,有展陈场馆的或者面积狭小或者过于简陋,分布零散不集中,展陈史实不连贯,人与人、人与事、事与事独立陈述,缺少有机关联,看不到党领导河源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全过程,影响力不够,利用率不高。因此,对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极有必要建设革命历史陈列馆,使之成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综合性平台,并以总馆分馆形式全景陈列党的领导下红色地区的革命历史,包括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重点组织机构,以及党在红色地区的统战史、宣传史、组织史等。

(七) 加强红色革命遗址普惠性保护,防止红色资源快速散佚灭失。从整体需求出发,加快推进红色资源数据库建设,除了为保护革命遗址提供基本数据查询之外,还要根据专业人员的实际需要,提供展陈、宣传、教育、培训、比较研究等数据服务。同时出台红色资源动态补录制度,做到应补尽补。

总之,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繁琐的工作,需要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加强协作沟通,才能更好发挥其价值效能。

参考文献:

- [1] 刘路红,杨党校.刘尔崧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28.

- [2] 路红,廖金龙.阮啸仙传[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4:16.
- [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4] 赖宏,刘浩林.论红色文化建设[J].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2006:4.
- [5] 朱继东.什么是真正的红色文化[J].2012:3.
- [6] 刘润为.论红色文化[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4.
- [7]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N].人民日报,2021-6-27:01.
- [8] 河源: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N].南方日报,2011-6-20:A10.
- [9] 传承革命精神 擦亮红色品牌[N].南方日报,2011-6-20:A10.
- [1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N].人民日报,2021-6-27:01.
- [11] 弘扬红色文化,走好新时代新征程[J].南方.南方杂志社出版,2022:19.

【责任编辑:秦院院】

创新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助力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杨东龙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智慧交通处, 广东 深圳 518041)

摘要: 智能网联汽车契合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广东应顺应新一代科技革命趋势, 及时抓住产业发展的窗口期, 持续完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态要素支持,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以创新政策、标准强化区域协同联动, 依托广、深两地加强创新应用, 打造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智能网联汽车应用高地、产业高地, 助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关键词: 智能网联汽车; 汽车产业; 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3-0105-02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时提出, 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实现高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李强总理在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上也指出, 要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促进汽车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 更好满足和创造市场需求。

智能网联汽车融合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超级计算等新技术, 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有机融合的示范, 是我国培育壮大技术含量高的新兴产业、布局建设领域新的未来产业的重要载体, 契合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据研究机构预测, 2030 年全球智能网联汽车市场规模将达到近 2 万亿美元, 未来几年年增长率将达到 72.8%。

智能网联汽车规模化应用后将带来两大变化, 一方面, 将极大的改变目前基于传统的人、车、路、环境的道路交通运输组织模式, 使共享出行替代私人用车成为未来交通出行的主流形态, 为交通规律研判及机理剖析、空间设计提供崭新视角, 并创造一批新的技术工作岗位; 另一方面, 将创造更加安全、高效、绿色、便捷的城市美好出行生活, 具有

显著的社会效益。据预测, 交通事故率将降低至目前的 1%, 道路交通运行效率能够提高 80%, 燃油消耗将降低 10%-40%。

目前, 世界各国纷纷将智能网联汽车作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机遇, 中、欧、美、日已形成产业发展竞争格局。如欧洲发布《网联自动驾驶路线图》(Connected Automated Driving Roadmap), 美国制定《确保美国在自动驾驶技术的领导力——自动驾驶汽车 4.0》(Ensuring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utomated Vehicle Technologies——Automated Vehicles 4.0) 等。我国则在 2020 年发布《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 制定了指导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顶层规划, 加快推动新一代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

广东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拥有从整车到零部件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完备、雄厚的汽车制造产业链, 形成了广州番禺、南沙以及深圳坪山等高度集聚的产业园区, 产业链条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在省级层面发布了《广东省发展汽车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1-2025)》《广东省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广州、深圳、惠州

收稿日期: 2024-06-10

作者简介: 杨东龙(1980-), 男, 广东高州人,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智慧交通处副处长,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2024 年全省党外中青年干部专题培训班学员, 主要研究方向: 智慧交通、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

等各地市也围绕省级工作部署，制定地方产业促进政策，为产业发展提供基础土壤。其中，深圳发布了全国首部《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深圳市促进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广州发布《广州市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

目前，以广深为代表的城市已初步建成全息感知、5G 网络覆盖、高精定位等智能网联基础设施环境，5G 建设和创新应用领跑世界。广州黄埔区“双城双岛”、南沙明珠湾起步区、深圳坪山智能网联交通示范区、福田中心区等已全面推动基础设施改造升级，为车路协同自动驾驶奠定了坚实的设施基础。广东还建立了一批国家级和省市级工程研究中心，如鹏城实验室、广东省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大湾区首个智能网联汽车专用测试场平台、新一代移动通信设备与终端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等，形成智能网联产业链协同发展新模式。

尽管广东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处于国内领跑地位，但从世界、行业层面来看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还存在顶层设计薄弱、产业链生态链不完善、产业支持手段单一、试点示范效应不足等问题。

可以说，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大战已经悄然拉开帷幕，谁能率先夺得战略制高点，抢占行业优势地位，谁就能在这次工业革命的百年大变局中拔得头筹，赢来产业春天带来的巨大红利。广东应顺应新一代科技革命趋势，及时抓住产业发展的窗口期，持续完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态要素支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创新政策、标准强化区域协同联动，依托广、深两地加强创新应用，打造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智能网联汽车应用高地、产业高地。

建议：

（一）制定专项政策。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相关部门组建省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小组，建立全省统筹发展机制，研究出台《广东省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行动计划》专项政策，统筹推进测试标准、核心产品标准等标准体系建设。充分发

挥《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的先行示范作用，率先推动有条件自动驾驶的准入登记，建立面向高级别自动驾驶商业化运营的配套管理政策体系，以点带面探索新型商业模式。

（二）搭建创新发展平台。由政府主管部门引导，以行业协会为核心，联合比亚迪、广汽新能源、华为、腾讯、速腾聚创、航盛电子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建立湾区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平台，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合作，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强链、补链、连链、延链”工作，共同研发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融合解决方案。

（三）创新专业人才机制。建立校企联合培养专业人才机制，支持广东高校开设智能网联汽车相关专业。建立常态化人才招引机制，依托重大项目和平台招引拥有智能网联汽车激光雷达、智能芯片、控制算法等关键领域的高水平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

（四）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由国有企业牵头，撬动社会资本参与，成立省级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投资基金。瞄准产业上游的车规级芯片、传感器、自动驾驶解决方案、控制系统软件等主要方向，逐步形成覆盖产业全生命周期的投资链条，提升自主可控能力并加速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

（五）加快形成测试示范区。推进城市级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区建设，以广州市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深圳市坪山区智能网联交通测试示范区为核心，统一广深等城市的自动驾驶测试标准，依托百度阿波罗、文远知行、小马智行、元戎启行等头部企业，率先形成湾区全域开放城市级测试区，加速广东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迭代升级与产业发展。

（六）推动“车路云”一体化协同发展。结合智慧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协同发展工作，以车路协同自动驾驶需求为导向，以广、深两地城市道路与城际道路为抓手，分阶段、分区域推进道路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建设以 5G 和 LTE 核心网组成的移动通信网、边缘云和卫星定位云，建设区域级智能网联监管服务云平台，全面提升道路交通安全和智能化服务水平，支撑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应用落地。

【责任编辑：秦院院】

落实“民营经济 31 条” 以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助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李 颜

(茂名市电白区政协, 广东 茂名 525000)

摘 要: 被社会简称为“民营经济 31 条”以鲜明问题导向回应民营企业关切, 以高含金量举措力挺民营企业发展, 体现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坚定决心, 释放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烈信号, 广东推动粤东西北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必须抓住省委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机遇, 团结凝聚广大企业磅礴力量, 拿出真招实招大力推动“民营经济 31 条”政策落地实施, 从五个方面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现区域发展新突破。

关键词: 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3-0107-03

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 并就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2023 年 7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这份被社会简称为“民营经济 31 条”的文件, 以鲜明问题导向回应民营企业关切, 以高含金量举措力挺民营企业发展, 体现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坚定决心, 释放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烈信号。

2023 年 4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调研时强调,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当前, 我省将“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作为“头号工程”, 锚定走在前列总目标, 举全省之力, 推动强县促镇带村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努力推动全省实现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此, 有必要深入分析我省民营经济发展状况, 优化发展环境, 用实用细用好国家的各项政策, 促进我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效支撑全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一、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

截至 2023 年底, 我省登记在册民营企业 724.8 万户, 同比增长 9.4%, 个体工商户 1019.9 万户, 同比增长 12.2%, 以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代表的民营经济主体占全省经营主体总量 96% 以上。广东民营经济增加值, 从 2012 年的 2.93 万亿元增长至 2021 年的 6.78 亿元, 10 年增长 1.3 倍。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省 GDP 的比重从 2012 年的 51.3% 提升到 2021 年的 54.5%。可以说, 民营经济是广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 在经济欠发达的粤东西北地区, 民营经济培育工作效果不太理想, 特别是近几年来,

收稿日期: 2024-06-10

作者简介: 李颜, 男, 广东高州人, 茂名市电白区政协副主席,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2024 年全省党外中青年干部专题培训班学员, 主要研究产业经济、民营经济。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民营经济发展偏慢,产业规模、质量处于下行趋势,未能有效支撑起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 市场需求萎缩,企业投资决策趋于谨慎。

国内市场方面,经过多年高速发展,传统市场投资空间缩小,供给端产能过剩,产品利润下滑,企业扩大投资愿望缩减。新兴产业方面由于投资门槛高、回报周期长,而粤东西北地区的民营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无力参与。国外市场方面,受中美贸易摩擦、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面临空前变革,利用外资项目和外资金额呈断崖式下降。

(二) 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市场消费信心不足。

受经济下行压力、企业经营困难、家庭刚性支出大等影响,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消费信心不足,储蓄倾向上升。根据相关统计数据,近几年粤东西北地区人均居民收入增速相比经济发达地区偏慢,以中青年群体为主力的消费者忧患意识明显增强。

(三) 应收账款拖欠增多,企业抗风险能力弱。

粤东西北地区的民营企业经营资金保证能力较弱,受项目单位和下游企业因资金紧张、支出流程复杂、审核周期长等原因拖欠账款的影响,企业容易出现现金流不足、经营困难,甚至造成资金链断裂。

(四) 民营企业规模偏小,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粤东西北地区的民营企业规模偏小,缺乏产业链条长、发展后劲足、辐射带动强的龙头企业,产业生态不完整,产业链规模较小,创新能力偏弱,市场竞争力不强。此外,粤东西北地区的企业薪资普遍低于珠三角地区企业,高端科研、管理人才和技术工人“招不来”“留不住”,制约企业进一步发展。“专精特新”高科技领域研发投入大、人才引进难度高,民营企业普遍难以承受。

二、意见建议

“民营经济31条”回应了民营企业的重点关切,体现了党中央对民营经济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党中央更是反复强调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措施,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

发展。广东要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就必须推动粤东西北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要推动粤东西北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抓住省委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机遇,团结凝聚广大企业磅礴力量,拿出真招实招大力推动“民营经济31条”政策落地实施,努力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区域发展新突破。为此,建议:

(一) 狠抓政策落地见效,全力提振发展信心。

政策千万条,执行第一条。“民营经济31条”出台以及中央、省陆续出台系列配套措施,力度前所未有,这是粤东西北地区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难逢机遇。要结合地方实际,进一步梳理细化“民营经济31条”工作任务,明确部门工作职责、落实措施、时间进度等,确保政策落到实处。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广泛听取民营经济人士意见建议,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等方面政策协调配合,确保政策同频共振、行之有效,以政策落地见效提振企业发展信心。省要强化跟踪问效,将各地各部门推动“民营经济31条”政策纳入督查考核范围,通过实地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多方了解政策取得成效,对推进过程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要及时进行推广应用。

(二) 扩内需抓开放,释放“双循环”发展潜力。要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优化供给端人才培养机制,重点关注中低收入家庭和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消费主力规模。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强化政策、资金、培训、服务等方面支持力度,发挥创业的就业倍增效应。提高民生性财政支出比重,不断扩大社保覆盖范围和保障体系,提高基本医疗和基础教育投入,提振居民消费信心。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欠薪治理长效机制,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组织以地方主导产业、新兴产业为重点的企业参加境内外交易展会,帮助企业在欧美传统市场和“一带一路”等新兴市场拓展业务。依托现有或探索构建民营企业境外服务平台,为企业出海提供政务服务、法律服务、政策咨询、产业信息和生产要素全方位服务。

(三) 创新政策支持,促进企业做优做大做强。要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灵活资金优势和市场战略目

光，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百千万工程”城乡协调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支持民营企业通过特许经营模式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聚焦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领域、使用者付费项目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投资。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发展资金安全，政府和国有企业带头全面排查拖欠企业账款情况，完善资金管理和项目结算工作流程，建立民营企业拖欠账款投诉机制，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设立民营企业发展纾困基金，引导金融机构通过实施置换存量贷款、债务展期等方式缓解企业周转资金压力。深入摸排本地具有升规潜力的民营企业，加强政策宣讲指导及时落实补助资金，大力培养“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积极培育主导产业集群，加强主导产业链条上下游科技创新和产业配套的沟通协作，做优做大做强优质中小企业，推动产业集群向数字化和绿色低碳转型。

（四）激发消费潜力，扩大有效投资形成良性循环。要贯彻落实《广东省进一步提振和扩大消费的若干措施》，努力稳定住房、汽车、家电和电子产品、服务等方面消费市场，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条快速复苏，完善消费场景，丰富供给种类，恢复居

民消费信心。挖掘农村和新型消费潜力，加大补贴支持力度促进农村消费升级，完善乡村旅游“吃、住、娱、行”文旅配套设施和镇村仓储配送、生鲜冷链等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乡村民宿、餐饮等服务行业的品质控制、卫生监管和对假冒伪劣商品、三无产品的打击力度。

（五）健全政务服务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实施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聚焦“通堵点、去痛点、破难点”建立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市、县（区）、镇三级领导包联服务企业，确保各项助企纾困政策措施精准及时到位。瞄准打造高效便利政务环境持续发力，推进“证照分离”与“准入准营”全覆盖。参考国家的做法，探索建立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部门，综合研判民营经济发展状况，组织制定发展政策措施，统筹协调民营企业生产经营重大问题。探索建立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确保涉企政策更加到位、更有针对性。加强经济政策宣传和营商环境舆论引导工作，大力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唱响广东民营经济发展正能量，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责任编辑：陈童敏】

以文化建设助力“百千万工程”协同区域协调发展

张 艳

(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 文文化艺术在“百千万工程”的实施过程和目标实现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广东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发展文化产业的资源以及市场优势明显, 并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 将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结合起来, 能够更好地赋能“百千万工程”的实施, 应加强平台顶层布局, 拓展研究和创作路径, 强化规划和基础建设, 提升文化“两创”能力。

关键词: 文化建设; “百千万工程”;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 G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3-0110-03

2022 年 12 月 8 日, 广东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定》, 全面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下简称“百千万工程”)。“百千万工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的战略、新型城镇化的战略为牵引, 以城乡融合发展为主要途径, 以构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目标, 壮大县域综合实力,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是广东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头号工程, 是省委“1310”具体部署的“十大新突破”之一。

其中, 文化艺术在“百千万工程”的实施过程和目标实现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广东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发展文化产业的资源以及市场优势明显, 并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 将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结合起来, 能够更好地赋能“百千万工程”的实施。

一、广东文化建设和发展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文化产业发展不均衡, 整体布局设计亟待加强

2018 年 10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指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 2023 年 4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再次强调“广东要下功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而区域协调发展正是“百千万工程”的重要目标之一。

从传统的角度来看, 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岭南本土文化交相辉映, 从当代的角度,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与全球多元文化融合互鉴, 呈现出独特的区域文化特点, 因此, 就文化资源而言, 广东地区是丰富而深厚的, 分布于全省不同的地区。当前, 各地正积极发掘、提炼本地的文化特色和品牌, 部分地区甚至已经形成了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品牌, 为进一步的聚合、创造和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整体来看, 特别是将当前广东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之放于国际化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的背景下, 则表现出研究和文化创造性转化相

收稿日期: 2024-06-10

作者简介: 张艳(1984-), 女, 湖北荆门人, 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副院长/广州大学荔湾研究院副院长(兼),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2024 年全省党外中青年干部专题培训班学员,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传统音乐、音乐传播。

对分散、不够集中、凝聚力不足等问题，在粤港澳联动保护与传承方面，也缺少明确的、具有辨识度和影响力的合作，亟待系统性地梳理、保存，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构建整体文化产业发展策略。

（二）缺乏有重要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和作品

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和文化艺术作品是区域文化艺术成熟的标志，也是文化传承与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能够强化广东文化品牌，增强文化自信，更好地以文化凝聚人心。近年来，反映广东地区历史文化的作品创作和相关专题研究正持续开展，但能在全中国范围形成较大影响力的作品不多，且大多都集中在广州等文化生产力较强的地区，其他地方的文化资源挖掘和转化明显不足，仍需深入做好文化资源发掘、梳理工作，同时整合资源进行创作，推出具有时代影响力的文化作品。

（三）文化传播与旅游产业配套不均衡，文旅配套有待提升

文旅产业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当前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文旅产业的发展有赖于一系列相关产业的配合。然而，尽管当前广东省部分地区在文化资源和文化品牌的凝练、传播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成效初见端倪，但是在文化旅游配套产业设施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交通、住宿等配套基础建设亟待加强；餐饮、公共卫生服务等生活服务设施需进一步完善；信息化等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和管理手段需进一步提升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文旅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影响了游客的旅游体验。

（四）文化“两创”能力有待提升，亟待引入相关人才

“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七个着力点之一。“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当代的传承、传播及其存在与发展样态指明了关键的方向，文化“两创”与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关联度日益紧密。当前，广东省正积极探索文化“两创”的路径和品牌，但是仍然有部分地区表现出创造性转化不足等问题，导致自身优势不能更好的展现出来。同时，文化“两创”指向跨学科、跨行业的融合创新，对人才的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文化“双创”相关人才的缺乏是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发展普遍面临的问题，广东省部分地区囿于人才资源的限制，文化“两创”相关人才缺乏，亟待培养和引入。

二、以文化建设助力“百千万工程”协同区域协调发展的建议

（一）加强文化平台顶层布局

文化数字化正在改变我国文化建设的格局和生态，它不仅有助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其灵活丰富的产品形态以及快速发展衍生的产业潜力为全民文化艺术资源共享、文化产业业态升级等方面提供了强大支撑。因此，建议政府主导并部署创建涵盖广东省主要城市范围的岭南文化艺术数据平台，各城市地区需采集并传输本地文化艺术资源，同时一定程度上共享资源。平台以岭南文化艺术的数字化手段采集、保存为基础，逐渐延伸至学术合作、教育、文化交流等领域，最后进行更广泛的大湾区社会文化服务应用，从而建立高水平的数字文化广东系统。

（二）拓展文化艺术研究和创作路径

开拓更广泛的研究和创作路径，建立更灵活的文化艺术创作资助体系和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到文化艺术资助中来，支持具有商业潜力和社会价值的文化艺术项目。一方面继续保持对传统重点项目的支持，另一方面重视对新兴艺术家和民间新锐力量的挖掘、扶持和资助，鼓励跨界合作与创新，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共同积极参与的多元且具有激励性的文化艺术资助体系。同时，为了确保更好的资助效果，还需要同步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估和监督机制。

（三）强化文化规划和文化基础建设

地方政府需充分理解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发展

思路和逻辑,重视地方文化品牌打造的同时将文旅产业配套设施建设与完善纳入工作范畴,文旅产业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并重。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投入,加强对文化旅游配套产业设施的建设和改造,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提升文旅服务信息化水平,同时加强文旅产业发展相关的宣讲。

(四) 提升文化“两创”能力

文化“两创”能力的提升需从多方着手,首先是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培养既懂文化又懂市场的复合型人才;其次,优化政策环境、支持政产学研创新平台建设,强化项目扶持;第三,充分重视市场在文化“双创”中发挥作用,鼓励交

流与合作,从而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第四,完善与文化“两创”相关体系的联结与融合,例如金融支持、科技支持等;第五,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营造创新思维氛围,为文化创新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最后,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文化艺术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需充分重视“以文化人”以及人文精神的养成,利用并调动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资源,建成有“乡愁”、有温度、有内涵、有特色的美丽新型城镇。

【责任编辑:温开照】